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424
63

08346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F68/15

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

（1943—1949）

刘德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

（1943－1949）

刘德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25印张　6插页　25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4980－9/G・4286

定　价：13.0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DT-68/15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

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提出和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

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导　言

“弱国无外交”是一句名言。名言不一定是科学论断。但既是名言，总要道出一定真理。否则，必是虚假的名言，或反动的名言。

“弱国无外交”并不是说弱国完全没有外交，而是说，一个贫弱与落后的国家绝不可能有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和行动，或者说，弱国与强国的外交必然是不平等的或者必是受制于人的。总之一句话，一个贫弱与落后的国家绝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840年鸦片战争后，饱受外强欺凌和掠夺的中国历史充分说明，“弱国无外交”这句名言并非虚妄之说。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已是贫弱不堪。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者，面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顺从帝国主义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统治，但是，继承清皇朝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列强干涉和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依旧奉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人民继续遭受列强的欺凌和压迫。

从1937年到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因为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走

向强盛的道路。但是，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身为中国合法统治者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依然奉行受制于人的外交政策，并继续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仍然面临大国干涉和宰割的局面。

然而，中华民族既然已经觉醒，当然不会再听凭大国的干涉和宰割。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是中国人民从软弱走向强盛的标志。因此，反对并彻底铲除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一百多年来，为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百多年来，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强盛，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一百多年来，在人民爱国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的历届政府也曾为争取国家的独立主权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历届政府的反动本质，使其在广大人民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尖锐对立中，往往屈从于资本帝国主义而压制人民，因而导致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能取得彻底成功。

中国共产党自从 1921 年成立以来，就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地位，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 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坚决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193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举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正式制定了“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

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宣布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中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地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概收归国有；宣布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立场是坚定的，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民族解放和反抗帝国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抗日战争以前，特别是在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的幼稚和弱小，不能不给它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带来很大限制。那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而没有进行外交的实践活动，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实施外交政策的战略和策略。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尚无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更不用说在外交上的地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只能在推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方面发挥间接的外交作用。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外交，因此也就谈不上在外交上发挥重大作用。

从1935年开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是其能在外交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主观因素。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则是中国共产党能在外交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客观条件。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国内军事和政治局势中的决定性

力量，而且成为国际上关注中国事务的国家与势力不能不重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于 1944 年夏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开始了对外交涉的实践活动。从此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暂时还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却同美苏等大国以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威武雄壮的战略交往与争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外交上发挥直接而又重大的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19 世纪下半叶，美国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19 世纪末，美国提出侵略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独树一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占据优势地位。1931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对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由自己取而代之。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并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予以同情和支持。但是，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保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还一度酝酿实行远东慕尼黑阴谋，即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不侵犯美英等国的利益。直到 1941 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才给予中国抗战以大力支持和援助。从 1942 年开始，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中美关系由此得到全面改善。中美两国成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盟友。尽管如此，美国仍没有根本改变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态度。它以给予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为条件，迫使中国接受其控制。它的这种手段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那里取得了成功。它以同样的手段企图施行于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共产党所拒绝。从 1943 年到 1949 年，美国与国共两党之间

以及国共两党之间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当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完全倒向美国，听凭美国控制后，美蒋反动派就联合一处，进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依靠人民，与美蒋反动派进行对抗。

自从 1917 年以来，苏联就一直奉行与中国友好的外交政策。苏联成立以后，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一直方兴未艾，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苏联做为革命刚刚取得成功的国家，大力支持中国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它又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为己任呢！然而，苏联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同时，又同中国革命的对象——反动的中国政府积极联络，并争取建立双方友好的外交关系。做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希望中国政府成为对苏联没有威胁的友好的政府，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苏联在 1917 年成立以后二十多年间奉行的双重对华政策。开始，苏联一方面与北洋军阀政府积极联络，争取建立双方友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努力支持与北洋军阀政府尖锐对立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又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去发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1924 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努力，苏联与北洋军阀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与此同时，苏联又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为目标的国民革命。1927 年蒋介石的背叛使苏联的双重对华政策遭受挫折，从而使刚刚建立不久的中苏外交关系中断。从 1927 年到 1937 年，苏联实行以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同时也试探和摸索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后构成的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促使两国政府走到了一起。到 1937 年，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正式恢复，并签订了针对日本的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双方进入全

面友好的新阶段。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在新形势下有所变化。但它仍保持着与国共两党的友好关系和对它们实行程度不同的支持。苏联实行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为主的政策则是显而易见的。

本来，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并无纠葛。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纠葛发生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当时，美国为实现其尽快打败日本法西斯和战后控制中国的两项目标，迫切希望苏联做到：其一，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参加对日作战；其二，在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美国以中国东北和东欧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部分权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满足美国的上述希望。从1943年开始，美苏双方就上述要求和条件进行了交易。苏联最后基本同意美国提出的两点要求；美国则保证苏联获得美国允诺给予的权益。日本投降后，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妥协，也有斗争，总的来说，则以妥协为主，而以斗争为辅。在此期间，苏联继续奉行双重的对华政策，即在基本赞成和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维持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支持。只不过苏联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服从于苏美妥协和苏蒋妥协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的。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政策是以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为主，而以联合中国的合法政府为辅。那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则是以联合中国的合法政府为主，而以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为辅。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实行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从抗日战争后期直到战后初期，苏联在与美国进行交易的基础上实行的以支持蒋介石

国民党为主，而以支持中国共产党为辅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实行以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为主的双重对华政策的积极性是主要的。那么，从抗战后期直到战后初期，苏联实行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双重对华政策的消极性则是主要的。这种消极性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作祟的结果。只是由于苏联对中国革命支持的积极性的一面，所以才使它同帝国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正式形成是在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纠葛开始以后。从 1943 年到 1949 年，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经历了联美拉蒋，联苏抗蒋，反美倒蒋，直至最后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这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并共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的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由此产生了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即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的艰巨性。

毛泽东确立和实施外交战略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政府（1947 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后又被迫转移）虽然在事实上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但是，为国际上所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却为蒋介石国民党所占据。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边区政府是被美苏等大国作为中国反叛者的政府来看待的。这是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的一层困难。从抗战后期开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美英苏抬高到大国地位，并表示予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取得大国地位后，就将消灭中国共产党做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美苏两个大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并支持蒋介石国民党

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控制，这是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的又一层困难。

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它的人民性。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包括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曾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拉拢或利用一方牵制或打击另一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在外交上的一切努力并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比如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的一切外交活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只要能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什么屈辱的外交条件都可以接受，即使割让领土也在所不惜，这又何谈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历届政府，包括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他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不过是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则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理论上的敌人也可以化为战略上的盟友。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同“魔鬼”进行暂时合作。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怀疑与担心。从抗战后期到战后初期，毛泽东实行联美拉蒋是战略考虑，联苏抗蒋也是战略考虑；反美倒蒋是战略考虑，一边倒向苏联也是战略考虑。这些战略考虑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人民的利益。根据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确立和实施不同的战略方针。以人民的利益做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这是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在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脱离人民，虽然有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得到大国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毛泽东确立与实施外交战略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一方面是毛泽东依靠人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直接表现。有这样一个成熟的革命党，和这样一群成熟的革命领袖，是毛泽东能够确立和实施正确的外交战略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不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而且有正确的外交战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毛泽东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成熟的具体体现。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苏联对华政策中的积极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于我有利的一面；并且最大限度地分化了美蒋关系，最大限度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孤立了美蒋反动派。

战略和策略是一对不同的概念。战略是指政党和国家规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实行的全局性的方针和任务。策略则是指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反映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既是区别的，又是联系的。按照各种大小不同的范围来说，战略和策略的区分又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内的战略任务，在另一范围内则可以是策略任务。反之亦然。但在同一个范围内，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区别又是确定的。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就是在这种战略概念的意义上使用的。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美国扶蒋与联系中共的决策 …… (1)

一　梦想与现实 …… (1)

二　寻求与中共合作 …… (13)

第二章　毛泽东确立联美拉蒋战略（一） …… (29)

一　“迪克西使团” …… (29)

二　合作的基础 …… (43)

第三章　毛泽东确立联美拉蒋战略（二） …… (63)

一　延安协定草案 …… (63)

二　最后的努力 …… (78)

第四章　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 …… (95)

一　从德黑兰到雅尔塔 …… (95)

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111)

第五章　毛泽东确立联苏抗蒋战略 …… (130)

一　战略还是策略？ …… (130)

二　联苏抗蒋 …… (146)

第六章　毛泽东和美蒋的妥协与合作 …… (172)

一　战略退却 …… (172)

二　反抗、中立与合作 …… (184)

第七章　美苏在中国的妥协和斗争…… (196)
一　冷战与妥协…… (196)
二　支蒋与援共…… (211)
第八章　毛泽东反美倒蒋的理论和实践…… (235)
一　战略的转变…… (235)
二　中间地带理论…… (251)
第九章　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 (276)
一　观望和犹豫…… (276)
二　热情与冷漠…… (285)
第十章　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 (299)
一　思想、政治倾向…… (299)
二　在外交上努力…… (312)
结　论…… (329)

第一章

美国扶蒋与联系中共的决策

一 梦想与现实

1942年夏到1943年春，发生在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这次战役以苏联军队的彻底胜利和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苏联军队由防御转入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对美国的世界战略发生了深刻影响。当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政治和军事顾问的罗伯特·舍伍德说："俄国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和瞩目可见的未来图景。由于这一仗，……俄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了。……罗斯福已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了。"①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使美国看到，德意日法西斯必将在战争中失败；苏联则必将在战争中崛起。战后能与美国抗衡的可能只有苏联。面对当前局势和将来发展，美国不能不考虑战后与苏联争霸世界和全球的利益分配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看到，由于中国的坚持抗战及其所固有的地位，使得中国在战后必将取代日本成为东方的大国。而且，在将来美国与苏联的争夺中，中国

必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上述认识，美国的愿望是：一个与美国友好的中国必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在战后同苏联，甚至同英国争夺世界的斗争。美国领导集团认为，自从1941年底美国参加对日战争以来，美国已经与中国，即蒋介石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美国的大力援助，已经使蒋介石政府坚定地站到了美国的一边；剩下的问题就是抬高蒋介石国民党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之在将来大国主宰的世界事务中能提供支持美国的决定性一票。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美国领导人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说明了美国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愿望。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作战，第二是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以及在东方确立稳定与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成一个跟俄、英、美这三个西方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他还说："十分清楚的是，日本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失去做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因此就是中国了。因而，倘若能在远东获得稳定的话，那么，要确保这种稳定，任何安排就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倘使中国处于大国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的圈子内，而不是处于这个圈子外，我们对于中国在国际国内方面的发展，就能更容易发挥影响。"② 罗斯福总统也说，他感到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并且，"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③ 当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于1943年3月访问美国时，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韦尔斯副国务卿一齐出动，向英国表明，美国坚持要把中国作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四强"之一。罗斯福对艾登说："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销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④ 而且，"中国由于同苏俄存在严重的政

策冲突，将会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一边。”赫尔则当着艾登的面，批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没有提及中国是大国，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罗斯福、赫尔和韦尔斯向艾登一再指明：美国希望“世界组织的真正决定，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做出。”⑤

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不久，苏联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初露端倪，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取得对日本法西斯的初步重大胜利，美国关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就开始酝酿并付诸实施。中美（以及中英）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修订新约问题的谈判及达成的协议，是其第一步行动。

1942 年 10 月 9 日，美国政府通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愿意废除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它有关特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说服英国采取了同一行动。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中美（以及中英）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改订新约问题达成协议。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与换文》（通常简称“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同年 5 月 20 日互换批准书生效。

中美（以及中英）平等新约签订时，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称：中美中英之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光明的灯塔。”又说：“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取消了，我们与英美各国就处在平等地位，就是我们已处在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才算是真正成为友邦了。”⑥与此同时，国民党报刊也发表文章，认为条约的签订是结束了一百年来的耻辱，是实现了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民族独立解放。实际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夸大了“平等新约”的意义。因为当时英美依据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绝大部分已为日本所占有，如果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中国共产党指出："废约和平等条约之订立，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着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击败它，不把它赶出中国境外，则一切平等新约的规定，便不能实现。"⑦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签订新约是一个进步的举动，这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另一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改订新约则是美国实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由于实行欧洲第一和近期内不能给中国大量军事援助的战略，就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蒋介石，抬高蒋介石的地位，以达到鼓舞中国士气，维护中国抗战，在亚太地区牵制日军的目的。同时，"新约"对蒋介石也是一种"体面"，可在英国和苏联面前提高中国的形象，让他们易于接受美国关于战后"四强"的设计。

中美平等新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政治和军事顾问霍普金斯告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说罗斯福认为，"中美间此时已无须再非正式地讨论原则，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⑧这说明，从此以后，美国就把蒋介石的中国当作大国看待了。同时，美国还要努力促使英、苏两国也把蒋介石的中国当作大国看待。

1943 年 8 月，美国正式提出一份由盟国采取统一行动以维护战后和平的美、英、苏、中四国条约，以使中国在战败日本后恢复其对所丧失领土的主权；并在世界各国中占有较高的地位。美国希望中国在这样被提高地位并得到保证后，可望更加努力作战，

并于战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和平稳定方面，成为西方的一个得力伙伴。在同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说服邱吉尔接受了美国关于建立四国条约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苏联的反对。罗斯福断定，苏联人不想和中国人联合在一起，因为日本可能会把这种联合解释为挑衅性的。邱吉尔则认为，俄国人是“比我更加不愿意这样荒唐地同中国具有大国地位一事发生纠葛。”然而，罗斯福认为，把中国包括到大国之列对他的战后计划是十分重要的；而如果把它排除在外，宣言的价值在美国就会受到削弱，并且困难会大大增加，无法保证美国在战后维护和平的组织中居中心地位。因此，罗斯福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四大国概念，……哪怕在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他和国务卿赫尔一致认为：“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⑨

为使中国正式进入四大国行列，赫尔国务卿于 10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开始，莫洛托夫拒绝签订四国协定，理由是中国对欧洲问题没有可以使人接受的影响。赫尔向莫洛托夫强调说：“对于中国局势，美国政府已经作了而且正在作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在四国宣言中不能排除中国。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苏英美三国当面将它摒弃，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如此。这样做可能要使国民政府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以保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正当的稳定。……而且，我国公众舆论将会因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而失望地分裂，因为公众可能认为它是被排挤在［四国］宣言之外的。”⑩赫尔暗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

使美国英两国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太平洋地区；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严重影响美英两国在欧洲的作战努力，并影响美国对苏联抗击德国的援助。当莫洛托夫继续拒绝美国的建议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空手而返相要挟，直到斯大林做出让步才罢手。为使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及时获准代表中国在会议拟定的宣言上签字，赫尔主张向傅秉常提供美国的电台。在美国有力支持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得以在宣言上签字；中国的名字终于同其它三大强国的名字并列一起；“四强”之一的地位终于以宣言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蒋介石在接到签订宣言的报告时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表示：他对宣言感到十分高兴，对赫尔极为感谢。⑪罗斯福也认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确认几亿中国人战后属于盟国一边，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四国宣言的发表，是美国实施“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第二步行动。第三步行动则是1943年在开罗召开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在1943年夏季和秋季，由于美国无法向中国提供以前保证给予的军需物资，又不能发动原先计划好的空中攻势，因此，罗斯福格外想要给予蒋介石以象征性的支持，莫斯科外长会议已经给予蒋介石这样一种支持，但罗斯福仍觉得不够。他希望能同蒋介石亲自会谈，以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并希望通过这种会谈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协议。

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会议一开始，罗斯福就将中国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这使邱吉尔大为恼火。他形容罗蒋会谈为“冗长、复杂和枝枝节节的……”并“占据了开罗会议首要地位，而不是末位。”⑫在11月23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取得做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

加四强小组机构，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⑬在会谈中，罗斯福和蒋介石一致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他们强调，“经谅解，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还提出，在战后遇有外来侵略，美国和中国应当互相支持；“美国应在太平洋各个基地上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地分担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对这两项提议都表示同意，并声称，“中国准备把旅顺交由中国和美国共同使用，”但他希望美国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来装备他的陆海空军，以增强其国防，使其能履行国际义务。”蒋介石还要求美国在战后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各种类型的技术援助，”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此外，罗蒋还就占领日本、中苏边界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⑭会后发表了中美英《开罗宣言》

通过开罗会议，罗斯福终于在国际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把一个实际上依附于美国的蒋介石政府正式抬高到一个大国的地位。

罗斯福对开罗会议的成果是非常满意的。他相信，开罗会议“不仅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取得成果，而且今后几十年也会产生效果。”⑮蒋介石对开罗会议的结果也是满意的。他认为，开罗会议“以政治的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还通过其夫人宋美龄写信告诉罗斯福，他“无法找到颇有意义的话来表达他的情绪和情感，也无法为了你的友谊，而向你充分地表示谢意。”⑯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蒋介石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弹冠相庆。罗斯福向全国发表演说，称赞蒋介石“眼光远大，勇敢无畏，对当前和未来的问题有敏锐的理解力。”他宣称：“今天我们和中华民国在深厚的友情和目标一致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互相接近了。”⑰蒋介石回国后又给罗斯福

写信，称开罗会议及其宣言，“对提高我国军队和我国人民的士气，影响是惊人的”；说“实际上全国以前所未有的响亮声一致欢呼开罗宣言，将它视为导向战后远东和平的确切路标”。⑱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把开罗会议说成是“转移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说“开罗会议的决策，乃是美国远东政策最鲜明的结晶”，“代表了全人类的最大希望，也给予了全世界以无限光明。”⑲

开罗会议真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罗斯福和蒋介石国民党是否夸大了开罗会议的重大意义？

全面评价开罗会议就象全面评价 1943 年 1 月废除不平等条约和 1943 年 10 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及四国宣言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应当看到，美国所采取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这几步行动，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无论是中美（以及中英）平等新约、莫斯科四国宣言还是开罗会议及其宣言，无疑都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和积极意义，曾经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和行动不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这种积极意义是客观形势所使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客观结果。但是从主观方面来说，美国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这几步行动主要是服务于美国要在战后争霸世界和控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立场来说，这一战略目标显然是反动的。而且，美国酝酿并实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基本前提又是“蒋介石即中国”这样一个错误的等式。根据这一基本前提，“使中国成为大国”，实际上就是使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成为大国，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如果蒋介石真能代表中国，

那么，“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当然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因而是美国采取的一个进步行动。即使如此，仅靠外力的推动，能否“使中国成为大国”也还是个问题。更何况，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而将中国共产党完全排除在“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和政策之外，更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就有一位美国驻华官员说：“蒋介石也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他使美国多数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⑳。酝酿“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反动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其必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美国从一开始酝酿“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时，中国的现实就已经暴露出这一设想的不现实性；蒋介石政府的抗战不力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腐败和衰退就已经说明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美国于1942年3月派给蒋介石政府担任中国军队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发现了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和衰弱，并向美国政府发回了报告。关于中国政府，史迪威认为：“中国政府是以恩威并施为基础，由一个无知、专制、顽固不化的家伙掌握的机构。……只有外部影响能帮中国的忙——或者是敌人的行动将毁灭它，或者必须形成某种革新思想并立刻付诸实施。”㉑关于中国军队，史迪威报告说，中国军队“处于令人绝望的状况，营养不良，领不到薪饷，未经过训练，没有妥善管理，由于贪污而腐败不堪。……我们一切麻烦的起因就是这帮军队的首领。”㉒史迪威曾设法改变蒋介石军队的状况，但总是事与愿违，而且使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鉴于上述状况，史迪威于1943年初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指出：“在中国要办任何事情，只有撇开蒋介石及其军人集团而不按他们的意旨才能办成。”他在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信中

说，蒋介石“一直很急躁，难于对付，不管给他什么东西，他还要提高他的要求。”为此，史迪威认为，只有用施加压力的办法，方能使蒋介石让步。他指出，“在我们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说话之前，他这种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每为他做一件事，我们就应该从他那里掏出一个保证来”。这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马歇尔也赞同史迪威的看法，并向罗斯福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抱着“让别人去打”的态度；他们希望用美国建立航空队的努力来代替建立和使用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而有了这支军队，空中力量也才有价值。㉓

不仅史迪威等有这样的看法，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几乎一致认为，国民党无能，腐败，搞镇压，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在中国有二十年外交活动经历的乔治·艾奇逊 1943 年 5 月作为临时代办抵达重庆之后报告，“实际上各方面的情况都在严重恶化”，经济方面的恶化正在“导致某种最终垮台的局面，”中国领导人“无法可想”，逃避现实，只关心战后的问题。㉔

罗斯福也注意到史迪威及其他驻华官员的报告，深知蒋介石政权的贪污和残暴，中国军队极需改组，史迪威有关蒋非常暴躁、难以对付，而且总是把要求升级等的报告是正确的。1943 年 9 月，他在同韦尔斯谈话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状况深表不满，认为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没有行政效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并担心“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㉕

尽管罗斯福意识到蒋政权及其军队的种种弊病，但他不愿把对华援助的条件限制在中国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和保证抗战。他认为，不可能把美国的习惯强加给中国人。所以，他拒绝任何有损

于蒋的事。他在1943年3月对马歇尔说："史迪威对待蒋介石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蒋介石毕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指望他象我们一样办事。史迪威认为，对蒋用比较严厉的口气讲话，那么，他这样处事就错了。我们都应记住，这位委员长历经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不论他以何种形式把形形色色的集团领袖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工作者、工程师等，他们全部在地方或全国范围内纷纷为争夺权利而斗争——团结起来，但他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在全中国创造出我们花两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局面，这是一种多么伟大艰巨的工作。此外，这位委员长认为维护他的最高的地位是必要的。你和我设身处地会这样做的，他既是总司令，又是行政首脑，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能用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的办法，向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或逼迫他作出承诺。"[25]

罗斯福的这番话不是说给公众听的华丽词藻，而是罗斯福对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是对蒋介石的真诚尊重，也是一国元首对另一国元首的同情。但不能不看到，罗斯福的这番话是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史迪威所说，那种认为国民党只用了十五个艰难困苦的年头，就取得了与美国同样程度的民族团结的看法是一种离奇的幻觉，是有害的。这种看法使美国政策建立在一种必定要倒塌的基础之上。史迪威还常常斥责美国有些人对中国军事情况抱有同样的幻觉。他说，中国每天发布的战报都说军队在前线激烈反击和敌人损失惨重。但其中至少有90%的假战报。然而战报上的东西在美国却受到大肆宣扬。

罗斯福拒绝逼蒋让步的另一个因素是担心这可能在政治上促使他垮台，从而迫使中国退出战争，破坏打败日本的计划。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1943年初从中国发回的报告表明，蒋对某

些国民党统治的省份显著地减弱了控制，通货膨胀剧烈，蒋的政治前途和继续抗战的努力使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反对做任何会加重蒋的负担的事情，以免丧失作为战争进攻基地的中国。他在 1943 年 2 月份宣布，他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直到最后打败日本。”他告诉记者：“如果我们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我们估计要五十年左右才能打到日本。”㉗所以，要迅速打败日本，就要用中国作为行动的基地。

罗斯福拒绝逼蒋让步的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担心中国的崩溃将使他的战后计划陷入极大的混乱而难以实现。他不仅要防止蒋介石的崩溃，而且要努力“使中国成为大国”。担心中国崩溃和“使中国成为大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着眼于战后，着眼于蒋介石的中国能否与美国站在一起与苏联抗衡。

在开罗会议召开时，罗斯福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他一年来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他现在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较接近史迪威的看法，认为蒋介石是“非常神经质的”。他还激愤地谈到蒋政权“腐败无能”，说他厌恶蒋政权“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然而他又认为，不管蒋介石的军事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但他们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㉘罗斯福还对他的儿子说：“尽管蒋氏夫妇的缺点很多，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蒋介石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不同于他认识的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东方人，㊻因而他宁愿继续全力支持蒋介石及其政权。

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并对他全力扶持，这是罗斯福的悲剧所在。一位美国学者说：“罗斯福从来没有

真正了解，在他想要塑造亚洲新秩序的努力中，他已经把美国同一个正在崩溃的政权联系在一起。这一情况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发现自己与之联盟的奥地利竟是一具‘僵尸’。”㉙

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腐败有认识，但宁愿视而不见，并继续对他全力支持，这是罗斯福以及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动所在，又是必然产生上述悲剧的原因所在。美国要同苏联争霸世界，又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扼制共产主义，就不能不在中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即使它已经是一具“僵尸”，也要同它打道，也要“死马当作活马医”。更何况当时的蒋介石政府还有一定力量，还没有完全成为“僵尸”呢！

二　寻求与中共合作

美国开始酝酿和实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只是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其主要原因：一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封锁，使美国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及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使美国宁愿不去注意和关心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

虽然美国不重视中国共产党，但蒋介石却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陈兵数十万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其视为心腹之患。美蒋双方政策虽不一致，但蒋介石国民党对美国的政策却极为欢迎。这说明，美蒋双方政策在实质又有其一致性，这就是从根本上的反共态度。所以，蒋介石国民党就利用美国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的反共目的。

美蒋双方在中国的政策虽然从实质上看有一致的地方，但就

其现实的政策目标来看，不一致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要使蒋介石竭尽全力地对日作战；蒋介石的政策目标则是尽量避免对日作战，并积极准备消灭中国共产党。这种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必然引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

美蒋政策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构成了美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双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态度和不同态度，导致美蒋双方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演出了一场荒诞的悲喜剧。

1943 年 3 月，当美国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第一步行动，即中美（以及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后，蒋介石就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从理论上阐述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美国一开始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时，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其目标首先是支持和鼓励国民党对日抗战，更重要的则是使蒋介石的中国将来成为支持美国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蒋介石看到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可乘之机：既然战争的命运已经取决于美英等大国，战后的命运必将为美英等大国主宰，而美英两国，尤其是强大的美国决心支持国民党的中国，而不可能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就十分有利于蒋介石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虽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革命利益的一致性，而苏联也必将崛起，并且将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目前，苏联仍深深陷入战争之中而无暇东顾，这也有利于蒋介石赶在苏联转向东方之前，即能够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之前，彻底解决中共问题。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宣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外交”是什么？显然主要是对日抗战。“内政”是什么？显然主要是消灭中国共产党，即解决中共问题。多长时间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规定为“二年”。

蒋介石在书中提出一些重要论断，如“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边区是“变相军阀”和“新式封建”，必须根本扫除，等等。《中国之命运》的中心思想，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政治异己势力。《中国之命运》是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而做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不久，国民党就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浪潮。同时，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西北国共对峙的地区剑拔弩张。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浪潮显然极为不利于中国的对日抗战，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美英等国对日作战需要。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浪潮进行了批判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在《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指出：“蒋先生全书的精神，可以‘对内’二字概括之。但是我们知道，今日大好河山还沦陷敌手，即使英美已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那些东西都在沦陷区，不战胜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话。抗战前还极多困难，今日基本问题显然是对外——即共同对日，而不是对内——即准备内战。”[30]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行为也进行了压制。政府官员霍恩贝克奉命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说，有人认为美国和英国正怂恿中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希望避免纠纷，我们非但没有怂恿，倒是“十分谨慎地抑制自己，不促使中国政府在有关内政问题上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方针。”[31]与此同时，英苏两国，特别是苏联也表示了他们反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即发动内战的态度。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坚决抵制，以及美英苏的批评和压制，才阻止了这次国共之间

的冲突，才有了蒋介石在1943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认为“中共问题纯系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从而避免了一场军事争斗。

1943年夏季发生的这场国共关系危机严重冲击了盟军对日作战计划，引起了美英苏等国的强烈反应，促使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谋求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

实际上，在这次国共关系危机之前，美国驻华官员就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就致函美国国务院，详细阐述了他在华考察一年来的情况，并建议美国政府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抗战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他批评了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谢伟思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通过这些部队控制着的土地，可以得以进入内蒙古、满洲和日军的华北基地的通道。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会使他们的阵地战略重要性提高。……最近来自山西的艰苦战斗在继续进行的报道，显示出共产党军队仍然是一支使日军生畏的军队，以致激起日军进行周期的‘扫荡’。……日军在山西的活动和在那里遇到的困难，与其他大多数国民党与日军作战的按兵不动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谢伟思是较早发现国共关系危机的美国官员之一。他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壮大和国民党的不抗日并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为此，他提醒美国政府要“现实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考虑美国“给国民党大量军援，是否对中国有利，或者对美国自己有利”，并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这些军援不可能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而是可能用于内战，以便用武力强行统一全国。”

谢伟思第一次正式提出，要求“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

区”。他认为，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美国得不到有关共产党地区情况的消息；“我们得到的情况都是已经过时的几年前的东西，而且不论从范围和可靠性来说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美国不仅要派代表到共产党地区去，而且要他们在那里进行详细考察，即“不要求他们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而是要求他们应该有充分时间去熟悉情况，并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以便弄清下面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是怎样信守不渝地实践了他们的统一战线诺言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的结构如何？政府‘共产主义化’如何？它是否显示了任何民主主义特征或可能？它是否赢得人民的一般支持？它和国民党中国政府的情况对比如何？共产党怎样处理人民的这类事项的，即在征税、征粮、服兵役和强制劳动等方面，和国民党地区比较如何？共产党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对盟国事业可能有什么价值？为了继续抗战，他们怎样处理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和经济资源开发等问题？怎样进行对敌贸易？游击区人民的动员和觉醒是否已经达到支持一场真正的游击战所需要的程度”？谢伟思一口气列了十几个问题，显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深入了解它的迫切愿望。他在报告中提示，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奠定正确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若“没有诸如此类的知识”，则“很难评价互相矛盾的报道，并作出经得起深思熟虑的判断。”[32]

谢伟思的报告，可谓真知灼见。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纳了谢伟思的意见，及时弄清谢伟思提出的各种问题，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许会建立在更为正确的基础之上。但是，谢伟思的报告没有为美国政府所重视，而且被美国国务院官员斥责为“荒谬可笑”和“散布诽谤”。[33]

继谢伟思报告之后，另一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戴维斯也在 1943

年 3 月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除中共军队及美国训练和指挥的驻印军外，国民党中国军队皆士气低落，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他还认为，要获得日本军队在东北等地活动的情报，美国最好派军事代表团去延安，6 月 24 日，戴维斯又提出报告，阐述美国派军事代表团去延安考察的必要性。报告称赞中共行政忠实，公平选举，经济自由，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国民党政府任用私人及贪污皆为常事；国共两党如均无外援，国民政府将会被推翻。因此，他建议美国尽快制定一种积极的对华政策，以免使自己卷入中国的内争而不能自拔。他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34]戴维斯的报告也未能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直到七、八月份，国共磨擦严重影响了中国抗战，影响了盟军对日作战计划，甚至将影响战后远东的政治局势时，美国才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问题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已经走向成熟阶段。中国共产党近来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抗争，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挑战，即对美国全力扶持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的挑战。但是，应当看到，美国政府在 1943 年 8、9 月份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中共的合作问题。

1943 年 8 月底，史迪威在重庆曾同国民党将领邓宝珊，还同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和戴维斯等就同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商谈，并提出一项计划，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联合采取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施他们可能想逆长

江发动新的攻势或威胁长沙。[35]9月6日，史迪威给蒋介石写信，正式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共同进攻日军，并要蒋介石把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拨一部分给共产党的军队。信中说："我建议采纳这项计划，建议给西北地区的军队以充足的给养使之发挥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也不会损失军队，给养的损失也很少，它利用了否则便闲着没用的部队，它可以搞清西北的（共产党）军队的可靠程度。如果我们不行动，日本鬼子就将行动起来。"[36]但是，史迪威的计划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计划也未给予支持。随后，戴维斯再次指出，国民党显然几乎没有能力或不愿去担负盟国指派给它的任务；而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进步的中国政权则要靠华盛顿去支持史迪威的改革计划。他还给美国政府写信，指出，假使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改变现状，华盛顿必须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造就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例如，我们应当打定注意，避免在战争结束时处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和堕落的日本傀儡互相勾结以反对获得苏联同情的民主大联合这种地位。"[37]戴维斯的建议仍未能为罗斯福和美国政府所接受。在罗斯福看来，对蒋介石的支持仍然是他对华政策的象征和实质，蒋的胜利仍然是保证中国在将来成为大国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他不愿采取与中共合作的任何实际行动。

美国之所以在1943年8、9月份以后对中共问题表示关注，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因素。

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苏联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援助，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6月苏德战争和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美中关系日益接近，苏中关系则日益疏远。

从 1942 年至 1943 年，蒋介石政府，尤其是新疆统治者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的形势，认为苏德战争的胜利将属于德国，苏联将遭到彻底失败。这样，原来实行亲苏亲共方针的盛世才，便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决定反苏反共。1942 年 3 月，蒋介石派特使朱绍良到新疆同盛世才谈判。4 月，盛世才向国民党保证效忠于蒋介石，并逮捕新疆政府中的亲苏人员和中共代表。随之，新疆政府的亲苏人员和中共代表便被反苏反共的重庆人员所代替。1942 年冬，盛世才迫使苏联原驻哈密帮助中国抗战的红军第八团一部分人员撤退，而后又于 5 月迫使苏联军队经迪化（乌鲁木齐）、伊犁全部撤回苏联。这样，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走向恶化。

自 1941 年中期起，苏联由于全力以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无暇顾及东方问题，因而，一直对中国的抗战及国共关系问题保持缄默态度。当蒋介石和盛世才采取措施驱逐苏联在新疆的势力，使双方关系走向恶化时，苏联也进行了妥协退让，而没有公开对抗。然而，蒋介石得寸进尺，在 1943 年夏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悍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从而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7 月 14 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拜会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艾奇逊，指责国民党政府军向共产党的前哨站和阵地开火，企图迫使共产党接受它的条件。他指出，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时候进攻共产党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从而影响国际关系。8 月 11 日，苏联武官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对国共关系的担心，并希望了解美国的态度。[88]与此同时，苏联著名记者、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不力和对中

国共产党的进攻。

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罗果夫说："重庆固然没有公开主张投降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那里的投降派和失败主义者很少。投降派和失败主义者在国民党中占据重要职位，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而且在现在成为一个严重的危险……中国绥靖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帮助日本的这些计划，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的冲突。"

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进攻，罗果夫说："重庆将军们袭击八路军及新四军，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丝毫没有触犯他们，将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暗害，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坐收渔利，因为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再好没有的了。有些国民党著名领袖反对各种绥靖主义者、投降派及挑拨者的这种阴谋活动。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坚定地克服投降派这种旨在破坏民族团结及削弱中国对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动。"

罗果夫在文章中还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罗果夫说："八路军与新四军是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他们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荣的业绩。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由中国最进步最自我牺牲的人民所组成的。他们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中共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组织者，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39]

苏联的态度，特别是罗果夫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以及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三次刊载罗果夫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指出"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

一次对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大裨益。”㊵

苏联的态度特别是罗果夫的文章也引起了美国和蒋介石的共同忧虑。他们担心苏联在战后对中共的支持会影响美蒋在中国以及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尤其会影响罗斯福设计的战后计划。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政府除继续坚持“使中国成为大国”，即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既定政策外，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促进国共合作，二是促进中苏和解，即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的和解。

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在1943年9月所做的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讲话是其重要成果之一。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又同蒋介石亲自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必须在战争进行时期，就同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联合政府。”㊶开罗会议后，国共合作谈判正式开始。

关于中苏和解，罗斯福在1943年下半年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首先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做工作，以取得他们的谅解。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四国宣言》的发表，是其初步成果。12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又多次同斯大林商谈，希望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为争取苏联的支持，罗斯福甚至暗示可以用中国的领土权益做为交换条件。同时，罗斯福又劝告蒋介石不要听信苏联和日本已经同意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政权而发起一场进攻的说法，并劝说蒋介石在战争时期停止在外蒙古——新疆边界上同莫斯科发生冲突。㊷

美国政府在采取以上述两项措施后又逐步提出直接同中国共产党联络，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1944 年 1 月 15 日，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力陈尽快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必要性。报告说："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在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去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报告还指出，蒋介石"自然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所以，"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制服他。"㊸这一次，戴维斯的报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并决定采纳。2 月 9 日，罗斯福通过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立刻向西北派遣代表团；其理由是华北和东北是日军主要聚结地区，美军非常需要那里的情报。但他的建议被蒋介石婉转拒绝。3 月份，罗斯福再次向蒋介石明确提出派遣美军代表去延安的要求。这次他增加一条理由，即可以了解中苏在新疆冲突的形势。蒋介石仍不予理睬。直到 6 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代表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重提此案，蒋介石才被迫让步，同意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军观察组。

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决定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首先是要搜集华北，以至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情报。随着战争的发展，

美国空军在共产党地区上空作战和美国在沿海、如山东等靠近共产党地区的地点登陆的前景越来越近，需要军事情报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且，由于共产党越来越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和因素，看看他们能在中国抗战中起什么作用的想法也变得强烈起来。1944年以来，美国不断获得消息，说共产党军队在山东、河北、山西、苏北等地积极展开对日本的游击战，而且共产党已牢固地立足于华北，该地区是最后击败日军的关键地区；除满洲以外，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大部分以及日本人的工业设施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总之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和作用的强大，是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不力。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他手创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即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表示了怀疑。当时，他问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中国的局势是严重的，如果日军再来一次象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44]。1944年1月初，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对美国经济援助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或者同意充分承担中国军队在缅甸对日作战的任务。罗斯福写道：“根据已经得到的效果看来，给中国一笔贷款……是说不出理由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贷款，而且从中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贷款也是不妥当的。”[45]随后，罗斯福曾有过另外找人取代蒋介石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没有实现，但罗斯福以及美国政府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也已经认为蒋介石的中国无论现在或是将来，都不再可能成为“大国”。这一看法又为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所证实。4至6月份，日军从华北长驱直入华南地区，蒋介石国民党的百万军队望风而逃，一触即溃。当时许

多美国观察家都预言国民党要垮台，罗斯福和史迪威在1943年12月的论断就要实现。既然蒋介石国民党不能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尤其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寻求同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以美国的友好，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合作，以防止其倒向苏联一边。由于罗斯福认为，妨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来自苏联的干预或共产党的胜利，所以，他就力求拉拢这两方面的力量。他企图以美国同意苏联在满洲享有特权为条件，以换取俄国不卷入中国政治的笼统保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罗斯福就是带着这种如意算盘决定并派遣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以谋求同中共的联系及合作。

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及合作，是罗斯福亲自做出的决策，所以说也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是1944年上半年美国确立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上半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军事上的援蒋发展为军事、政治上的全力扶蒋。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虽然仍以扶蒋为主，但却逐步有了联系中共及寻求与中共合作的内容。尽管美国谋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基础是很脆弱的，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友好态度和与中共友好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说明美国确实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在谋求同中共合作。否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在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后正式做出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决策。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罗斯福总统没有把他的这一政

策明确形诸文字，但行动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以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为开端，美国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和实际交往，是美国谋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最好说明。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几天后，美国总统高级幕僚霍普金斯就根据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报告，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称赞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实行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可以同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信中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46]尽管罗斯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扶蒋政策，但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在1944年间，他却认为，扶蒋与联共是可以统一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其统一的基础：一是对日作战，二是美苏合作。直到1945年3月，当斯诺询问罗斯福："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斯诺指的是美国能否同时支持国共两党政府。罗斯福回答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他还表示，以后还要继续进行这样的合作，直到两党政府"凑在一起为止。"[47]

注　释

1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5——326页。

2　《赫尔回忆录》（第二卷），纽约1948年版，第1257、1583——1587页。

3 韦尔斯《影响历史的七项决定》，纽约 1958 年版，第 186 页。

4 《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687 页。

5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 348——350 页。

6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书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版，第 4——8 页。

7 《解放日报》社论，1943 年 2 月 4 日。

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第一册，第 159——160 页。

9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 600 页。

10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3 页。

1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14 页。

12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 607 页。

13 《德黑兰 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48 页。

14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 447——451 页。

15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 611 页。

16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24——128 页。

17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24——125 页。

18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24——128 页。

19 《中央日报》社论，1943 年 12 月 3 日。

20 戴维斯《抓住龙尾》，纽约 1972 年版，第 299 页。

2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43 页。

22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69 页。

23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 552——553 页。

24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506——507 页。

25 韦尔斯《影响历史的七项决定》第 151 页。

26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554——555页。

27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555页。

28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577——578页。

2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93页。

30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3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100页。

32 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1——178页。

33 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72页。

34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3年，中国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214页。

35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557页。

36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86页。

37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2页。

38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99——100页。

39 《战争和工人阶级》1943年8月8日。

40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

41 理查德·桑顿《中国政治史，1917——1980》，西方观点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页；《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0页。

42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99页。

43 伊·卡恩《中国通》，新华社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130页。

44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577——578页。

45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55页。

46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1页。

47 《斯诺文集》之一：《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页。

第 二 章

毛泽东确立联美拉蒋战略（一）

一 “迪克西使团”

1944 年 7 月 22 日，一架美国飞机从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重庆，飞往共产党红色首都——延安。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飞机第一次飞赴延安，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正式联络与合作的开端，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乘坐这架飞机去延安的是以为包瑞德上校为首的一批美国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①政治顾问谢伟思。他们就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派遣的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美国人则称之为“迪克西使团”。②

“迪克西”，原来是指 19 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反叛各州。这里则是指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区。使“反叛者”——中国共产党“归顺”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本意。

美军观察组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并由他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而由谢伟思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了解华北日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同时探索美国与中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解的可能性。观察

组所接受的指令共19条，大部分是要求了解华北日军、汪伪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要求做出“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并探索“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③

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之前，以美英两国记者为主的中外记者团也于6月9日抵达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地区进行采访和了解。中外记者团先期来延，是美国寻求同中共联系与合作的前奏。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双方就汇合一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互相配合工作。

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中外记者团，特别是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参观和考察，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联系及合作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而撰写的社论中说：“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表示相信，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掰划，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战胜日寇的过程”。④随后，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认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为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的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⑤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基本方针：第一，积极主动地帮助观察组成员做好工作。

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要回避，并担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外交原则。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国民党那种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而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要搞得铺张浪费。第三，他们在延安要长住下去，因此必然会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建立友谊。但是我们必需时时提醒他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任何外国必须尊重我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人格。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⑥

中国共产党接待美军人员的基本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涉中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二者巧妙的结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与国民党政府在与美英等国交往中的奴颜卑膝适成显明对比。随后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本着上述方针，同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与合作，为实现毛泽东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实际上，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之前很久，毛泽东就产生了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思想。早在 1936 年 6、7 月份，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深刻分析了远东局势和由于日本侵华引起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世界上一切爱

好和平人民的敌人，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着这些国家的。”毛泽东还认为，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太平洋诸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所以，这些国家都是朋友，都应当“一同合作”，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也批评美英等国曾给予南京国民党政府大量援助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而不用于抗日，指出，“如此的帮助，在我们看来，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团结革命人民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只有那时，这样的援助才会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言外之意，美英等国的援助应当给予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联合任何国家，以缩短这场战争的时日”。⑦毛泽东展望战后局势，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⑦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深刻而及时地阐明了中共对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同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思想的初步提出，并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呼吁。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随之，苏联对中国抗战给予了有力援助。它先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贸易协定》，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援助。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撰文赞扬苏联给中国人民的友好支援。但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美英等国奉行“不干涉”中日战

争的政策，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援华抗日，而且在1939年前后还一度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毛泽东对英美的这一政策曾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的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思想当然不可能实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在国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在外交上，“同苏英美等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⑧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与英美的合作。战争爆发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电示周恩来等，说“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之政策，应当是建议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并要求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⑨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起而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决心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牵制敌人，以配合英美的作战。⑩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指示还说明，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毛泽东与美英等国合

作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周恩来在重庆与驻华官员联络和会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希望同美英等国，特别是同美国合作。1942 年 5 月下旬，周恩来在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华的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初夏，周恩来又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日的决心。在戴维斯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时，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⑫11 月 20 日，周恩来和林彪一起同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和文森特会谈，表示希望美国采取如下对华政策：（一）运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改变目前国民党对日抗战不力的状况；（二）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三）承认中共是对抗法西斯作战的有力参加者；（四）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应拨一部分给中共。⑬

然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未能为美英等国及时接受。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它的援助却只给予蒋介石国民党。因此，虽然在 1942 年初，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但由于蒋介石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美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因而不能不使刚刚建立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存在很大缺陷。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缺陷极为不利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不利于联合国家的对日作战。美国逐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 1944 年 6、7 月份迫使蒋介石政府允许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

不管美国派出记者，特别是派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出于什么目的，但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中国

共产党热烈欢迎美国的这一举动，并把它看作是双方走向真正合作的开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美英等国进行直接而又全面合作的愿望是迫切的，态度是真诚的，气魄也是雄伟的。这种愿望，这种态度、这种气魄，表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的一系列谈话中；表现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表现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前后，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上。

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首先从战略高度指出中国与英美合作的必要性。他说："中国不能只限于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英美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又说："中国的进步倚恃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跟各国热诚合作和帮助它们克服它们的分歧才能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⑭斯坦因对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非常欣赏，他指出："延安的领导者们对于密切的中美关系和密切的中英关系的看法十分现实，也十分敏锐，所以他们不要求中国采取单一外交政策或者是特别依赖苏联。"⑮

朱德在同斯坦因的谈话中则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同美英等盟国进行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的重要性。他说："在敌后的我们军队和抗战根据地只要能够对盟军有所助益，盟军可以随便利用。我们欢迎任何盟国代表到那些地方搜集他们所想要的关于我们兵力、根据地和我们能给盟军比我们七年来对日斗争期间更多的援助的证明。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有许多方法可立刻使我们对于盟国的目的发挥更大的作用。⑯朱德说：中国抗日战争需

要盟国帮助，同时盟国也需要中国抗战，这是相互帮助。⑰

朱德在同美国记者福尔曼的谈话中还表示了他对美国总统的信任，相信他一定会帮助象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民主势力。朱德说："我们对罗斯福总统怀着信任，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会帮助中国的民主势力。他不是一个孤立派。我们熟知他的表现于太平洋战争中的人道原则"。朱德又对福尔曼说："为拥护战后世界的民主原则，美国应该帮助中国的民主势力——而不是独裁势力"。朱德的意思是，美国对华政策应当是援助象中共这样的民主势力，而不是象蒋介石那样的独裁势力。朱德还提醒美国记者："你们美国人在你们的独立与民主战争中也受到外国人的援助呢！我们要请求你们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当福尔曼问道，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准送来盟国给予中国的战争物资援助，中共是否准备和英美军事当局谈判呢？朱德回答说："为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更加快些，我们需要我们的盟军的援助，因此，如果他们证明是愿意和我们直接谈判的话，我们自然十分高兴，欢迎这种机会。"⑱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同英美等国记者以及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都表示希望建立指挥中国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盟国合作的诚意和气魄。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建立盟军司令部，而只想要外国顾问。但我们愿意要"。⑲周恩来说，在中国设盟军最高统帅，"统帅必须是美国人，并且完全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假如得到中央政府同意的话"。⑳朱德更进一步强调："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只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中国一切部队的平等待遇，""唯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抗敌的一切武力和克服统一指挥的一切妨害，这一切妨害在过去曾大大阻碍了我们的抗敌方式。除此之外，中国军队没有别的配合

方法”。他还说：“中共领导的一切军队愿意忠恳地服从盟国统帅，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尽速得到完全的胜利。胜利的最好保证是由一个盟军统帅指挥中国一切军队”。⑳

鉴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气量狭小，既不愿接受盟军统帅的指挥，更不愿与中共军队一起共同接受盟军统帅的指挥，英国记者斯坦因询问朱德，中共愿意接受盟军统帅指挥是不是感觉丢脸。朱德回答说：“不，一个美国总司令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在中国人民和我们自己的官长与士兵心里，不会引起丢脸的问题。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欢迎有个盟国最高统帅，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蒋介石的指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破产了。再说，英国军队和人民不是曾甘心服从一个美国统帅的指挥进攻德国么？”㉑毛泽东和朱德都认为，这种指挥不仅不会损害国共关系，而且有利于双方的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朱德说：“有个盟军统帅团结中国一切军队从事可能的最大的作战努力，同时间接可以奠定战后中国团结的基础。而且以民主为基础的举国团结对于胜利的中国是最主要的”。㉒

斯坦因对中共领导人的这些军事方面的建议也十分赞赏。他指出：“我见到许多中共军政领袖，各级军官和八路军许多单纯的兵士所表现的跟盟军充分合作的热情。他们为了早日获得战争胜利和帮助盟军减少生命损失，需要他们什么样的牺牲，他们都甘心拿出来。他们这种甘心使我感动，他们的甘心是纯真而可靠的。因为我觉得在战时和战后跟盟国合作就是中共拟议的对中国的现实计划的基础”。㉓

中共领导人在向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畅谈中共与美英等盟国合作的必要性时，还做出重大决策，正式确立了中共与美英等国，主要是与美国进行全面合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1944 年 8 月 18 日，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发出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在科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所处的地位以及美英等国对中共的态度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与美英等国合作的范围，合作的原则以及合作的方针和方法等，做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定。㉔

指示所规定的中共与美英等国合作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其中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宣传、宗教、经济和救济等各个方面。在军事方面，指示规定美英等国军事人员和武装人员，在取得中共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可进入中共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中共协助，同时中共也欢迎盟国提供军火物资和技术上的援助。在政治方面，中共欢迎盟国在中共地区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在文化宣传方面，中共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安，并给予到各地访问的便利；对敌军民宣传，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中共实行政教分离，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学房产。在经济方面，中共在互利原则下，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在救济方面，中共欢迎美英加拿大等提供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在给中国援助时必须算入共产党地区的八千万人口。这样一种全面合作的方案，是毛泽东在 30 年代后期就开始产生的与美英等国合作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指示所规定的中共与美英等国合作的原则，是“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既反对中国近代义和团事变前的“排外”观念，又反对义和团事变后，直到国民党政府的“惧外”观念；指出，“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

的民族立场。”中共的这种立场与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媚外或惧外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指示所规定的中共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方针和方法则是十分灵活的，与国民党狭隘、僵硬的外交方针和方法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是指导当时中共与美英等国合作，以至后来对外交涉的纲性领性文献。这一指示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正式确立。

指示发出后，全党就开始了与美英等国，主要是同美国的合作工作。

在指示发出之前，中共与美英等国在军事上的合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早在1944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指出，“与美之进步人士可交换情报，但必须机密，如史迪威总部愿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派人至台上工作，并用他们的密码”。㉕随后，双方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美国空军在华北和华中敌后执行轰炸日军后方的重工业基地和运输补给线的任务；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担负起救援和保护空中盟友——美国飞行员的使命。5月7日，鄂中洪湖地区新四军部队营救飞机失事的美军飞行员柏莱德中尉，两日后又营救美机师叶里洛拉。26日，华南游击队东江支队在大亚湾救出美军飞行员6人。6月上旬，晋察冀八路军又营救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机在正太路轰炸日军列车时受伤降落的白福里欧，对被营救盟军给以及时治疗，伤愈后交还美军，美方表示感谢。当时，被救的飞行员对中共地区军民的友好合作几乎交口称赞。有一个名叫辛仲连的美军飞行员在八路军举行的欢送会上致词说：“以前

我在大后方听说你们是‘匪军’，今在贵军两个多月，所见所闻，才知道以前听的全是谣言。你们在敌后艰苦奋斗，正是抗战最坚强的部队。”㉖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底被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军飞行员达44名之多。㉗

在敌后根据地营救美军飞行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发出的报告记载，当时被救的美军飞行员所走过的路线除了山东半岛之外，包括了所有主要共产党根据地。㉘某些美军飞行员从他们被救出的地点算起要在共产党控制区旅行达一千英里。某些飞行员在共产党保护下，从山海关附近的沿海地区，绕过北平，到达延安。另外一些在苏北沿海着陆，他们的旅行横越了苏皖两省。还有一组飞行员正好落在与南京隔江相对的地区并被带到山西。共产党在邻近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地区都救过飞行员。这些地方都是日本在中国的重要基地。而且飞行员能在距日本飞机场或碉堡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安全降落并得救。有时，美国人安全地穿越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有一百多次。美国人在沿途经常受到公众的欢迎，并参加群众大会和发表演说。这些遇救的飞行员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一样，对他们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军队都印象良好。

美方对中共的友好合作态度极表赞赏。美国驻中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感谢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营救多名美军飞行员。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致函朱德和彭德怀，对中共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在重庆的陈纳德将军曾派炮兵少校欧高士等到鄂中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向中共提出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合作：（一）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在目前，主要是建立汉口附近的无线电网；（二）要求中共

提供敌军情报，凡有电台站，均设专人一人，专门接收译发中共的情报，俾能随时与轰炸敌人后方补给线联络；（三）磋商在中国沿海各地，美国海陆军登陆，新四军与美军协同配合作战。[29]美方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6 月 21 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等并告华东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和饶漱石，要求告诉欧高士少校，“彼所提三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并指出：“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30]9 月10 日，毛泽东又和刘少奇一起联合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曾山，强调与美军合作的重要意义。电中说：“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因此，电中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31]

后来，美军观察组成员对这一时期中共与美英等国的合作，进行了综合论述：“不管怎样，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许多方面（诸如获取情报、审讯战俘以及得到轰炸目标的资料等方面）得到共产党的合作都是热情的，迅速的，在他们的条件限度内是有效率的。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要求，使我们获得下列多种情报和便利：为美国官员提供参观游击区和观察他们部队作战的机会；他们如何对待和利用日本战俘；他们对日本人和伪军的心理战方法；经济资料以及政治组织情况等等。考虑到他们根据地和军队的分散以及通讯联络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情报看来是真实可信的。我

们从未遭到拒绝，也从未有人示意要我们承诺作出补偿。人们很容易说，尽管如此，他们仍希望美国回报以支持。但是，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国民党，他们十分明显地缺乏这种热情合作的态度。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许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个人表示出的坦率真诚的友好态度。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在延安或在前沿地区，在老百姓、八路军战士、政治干部中或党的领导人中，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比比皆是，不可能是经过导演做给我们看的。"[32]这篇论述，可以说是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肺腑之言，是应当给予充分注意的。

综上所述，在 1944 年 7 月前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与美英等国合作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为契机，开展了与美国的广泛合作。论述合作的必要性，制定合作的政策以及落实合作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三个步骤。在这三个步骤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迫切愿望、真诚态度和雄伟气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象中国共产党在 1944 年 7 月到 1945 年 3 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3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 1944 年 7 月前后正式并实施与美国合作的政策，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因为这一合作符合毛泽东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说明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从客观上来说，主要是因为美国在这时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友好，在中共看来，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就是这种友好的标志，因而使中共与美

国的合作成为可能。主观愿望再加上客观因素，或必要性加上可能性，才使得中共联美政策得以确立并实施。

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施与美国合作的政策，绝不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美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日抗战原则，而是恰恰相反。在此之前，蒋介石国民党也确立了联美政策，但它却建立在完全依赖美国和基本丧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位的基础之上。所以，双方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在 1944 年 7 月前后确立并实施与美国合作的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愿与一切对我友好和待我平等的国家合作并实行开放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和行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合作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逐步走向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逐步走向联美的道路。到 1944 年夏，双方终于走到了一起。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就是双方走到一起的标志。

然而，在 1944 年夏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时，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相互联系及合作的政策，在程度上绝不是一致的。就是说，双方的合作态度、政策目标和政策基础都有很大区别，都不是在同一水平上，甚至大体相当的水平也谈不上。

就拿合作态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愿望是迫切的，态度是真诚的，气魄也是雄伟的。而美国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及合作，不仅带有很大试探性质，而且由于其固有的反共偏见，对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感。

再拿政策目标来看，双方的近期目标有一致性，都是为了联合抗日。但双方的远期目标却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远期目标，是要促使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扶持，战后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或中国共产党参加其中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而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独立的新中国。美国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远期目标，则是在战时和战后继续维持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并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在战后建立一个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依附于美国的政府，从而实现美国控制中国，进而控制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两种目标显然是对立的。

双方合作态度、政策目标的不同，其根源在于政策基础的不同。从政策基础来看，双方的共同点也是有的。如果没有，恐怕双方根本走不到一块。中国共产党和美国都能在对日作战中，即在军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双方合作政策基础的共同点。另外在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方面，也存在某种共同性。但是，双方政策基础的不同点，特别是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不同点却是相当大的。总的来看，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基础十分脆弱，而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基础则相当坚实。

从军事基础看，美国从 1943 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从 1944 年春以来，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促使美国走向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直接原因。但是，在 1944 年夏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及其潜在作用的估计仍然是不充分、不深刻的。正如美军观察组的一份报告所说："甚至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与共产党军队司令部建立了直接联系之后，对于共产党声称他们有效地控制着名义上由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中的农村地区的说法，观察组还一直迟迟不敢相信。"

但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美军观察组改变了看法，并由此得出结论："（一）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我们过去对'日本占领区'的看法应该修正。日本人仅仅掌握了一付没有肉的骨架，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是由我们一边的军队控制的"。[34]经过考察，美军观察组对中共军队的印象也是良好的，他们的一致意见是：中共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良好、服装整齐、饱经战斗锻炼的志愿部队，它有良好的体质、很高的智力水平和非常高昂的士气；尽管这些部队的训练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差得可怜，但考虑他们现有的能力，训练还是相当好的。应当看到，美军观察组的这些看法没能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所很好地理解。他们始终怀疑，"共产党由于装备训练不足，是否能够或愿意对装备好得多的日本人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35]这种怀疑势必会影响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坚定性。

从思想基础看，美国确立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并不是要实行主义上的合作，而是实行主义上的排斥。美国同中共合作，并不是希望他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希望它从根本上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美国认为，特别是美国当权者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也就解决了双方合作的根本问题。当年美国就是以这样的顽固偏见来对待中国共产党的。而且，当时美国从上到下还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改革者，因为他们所执行的只是土地改革、自由贸易等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所以，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极力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接近并合作。应当说，美国人上述论断所说的原因是正确的，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这一错误

结论表明美国人并不理解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人要中国共产党尽快放弃共产主义的愿望。既要同中共合作，又没有思想上的障碍，岂不两全其美。这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美国人就爱这样去幻想。不仅政府领导，而且普通民众，甚至许多真诚希望与中共合作的美国友好人士，在1944年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都曾天真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过取消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们的理由常常是这样："你们不象是普通所谓的共产党，只是社会改革家，并且你们正把你们的政治制度叫做新民主主义。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适当地改一下，会使我们国内的人士更易于了解你们的真正的目的和将来的企图，我们国内的若干人士对共产党这个字眼，就很疑虑。这会便利于盟国和你们武装合作，进行反日战争。"[36]在延安的英美记者斯坦因和福尔曼等人，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等人，直接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在重庆的一些英美人士则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反复质询这一问题。

总之，认为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截然对立，认为坚持前者就应当放弃后者，这就是美国在1944年确立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时所形成的错误观念。用这一错误观念指导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产生这一错误观念的根源还在于美国固有的反共偏见。他们不仅害怕中共当前实行共产主义，而且担心将来实行共产主义。因此，中共宣称目前所实行的政策，虽然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并不能保证中共将来不实行共产主义。所以，美国人就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改变名称，从根本上放弃共产主义。这就是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思想基础。

从政治基础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及合作，并不是要使中共占据中国政治的中心地位，而是要通过这种合作，加强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从而根本避免中共占据中国政治中心的可能。正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1944年8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不是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力量在全国得到胜利。他现在希望蒋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以便能争取多数的拥护，来和我们对抗。他决不放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领导，决不放弃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权力。如果蒋的法西斯政治不能适应美国的需要而变化时，美国现在是有力量扶植一个完全执行美国政策的政府的。"所以，报告说："我们不能幻想蒋倒台后，美国会自然的承认我们是中国政治中心。我们要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斗争的过程"。[37]

在分析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政治基础时，还必须看到，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对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影响。虽然美国在1944年确立联共政策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及其所实行的政策上可能与苏联有区别。但它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却是依附于苏联，并受苏联控制的，这是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美国也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减弱了对中共的控制，但它认为，这种控制并没有消失，依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目前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较有生气的力量，可能最终会赢得一场内战，而让一个受苏联控制的党在战后统治中国，这并不是美国投入对日作战的目的，因而，在苏联还没有介入中国事务之前，就促使中共接受美国的影响和国民党的

控制，显然是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的。在这里，美国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循它的决议和服从它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依附于苏联，并听从苏联指挥和控制，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美国不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了解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现状所致。以这样一种错误的政治理论为基础而制定的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难道不会出问题？

以上从军事、思想、政治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制定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军事基础、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都是十分脆弱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美国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基础的脆弱性。为进一步坚定美国与中共合作的信心和消除美国对中共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与美国进行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则通过与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接触和交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坚实基础。其中主要是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重要意义。

在军事方面，针对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及其潜在价值的估计不足，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向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阐述了中共军队在配合美英等国盟军对日作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于“拥有人民的支援”，所以，特别“能够战斗”；而且，由于“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们是内线；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所以，美军如果在中国登陆作

战，与中共部队合作的价值和前景是十分可观的。[39]

朱德则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泽东，通过英美记者，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阐述了中美合作抗日的必要性。同时，他还从时间的现在和将来，空间的陆地、海洋和天空等各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抗日的军事基础。朱德说："我们有正规军47万5千人，民兵230万人，还有敌后到处散布的坚固的作战根据地，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武力和根据地大大帮助盟军在中国的反攻。"因此，他认为，在陆上，我们能在中国各地使盟军登陆易于进行，因为我们控制着相当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在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日寇在这四省沿海占领的地域大部分至少跟我们已经巩固的一个内陆根据地毗邻，而且已经成了我们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在海上，我们可以在沿海水上和盟军进行一些合作，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军队到了海上许多地方，他们征服了海盗，用政治教育把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抗日战士，这些在沿海滋扰数百年的、人所不齿的分子负起了海上游击队的新任务，而且知道怎样和我们陆上游击队与正规军配合来实践他们这项任务；在空中，我们对于盟军轰炸任务的成功能贡献重要的帮助，因为在敌后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差不多包围了华北、华中每个可以想象的目标：日寇盘踞的大城市、工业工厂和交通线；在一切日寇的占领中心都有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盟国飞机从中国根据地起飞到满洲、朝鲜和日本，所经之地有许多是我们的地区。总之，朱德认为："我们能够随地帮助盟国远征军在全国领土上推进。我们能够有效地保护盟军的两翼。对于这个任务，我们有特别好的准备。"朱德指出，中共与美英等国盟军的这种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从战略上看，盟国需要三种武力：一是专门化机械化的武力如重炮、坦克、飞机等；二是陆上正规军和主

要战线上所用的步兵、骑兵等；三是数目众多的组织良好的富有经验的游击队。在此，“游击队必须担任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所以，从战略上讲，“我们在反攻中的作用将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敌人广大的后方打击敌人。但是在战术上说，我们绝对能够在主要的攻击战场上帮助盟军地面部队”。[39]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对日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能与盟军积极配合，那么，美国与中共在军事上的合作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共联美政策的军事基础。

在思想方面，针对美国希望中共放弃共产主义、改变共产党的名称问题，无论延安的中共领袖，还是重庆的中共代表，都向英美人士答复说，他们既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也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因为他们是，而且继续愿意是共产党。[40]当美国记者福尔曼建议毛泽东将共产党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甚至其它某种名称时，毛泽东的答复是，共产党名称是往日沿袭而来，但他表示不能改变这个名称。他指出：“我们或其他人将我们的制度或我们的意识称作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我们突然改变成某种其他名称，今天，在中国或外国那些欲利用这一点的人，就会指责我们企图掩盖什么。不，我们不能，也不必改变名称，……重要的是内容实质和实际，而不是标签！”[41]当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也向毛泽东提出改变共产党名称时，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也曾想到过改变名称问题，但是他说，如果人民都知道他们或了解他们，那就不会担惊受怕了。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如果美国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策，那就不会害怕共产党这个名称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什么政策会使美国人感到放心呢？毛泽东向谢伟思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减租是从旧的 80%—70%—60%减到法定的（国民党法律从未

实施的）37．5%。即使这个数字我们也只是想逐渐实行，因为我们不想把地主赶走。我们的利息限制在年率10%。这不算过激的——虽然它比通常情况低得多。”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42]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非要中共改变名称不可？

毛泽东也向英美人士指出：“象别的国家共产党一样，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43]周恩来也指出：“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相信在遥远的将来中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44]

但是，毛泽东提醒英美记者和美军观察组，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主义和所实行的政策，首先要弄清以下三个区别：第一，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或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思想方法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第二，要把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区别开来；第三，要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与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

关于第一种区别，毛泽东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把这种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相区别。这种制度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最后政治目标”。

关于第二种区别，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上，这必须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因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更具体一点说，当前中国的需要有三个：（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使人民获得一切近代各种自由，以真正的自由的普选，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三）解决土地问题，这可以使进步性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利用现代生产技术，改

善人民生活。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在现在，这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高谈社会主义，只是空谈。这就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里，我告诉我们党员的东西。那里我已经说过，中国革命的这一民主阶段，决不是短期的。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不能和眼前的现实条件脱离。"在这里，毛泽东甚至向英美记者说："我们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的时间。"然而，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是不能分割的。"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㊺

关于第三种区别，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福尔曼说："我们不是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毛泽东进一步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所以，"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承认，我们确实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在"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个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

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毛泽东还讲到中共所建立的政府结构与苏联也不一样。他向福尔曼说：“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象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不大相同，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对福尔曼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㊻

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式共产党的论断作了进一步阐释。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最终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社会集产主义——不过这我不相信在中国能达到除开在久远的未来时期。她将有着各个阶段。举例来说，就个别生产的基础来说，我们采取互助或劳力交换的方法，而并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立即与严格的建立”。那么，中共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呢？周恩来说，从经济上看，中共一方面从私有的原则，希望走向大企业——如交通系统，银行与军事工业的国有化；另一方面，要从减租减息进展，达到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最后达到土地国有。从政治上看，中共根据一切社会阶级有同等选举权，使大多数人——劳动阶级——获得选举权。其目的是使少数人统治成为不可能。这就是包括于‘三三制’中的精神。在对外关系上，中共将在平等条件下争取国际和平与合作。“总括起来”，周恩来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新民主主义。它也包括于革命的三民主义

的纲领内，如过去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中所加以解释的一样”。[58]

总之，毛泽东通过这三种区别说明：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但只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方法，而不是要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但只是把它做为一种遥远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才是建设中国的当务之急；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但这绝不是苏联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既然如此，信奉民主主义的美国要与中共合作，完全不用害怕它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二者完全可以实行主义上的合作，而不应搞主义上的排斥，从而影响或放弃合作。

毛泽东在阐述三种区别时，还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方面说明美国与中共是可以合作的。毛泽东向英美人士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是“批判地吸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不仅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等。[47]既然中国共产党不排斥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不排斥民主政治思想，那么，为什么美国不能与中共很好地合作呢？

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思想基础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论述了中共联美政策的政治基础，即中共目前所实行的是完全可以与美英等国资本主义进行充分合作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的一列理论和政策。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从政治外交战略的角度，论述了美国与中共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重要意义。首

先，从苏美关系看，中国共产党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的，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能够而且将不顾偶然的困难在平时象在战时一样学习密切合作”。[48]中国共产党还相信，“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些影响是建设性的民主性的。苏美在中国不会有可能的冲突点”。[49]其次，从中苏关系看，国民党政府由于其对苏联意识形态上的憎恶，使它不能看清苏联的目的和国际地位。这种憎恶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一种强烈的反苏偏见，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所以，毛泽东说，“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与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重庆政府认为从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之间的异见的加剧中可以得到便宜，这是很危险的。”因此，美国要同国民党合作，必然会引起麻烦，既不利于美国自身利益，也不利于苏美合作和世界和平。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苏对美态度都是友好的，而且只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独裁政策，实行民主改革，中共也会支持它、拥护它，所以，“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向英美等国记者提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苏联和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桥梁之一”；并且说，“中国的进步倚恃世界和平，只有跟各国热诚合作和帮助它们克服它们的分歧才能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50]很显然，要实现这一目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是根本不行的。上述论断是毛泽东对1944年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尽管后来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论断，但却不能否认这一论断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它表达了毛泽东希望与美英等国合作的诚意。

在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政治基础时，毛泽东和中共

领导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联美政策的思想基础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51]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福尔曼说："中国的发展不能与苏联走同样的路线。"[52]中国共产党从他的实际行动中表明自己是不依附于苏联的，是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还严正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57]毛泽东关于不依附于苏联的表态是为了打消美国方面在制定联共政策时所存在的顾虑。但他关于中共既不依附于苏联，又不依附于美国的基本立场与美国统治集团企图通过控制国共两党以实现控制中国的目标却是不相一致的。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真诚愿望没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源所在。

除军事基础、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外，毛泽东还向英美人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经济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但是，毛泽东认为，苏联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因为苏联"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苏态度。如此，中国与美国合作将更为有利。而且，美国与中国合作，将主要是同中共的合作，因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将欢迎它"。因此，"美国无须担心我们

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们必须合作，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53]·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军事、思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确立联美政策的基础是异常坚实的，是不容易动摇的。以后的事实将充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关于中共联美政策基础的一系列论述得到了中外记者团，特别是英美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中外记者团的英美记者们通过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美英等盟国合作的诚意，传播了他们关于联美政策基础的一系列观点及其与美国合作的重要事实。美军观察组则根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思想及实践，不断向美国政府发出报告和提出政策建议，希望美国与中共积极合作。其中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的报告和建议最为突出。

1944 年 8 月 3 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仅有 10 天时间，谢伟思就从思想政治方面说明，美国与中共是可以合作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宣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根据这一观点，还不能从目前中国初级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和至少经过受调节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所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立即废除私人资本，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现在还没有无产阶级；也不意味着农庄集体化，因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还不足以

克服他们耕种土地的原始个人主义的愿望。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帮助”。[54]

8月底和9月初，谢伟思根据毛泽东等向他和英美记者们所阐述的中共联美政策的基础，先后两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说明美国与中共合作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作用，提议美国尽快与中共合作。谢伟思指出，美国陆军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部队合作，但是，“迄今这种合作在我们来说是被动的”，只是“收听共产党的情报和营救美国空勤人员”而已，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合作，“今后应当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种积极的合作，将以我们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他们非常缺乏的基本军事供应开始。还应训练共产党军队有效使用这些供应来支持合作。随着中国的战争发展进入末期，应计划使合作走向共军与美国空军和其他地面部队之间实际的战术合作”。如果有了这种合作，从政治上看，向国共两党同时提供援助，“至少会使一支部队，即真心实意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具有战斗力，”并且“几乎肯定会使国民党发动一场内战成为不可能”，也许还“可以尽力促使国民党走向改革”。从军事上看，由于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沿线及紧靠交通线的地区都扼守着战略据点；共产党部队都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他们在有关地区内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大规模和持久地进行这种战斗所必需；他们的物质必需品都是简单轻便的，凭着这些可快速行军；……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与共军直接或间接合作抗日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总之，谢伟思认为，中共既是一支军事力量，又是一支政治力量，美国给共军的任何军援，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都定会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55]

9月28日，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又从思想、政治、经济几个方面说明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谢伟思认为，在思想上，中共不是教条主义地搬用俄国共产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一度有过的对苏联的倾向看来是一件过去的事了，现在他们正努力使他们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他们正在实行民主政策，并期望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和工业化，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外援来实现，在这方面，美国，而不是苏联，将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经济援助的国家。因此，谢伟思的结论是："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但他也提出警告：中国共产党诚心与美国合作，并"不排除他们重新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攻下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59]

谢伟思的报告和建议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关于中共联美政策基础的一系列论述，也代表了美军观察组和大部分美国在华官员和记者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与前述美国政府确立的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基础是有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美国政府确立的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基础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那么，谢伟思的报告和建议所阐述的意见则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谢伟思的报告和建议主要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注　释

1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所设，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统率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队和蒋介石政府划派给他的部队。

2　1944 年 7 月 22 日到延安的是第一批，8 月 7 日第二批人员抵达延安，共同组成美军观察组。

3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32 页。

4　《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5 日。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73 页。

6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68 页。

7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2—193 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6 页。

9　1941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

10　《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0 日。

11　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31 日。

1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32—533 页。

13　《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中央日报社 1977 年版，第 78—79 页。

14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3—304 页。

15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303 页。

16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97 页。

17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5—266 页。

18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00 页。

19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14 页。

20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94 页。

21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94 页。

22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94 页。

23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95 页。

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 573—576 页。

25 1944 年 1 月 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董必武的指示。

26 马齐彬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6 页。

27 《晋察冀日报》1944 年 12 月 26 日。

28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6—188 页。

29 1944 年 8 月 15 日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致毛泽东、朱德、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

30 1944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致李先念、郑位三、任质彬、陈少敏告张云逸、饶漱石电。

31 1944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方针问题的指示。

32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234 页。

33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217 页。

34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188 页。

35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190 页。

36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20 页。

37 1944 年 8 月 16 日南方局同志对外交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

38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57 页。

39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86—192 页。

40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4 日。

41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 1957 年英文版，第 243 页。

42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0 页。

43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33 页。

44 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 1946 年版，第 104 页。

45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23—24 页；又见重庆《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4 日。

46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8—200 页。

47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09 页。

48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303—304 页。

49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0 页。

50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303—304 页。

51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33—34 页。

52 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第 104 页。

53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0 页。

54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21—225 页。

55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71—279 页。

56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1—269 页。

57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5 页。

58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201 页。

59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191—193 页。

第 三 章

毛泽东确立联美拉蒋战略（二）

一 延安协定草案

自 1931 年日本侵华以来，中国共产党曾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势，制定过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不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推动下，1936 年和 1937 年间终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联蒋抗日政策，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展。但是，在 1939 年底和 1941 年初，由于日本政治诱降等原因，蒋介石国民党却先后发动两次反共磨擦，使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美英关系的好转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国共关系的和解，有利于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使蒋介石看到，由于美英等国参加对日作战，日本必将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瞻望日本战败后的中国，谁主沉浮？在战争中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令人担忧。过去，由于美英等国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日作战。但在抗战中，国民党却损失了不少力量。现在，既然有美英等大国参战，那就让它们承担消灭日本的任务好了。国民党必须保存实力，

以便在战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较量。早在1938年底日本占领武汉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就确立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虽然有所好转，但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实行上述政策。1942年底和1943年初，美国开始实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即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将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提前来到。他在1943年夏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磨擦。虽然这次反共磨擦在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击和美英等国特别是美国的直接干预下而被制止，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针对蒋介石民国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坚决抵制和斗争，另一方面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努力推动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逐步确立了拉蒋抗日政策。1944年2月，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①4月初，毛泽东又和朱德、彭德怀一起致电罗荣桓等，明确提出拉蒋抗日政策。电报中说：日本最近已将库页岛权益交还苏联，“北和苏联，南抗英美，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因此，日本与蒋介石的冲突，“今年必更加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电报中认为，罗荣桓等部大举打击国民党的部署“极不合宜”；除非国民党部署进攻，“我可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其具体作战，亦须取得中央同意”。②应当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拉蒋抗日政策与抗战初期的联蒋抗日政策是有区别的。联蒋，是因为蒋正在走向抗日阵营，或对抗日还有一定的积极性。所以，中共愿与其合作，并肩作战。拉蒋，是因

为蒋正在脱离抗日阵营，或对抗日已基本丧失了积极性。所以，中共要紧紧拉住他，不让他脱离抗日阵营。联蒋，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拉蒋则更难一些。但是，联蒋和拉蒋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要促使蒋介石留在抗日阵营内，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6、7月份，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政策正式确立并实施。这样，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政策就和拉蒋抗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内政和外交的正确方针。

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是国民党的政治战略，但这并不排斥国民党在局部或具体问题上的对日作战和与中共合作。毛泽东的拉蒋抗日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它也不排斥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或具体问题上与国民党的斗争，甚至军事上的反击。

如果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抗战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派政治势力，那么，日本侵华势力、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鼎足而立的三家。他们都分别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府和自己所统治的领土。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性质和不同的政权。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发动的十余年内战，引来了日本入侵中华国土。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则使日本未能迅速灭亡中国。日本作为外国入侵者出现在中国这块领土上，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河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战略势力除日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家之外，又出现了第四股势力，即美英等国的联合抗日力量。这四股力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战略斗法。日本的战略是诱使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国民党的战略是让美国去抗日，自己保存实力准备对付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是联合美国，拉住蒋介石，争取三方合作，共同抗日。美国的战略则是促使国共

合作和中美合作，共同抗日。四家的战略各有不同，只有中共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比较一致。应当说，四家中任何一家的战略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且必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那么四家的战略都有其合理性。如果仅以此点做为评价标准，那么，四家的战略都是无可非议的。关键在于谁的战略运用得法。很显然，对战略的评价标准，绝不能以此为限。重要的是，还要看其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没有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战略手法再高明也不能成功。上述四家战略的实践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日本来说，它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以后所实行的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由此产生了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使得日本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做为入侵者的日本，其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是错误的。所以，它的最终命运必然走向根本灭亡。从国民党来说，如果共产党真是它的心腹之患，那么，它借助日本人的手消灭共产党，或借助美国人的手来消灭共产党，或让日美相争，自己保存实力去对付共产党，这些战略手法也是用心良苦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最根本的缺陷是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弃了反抗日本侵略者这一主要进攻方向，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主要任务，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从这点来说，蒋介石自认为其反共战略手法高明，实际上则是十分愚蠢的，而其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的错误导致了他的愚蠢。这种战略也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从美国来说，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都有正确的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最为接近。但是，美国确立的扶蒋与联系中共的政策，其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又都有错误的或反动的成份。在战略目标方面，它以扶蒋和联系中共为

手段，以达到控制中国和控制远东的目标是反动的。在战略基础方面，它轻视中共力量和反苏反共的顽固偏见既是错误的，也是反动的。这种错误和反动必将导致美国扶蒋与联系中共政策的失败。

四家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拉蒋抗日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这一政策不仅在战略手法上正确，而且在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上也是无可挑剔的。在战略手法上，它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以打击主要敌人。在战略目标上，它是以驱逐侵略者，解放中华民族为已任。在战略基础上，它是以全中国劳苦大众为后盾，以他们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四家之中，日本、国民党和美国的力量都看似强大；相对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看来最为弱小。但是，看似强大的力量不一定真正强大，看似弱小的力量不一定真正弱小。最后成功必将属于既具有正确的战略手法，又具有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基础的中国共产党。

1944 年，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联美拉蒋抗日的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由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中共的战略目标有一致性，中共必须联美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由于美蒋的结合和美国对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中共必须将美蒋双方当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待，而不能将二者分割开来；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与中共的联合抗日政策大相径庭，但中共也不能实行联美反蒋政策，因为这不利于抗日阵营的团结，是战略上所不允许的。因此，联美就必须拉蒋。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与美国的联共抗日政策也有很大矛盾，所以又有中共可利用之处，这就是可以通过联美促使美国压蒋放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上半年首先确立了拉蒋抗日政策，并从5月份开始同国民党谈判，以图直接实现这一政策。与此同时，中共积极探索联美途径。在6、7月份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很快就确立联美政策，并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美国压蒋放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5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谈判。5月17日，林伯渠应邀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5月22日，中共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二十条意见书，做为国共两党谈判的基础。意见书写道："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两党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打下坚固之基础，愿我政府实利图之"。③中共的行动和建议，显然在促使蒋介石国民党继续走抗战轨道。为促使国民党进一步投入抗战，中共再度发表宣言，重申中共继续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抗战时期的四项诺言，保证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只要国民党能够与中共合作，与同盟国合作，共同抗日。但是，这次国共谈判进行几个月却毫无进展。8月23日，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要求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说："蒋介石是顽固的，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匪徒。为了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事实。我们已经从经验中懂得这一点。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不要对他的威胁和恫吓让步。不要让他以为你害怕；否则他会用他所长。"为此，毛泽东要求美国告诉蒋："为了战争他

应当作什么。美国人给蒋的援助可以以使他满足美国的愿望为条件”；“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④毛泽东批评美国过去在对付蒋介石方面做得非常糟，听凭他无限度地敲诈勒索。毛泽东衷心希望美国能同中共合作；对蒋介石只能做有条件的援助，这个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抗日和进行内部改革。

毛泽东确立和实施联美拉蒋抗日的政策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而且一度得到了美国的切实尊重和支持。

1944 年 6、7 月份，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其根源在于对共产党军队的使用问题。史迪威认为，鉴于蒋介石军队抗战不力，特别是 1944 年 4 月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有必要由他来全权指挥中国的所有部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联合抗击日本。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如果没有让我有绝对的权威，中国军队遭到破坏将非常大。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才有可能弥补。这个办法就是从山西发动一次进攻……共产党军队也参加山西反攻。但是除非蒋介石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定，否则共产党人就不干。两年前，共产党人曾经愿意同我一道打仗。他们现在可能愿意听我的意见。……除了这一着，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目前的局势”。⑤罗斯福总统过去曾否定过史迪威同样的主张，而现在，他却以强硬的口气致电蒋介石，要他接受史迪威的主张：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和让共产党军队参加盟军对日作战。⑥史迪威的主张和罗斯福的意见既是蒋介石错误政策发展的结果，也是毛泽东联美拉蒋的正确政策影响的结果。

但是，史迪威的主张和罗斯福的意见未能为蒋介石所接受，而且导致了史蒋矛盾的日趋尖锐。1944 年 8 月，罗斯福不得不派出私人特使赫尔利到中国来解决尖锐复杂的史蒋矛盾。由于史蒋矛盾实质是国共矛盾，所以，赫尔利来华后，就由开始调处史蒋矛盾逐步转变为直接调处国共矛盾。

赫尔利来华时，正是毛泽东确立和实施联美拉蒋政策的重要时期。赫尔利于 1944 年 9 月 6 日抵达中国。这时，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已近三个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也已月余。毛泽东的联美拉蒋抗日的政策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和发出报告，向美国以至全世界阐述毛泽东的政策和共产党地区的见闻。他们的文章和报告不能不给予美国当权者和美国人民以很大影响。所以在赫尔利来华前后，美国政府在史蒋矛盾开始尖锐化时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他们运用一切办法来迫使蒋介石听从史迪威的主张。8 月 21 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蒋介石“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委以史迪威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⑦9 月 9 日，罗斯福和刚刚来华的赫尔利都强烈要求通过“理智的和解和合作”，来结束国共两党的纠纷，这才是打好这场战争和建立“持久民主和平”的上策。罗斯福在直接给蒋的一封信中再次提醒蒋，他在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上，正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最后安排”。⑧9 月 19 日，罗斯福采纳史迪威的意见，几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致电蒋介石，要他立即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的建议。电报中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⑨赫尔利和陪同他一起来华的纳尔逊还打算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意思大概是要同共产党人求得解决办法，）其二，中国必须让史

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以此证明它希望帮助盟国打败日本。纳尔逊说，如果蒋介石拒不合作，他们就“建议罗斯福总统抛弃中国，把我们的基地转移到俄国。”⑩9月23日，史迪威提出建议，共产党军队部署在黄河以北，与中央军脱离接触；美国只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五个师的武器装备。赫尔利还满有把握地说：“这个建议肯定会得到成功！”他亲自将此建议呈交给蒋介石。⑪

然而，美国的压力并未能使蒋介石屈服。虽然赫尔利等曾“劲头十足地”准备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拍桌子”，要求中国统一和指挥统一，但他们迅速发现，蒋对他们的压力毫不理睬；虽然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一系列措词强硬的电报，敦促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建议，但蒋介石最终还是拒绝接受史迪威的建议。因此，当赫尔利将史迪威9月23日的建议呈交给蒋介石时，使赫尔利大吃一惊的是，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的不仅是拒绝史迪威的建议，而且还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召回去。蒋介石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他的支持，他深谙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扶蒋而不是联共；如果扶蒋和联共二者只能择一时，美国必将选择扶蒋而不是联共。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坚决要求美国召回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史迪威。一位美国学者说：“由于美国不打算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所以，罗斯福9月19日的那份电报“就成了一份不中用的最后通牒，发电人必然是退却。”⑫这种退却的标志就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应召回国。

史蒋矛盾冲突的结果，以史迪威应召回国而告终。史蒋矛盾的解决，可以说是美国放弃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的第一步。虽然这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许多美国在华武装人员及情报人员纷纷向美国政府写报告、提建议，要求把共产党纳入美国阵营，继续努力实行与中共联系及合作政策，

对蒋介石要实行有选择的灵活政策。但是，“由于总统已经作出决定，所有这种努力是注定没有结果的。在总统决定的这些行动中，最重要的是长期让赫尔利留任驻华大使，并提升魏德迈将军为驻华军司令。他们先后清洗了美国队伍中的共产党同情者，在中国所有敌对的派系中找人支持蒋介石的立场”。⑬在史迪威去职后，赫尔利之所以还在与中共积极联络，这是因为，国共关系，以及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毕竟还没有公开破裂，而且中共还在积极争取与美国合作和国际合作。如果能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美蒋的控制并加入盟国的抗战行列，美国又何乐而不为？这是赫尔利的如意算盘，也是罗斯福和美国政策根深蒂固的幻想。赫尔利就是带着这种如意算盘和幻想去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

从赫尔利来华到史迪威解职，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中共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仍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拉蒋抗日的政策。赫尔利来华时，中国共产党就对他抱有希望，认为赫尔利来华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一样，都是美国对华友好政策，以至对中共友好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赫尔利抵达重庆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致电重庆的董必武，要他代表中共及其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正式发出请帖。⑭9 月 11 日，朱德又以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邀请赫尔利赴延安，对共产党地区作私人调查，并赴访共产党领导人。⑮正是在赫尔利来华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委托董必武代表中共于 9 月 15 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通盘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方案。它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与赫尔利来华后美国政府实行压蒋联共政策也不无关系。

赫尔利来华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等几次提出要求同赫尔利会谈。10 月中下旬，双方会谈终于成行。10 月 17 日、18 日、23 日，林伯渠、董必武与赫尔利连续举行三次会谈。中共代表要求赫尔利帮助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来统治中国，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他们在与国民党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由共产党充分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以统辖一切武装部队；最后，应当平均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⑯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代表的意见，并赞赏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⑰对中共“过去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极为称赞”。⑱。他还认为国共应当合作，“国共合作后，多有益于抗战与国家的事情，中共应取得合法的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东西，决不应偏于哪一党”。⑲

10 月份和 11 月初，在延安的美方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同美军合作的可能性。毛泽东再度表示愿意与美国政府“步伐一致”，“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磨擦”。他进一步指出盟军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重要性。并说明，“这种人民支援，如果美国部队在国民党领土上登陆或作战是得不到的；可是共产党地区动员起来的民众能够提供这种援助。”他也希望“美国会对国民党施加一些直接压力，以促使蒋介石妥协”。⑳周恩来则表示，对美军准备在华北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愿在军事上给予合作。㉑中共领导人的态度，赢得了戴、谢等人的信任。戴维斯给他在重庆和华盛顿的上司写了三份备忘录。戴维斯断定，共产党人是个灵活而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然而，要同延安合作，美国就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

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华盛顿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否要专心一意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投入战斗，从而迫使延安转向苏联。戴维斯竭力主张美国立即作出决定，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戴维斯认为，只要态度正确，共产党人是“必然会引起美国统治阶级的注意和兴趣的。”受到共产党对美国所有建议都作出有利反应的鼓舞，戴维斯强烈要求赫尔利访问延安。他对赫尔利说，这个问题是在东亚保持对美国友好的均势问题。㉒

11 月 7 日，赫尔利在收到戴维斯请他访问延安的恳求之后的第十天，乘飞机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赫尔利来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赫尔利进行了认真而又诚挚的谈判。

赫尔利这次来延安的使命或目的是什么呢？是否为实现戴维斯的上述建议，即同共产党合作，放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当然不是。因为赫尔利在延安谈判后给美国政府的电报中说：“在全部谈判中，我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防止蒋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㉓这里既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没有同中共合作的内容。但是，赫尔利毕竟是采纳了戴维斯的建议来到延安的。这本身也说明了赫尔利和美国对中共表示的友好。所以，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表示，赫尔利来延安，这一事实使他对美国“联合中国军队以打败日本防止中国内战的热切愿望，有了极深的印象”。㉔

赫尔利来延安的使命是不是为调处国共关系呢？赫尔利本人认为是。他在去延安的当天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今天我将前往

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我是应邀前去与所谓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和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这是一次短期的和初步的调查，目的在于寻求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㉕

由此可见，赫尔利这次来延安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共表示友好，目的之二是调处国共关系。应当指出：上述两项并不是赫尔利来延安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赫尔利所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直接向中共表示友好，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与国民党合作，接受蒋介石领导，最后，国共双方联合对日作战，以此达到美国一箭双雕的目的：节省美国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控制。正如当时参与负责中共外交工作的陈毅所说：这是美国“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花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㉖确实，赫尔利以友好的姿态和似乎公正的身份，以调解为名，企图实现美国的目的。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依据毛泽东的联美拉蒋抗日的战略方针，同赫尔利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和交涉。11 月 8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同赫尔利会谈。赫尔利首先表示希望国共团结，以利抗日，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然后又递交给毛泽东一份文件，题目是《协议的基础》，是他和国民党方面一起草拟的。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官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合法。㉗中共领导人对这份文件当然不能同意。读过文件后，毛泽东发言严厉批评国民党破坏团结和抗战不力。赫尔利建议中共对文件加以修改。

11 月 9 日，中共拟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

产党协定》，即《延安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协定共五点，其中第二点写道："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㉘赫尔利对中共起草的这一协定表示完全赞同。11月10日，他主动表示愿与毛泽东一起在协定上签字。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延安协定草案》，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协定上签字。

《延安协定草案》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毛泽东在协定签字当天给罗斯福总统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又说："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的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㉙

《延安协定草案》也是毛泽东的联美拉蒋战略实施的结果。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与美国热情合作的态度和行动，推动了美国，特别是推动了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近，并最终推动赫尔利来到延安，与中共领导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延安协定草案》形式上是国共关系的协定草案，实质上是中共与美国的协定草案。因为这个协定不是由国民党代表而是由美国代表与中共协商签定。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态度和主张，而不是国民党的态度和主张。后来蒋介石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就是证明。赫尔利之所以同意签定协议，

实际上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与毛泽东所实行的拉蒋抗日政策也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并不放弃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而是努力争取与之合作。毛泽东还屡次向美方人士和赫尔利等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放弃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无法抗拒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得不在协定上签字。

《延安协定草案》也是美国实施扶蒋与联系中共政策的结果。扶蒋，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对此，赫尔利供认不讳，而且深为赞同。扶蒋，也是赫尔利来华的主要使命。在赫尔利看来，扶蒋和联系中共并不矛盾，并且认为，只有联系中共并寻求与他们的合作，才能达到扶蒋的目的。这是赫尔利，也是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深刻分歧。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美国政府才同意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达成协议。《延安协定草案》的签订也使赫尔利感到高兴。他向毛泽东表示，他“经过考虑”认为，“五点协议”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特别是中共领导人表示继续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更使他感到满意和放心，他在协定签字当天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30]赫尔利还向罗斯福报告说，协定中“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31]他甚至告诉戴维斯，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总之，在赫尔利看来，《延安协定草案》已按美国的方式和政策解决了中国内部问题；不仅不会损害蒋介石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他的地位。这当然是赫尔利、也是美

国政府的的一厢情愿。赫尔利的“错误”就在于他“写下了一个可能当时他自己还未意识到的、有利于中国人民而有违于蒋介石的意旨的条文”。[32]周恩来在当时就指出了赫尔利的这一“错误”，说：蒋介石是顽固坚持由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其国民政府的；现在赫尔利竟同意写上改组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把“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混而为一了，这很不利于蒋介石继续主宰国民政府的企图。[33]所以，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协定提出修改。事实果真如此。

二　最后的努力

1944年11月10日下午两时许，赫尔利在《延安协定草案》上签字后不到两个小时，就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周恩来与赫尔利同行赴重庆，以便与国民党谈判。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既表明中共对这次谈判的高度重视，又表明中共对谈判的结果持谨慎态度。赫尔利在延安时曾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直接会谈。他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他将作为上宾，“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会议的成败如何。”毛泽东表示：“我已经说过，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但是，赫尔利临走时，毛泽东又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毛泽东也向赫尔利说明，周恩来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并表示，“我们也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共同纲领，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纲领上签

字。”[34]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即中共要努力配合赫尔利，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与合作。赫尔利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赞赏。

可以说，赫尔利是满怀着希望离开延安的。他确信，他与共产党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是公平的，而且蒋介石也有接受它们的理由，即使不是全部接受，至少也会接受足够的部分以利于促进谈判。所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这一切都已显示出很大的可能性。”[35]赫尔利回重庆后向戴维斯说，他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希望蒋介石能够接受它。他认为，如果谈判失败，错误更多地是在国民党方面，而不是在共产党方面。但是，赫尔利的一厢情愿，遭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迎头撞击。赫尔利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当他将《延安协定草案》副本交给宋子文时，宋当即指责赫尔利受到“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认为，在他没有承认自己的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会同意组成联合政府。随后，国民党针对《延安协定草案》，于11月15日、17日和21日，连续三次向赫尔利提出反建议，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延安协定草案》。开始，赫尔利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和建议颇不理解。他在11月16日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接受这个提案，”认为这个“建议案最终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我认为，他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36]。赫尔利还对张治中和王世杰等人大加斥责，说“你们谈了5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毛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说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团结的，我看到你们不愿团结”。[37]不能说赫

尔利的斥责只是装腔作势。实际上，这是他受中共领导人影响的结果。

问题在于，赫尔利并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当然也就不了解中国。他是以美国的眼光、美国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中国问题，也是以同样的眼光和方式来看待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他以为，联合政府并不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权，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在无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并无控制政府的足够力量。他还以为，在共产党保证支持蒋介石为政府主席的情况下，成立联合政府只会加强国民党的力量，而不是相反。他不明白，蒋介石国民党对可以加强自身力量的这一行为为什么这样固执己见地进行反对。其实，只要成立联合政府，就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控制政权。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共两党的现状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等非常清楚这一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只有赫尔利，他甚至连蒋介石姓“石”还是姓“蒋”都搞不太清楚，又怎么能要求他懂得这一切呢？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并代表美国来调处国共关系。所以，他的话又是起作用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信任赫尔利的，否则，不会与他共同签署《延安协定草案》，并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却并不信任赫尔利，否则，不会断然拒绝他与中共签署的协议。但在后来，赫尔利却宁愿支持不信任并反对他的蒋介石国民党，而反对信任和支持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当然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与蒋介石政权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扶蒋，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蒋介石国民党深刻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底盘，并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坚决拒绝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协议。而赫尔利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抵制下

也不得不让步，由原来支持中共的主张转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主张，从而放弃了他自己签字同意过的《延安协定草案》。11 月 21 日，赫尔利终于表示同意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并劝周恩来代表中共接受，以作为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基础。

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延安协定草案》上签字和赫尔利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决定中止同国民党的谈判，尽快返回延安。在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赫尔利又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做周恩来的工作。他企图以美国与中共的合作，诱使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方案，即允许共产党以不平等的身份参加政府，而不同意共产党以平等的身份与国民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赫尔利向周恩来说：请中共“务必参加政府，你们是同我——美国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又说：只要中共“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强大起来。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答称：“也许我们之间对联合政府的提议有不同的了解。参加并无实权，并非联合政府，这就是关键所在”；又说：“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给，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38]

周恩来在离渝之前，也曾根据孙科的献策：“用蒋现有的形式，放进中共的内容”，起草了一个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复案，并将复案内容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交复案，而采纳陈毅提出的“就汤下面”之法。

陈毅在 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后任军长。1944 年 3 月份他来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毛泽东要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8、9 月份，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并同观察组成员包瑞德和谢伟思等座谈。赫尔利来华后，陈毅关注中共

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尤其关注毛泽东与赫尔利的会谈。他在反复研读毛泽东与赫尔利的会谈记录以及毛泽东批转的周恩来复案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全面阐述中共对美对蒋的政策，并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就汤下面”之法。

陈毅首先分析蒋介石的现状和美国的企图。关于蒋介石的现状，陈毅指出，蒋目前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蒋介石在毛、赫已签定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的西南大局，因为签字仅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就是说，蒋介石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并不会因订了一个协议而能改善。蒋介石签字以后，共产党能在其内阁中加入一两个阁员，这在蒋介石方面来看，已被认为是大大的出手和让步了。可是，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要使协定对于国民党西南大局起一定挽救作用，就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办法，在几个要害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而这一点，蒋介石是决不肯做的，美国的压力再强也不能达到目的。这样，蒋就只有走第二条路，即照蒋现在的“对策”办。这只能缓和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而国民党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但蒋却宁愿走这一条死路，因为他要控制中共的发展；历史的教训对他是起作用的。他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国共合作时期都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他是更恐慌、动摇、害怕了。所以，他宁愿走反动的绝路也是不会按中共的意愿办事的。至于美国，陈毅认为，他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美国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改革政治，而且极力要蒋担任政府主席。这样，美国

当然不会对蒋施加多大压力，而且绝不可能反蒋。

鉴于上述形势，陈毅认为，如果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但蒋不会走这条路；如果蒋走第二条路，中共怎么办？这里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独立，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与美、蒋决裂。陈毅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它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第二个方案是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陈毅将它概括为“就汤下面”之法。他用明末的故事来说明这一方法：明朝末年清军首领多尔衮致书明朝将领史可法：“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此。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就汤下面”之法。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目前，中国共产党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应当“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中国共产党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中国共产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最后总结道：“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中心地位。”[39]

陈毅认为，他提出的“就汤下面”之法，是目前“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因而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方案。陈毅的这一战略

方案与毛泽东已经确立的联美拉蒋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是对联美拉蒋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欣赏陈毅的方案。他反复阅读陈毅的来信。在看到信上提出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他拿起手笔，边看边做圈点："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个回去"（圈），"五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看完陈毅的信后，毛泽东很快就给陈毅回信："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40]12 月 1 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电："过早交复案不利，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41]所谓不交复案，就是如果蒋不同意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即不再作让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决定采纳陈毅的方案时，并没有赞同他提出的不搞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建议。12 月 7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准备早日公布赫、毛签字之五点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政府改变态度；二是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会，由边区参议会发起，并准备委员会党内由周恩来、林伯渠、高岗、薄一波等十四人，党外由李鼎铭、续范亭等十九人共同组成。12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说明中断与国民党谈判的理由，并告将公布五点协议。同日，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会谈时又明确告之，中共将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毛泽东说："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42]

中共的决定立刻引起美方的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苏联影响的结果，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也许是中共下决心与美蒋决裂。12月11日，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得知我方“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气愤”，包瑞德认为我方“不该使赫尔利太难堪，说弄决裂了，对我方不利”。[43]

其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本意，是在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同时，影响美国的政策，促使美国政策的转变，而非与美方决裂。这一点，从毛泽东与包瑞德谈话中即可得到明证。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严厉批评了蒋介石的顽固反共态度和赫尔利的言而无信，但同时，他也反复表示了愿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毛泽东告诉包瑞德：“我们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急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决心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根据五点协议，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本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44]

毛泽东关于中共与美国合作的一番话可谓语重心长、肝胆俱诚。毛泽东也批评美国，说美国虽然“愿意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在给予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要我们必须接受蒋委员长的条件，”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并不能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安全的保证，而且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提供保证。即使它或许真诚地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能相信蒋委员长的良好诚意。”[15]毛泽东的批评又入情入理，使得包瑞德心悦诚服。他由此深深感到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他写下了他和毛、周的几段对话进一步说明这种力量：（一）包瑞德说：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毛、周答：对于美国人民，时间将证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二）包瑞德说：在这次危机中，你们未加入政府，或许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毛、周回答：等真相为人所知（真相终将为人所知）时，美国人民将会赞同我们的行动。（三）包瑞德说：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毛、周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四）包瑞德说：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又不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那么美国或许要从中国撤走他的全部军队。毛、周回答：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16]毛、周的回答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在华企图洞若观火，并反映了中共领袖的聪明、坚定和其地位所具有的力量。这一切，都给予包瑞德以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不仅向包瑞德着重阐述了与美国合作的深切愿望，而且致电重庆的王若飞，要他转告美方人士，说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说只要美方不要中共放弃原则，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进行“这种廉价出卖人民

的勾当”，“其它一切都是好商量的”。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暂时不搞解放区联合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解决”。[47]

随后，中共与美方关系和缓。12 月 15 日至 17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时要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美方试探中共在美军登陆时可能提供何种合作与支援。12 月 26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又同包瑞德（他代表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部麦克卢尔少将）会谈，就美方所提在欧战结束后美军一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时要求中共暂时提供后勤供应问题进行磋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向包瑞德担保，中共可以向这个师提供供应品，直到美军的正规供应机关能够承担这一任务时为止。他们还告诉伯德：“华北人民把美国看作他们最好的朋友，把魏德迈将军当作总司令看待，如果他决定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会服从的。”[48]据美方材料记载，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信在美国陆军和战略情报局中存在着同情共产党的派别，所以，他们准备冒一场大的风险。他们在 1945 年 1 月 9 日交给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直接转送给华盛顿。信中说，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的错综复杂问题；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决定访问华盛顿。[49]赫尔利在 1945 年 1 月 14 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证实了中共的这一提议。赫尔利说：在魏德迈将军不在司令部期间，其麾下的一些军官制定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美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由美国人领导的共产党部队。计划以美国和共产党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为基础，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一美军军官指

挥之下。这项计划是背着赫尔利做出的。所以，赫尔利告诉罗斯福："我听到了有关这一计划的风声，直到共产党向魏德迈将军提出毛泽东、周恩来将去华盛顿与您秘密会谈时，我才知道这一计划已提交给共产党了。他们要求魏德迈将军就他们拟议中的访问您一事向国民政府和我保密。"[50]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赴华盛顿与罗斯福直接会谈确有其事，只是由于赫尔利大使和罗斯福总统这样一些美国决策人物的反对，毛、周的要求才没有能够实现。

中共与美国关系和缓时，国共关系也开始和缓。1945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各党派应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请赫尔利向国民政府转达，如接受，周恩来即前往商谈。1 月 22 日，毛泽东又电复赫尔利，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由此，国共两党谈判恢复。这次谈判到 2 月中旬时，蒋介石却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遂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2 月 15 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他决定返回延安。3 月 1 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宣布将召开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

就在这次国共谈判破裂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实现其联美拉蒋战略，做了最后的努力。2 月 12 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指出，只要我方努力，有可能攻掉美国的扶蒋政策，从而迫使蒋介石让步。因此他要求周恩来"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51]

但后来，中共中央发现，要攻掉美国的扶蒋主张暂时还不可能，逼蒋让步的条件没有成熟，所以不得不中断国共两党的谈判。

在这次国共谈判破裂之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联美做了大量工作。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华中局，要他们在美军在沿海登陆时做好配合工作。3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就直接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发出指示，要求其在华南搞好与盟军的配合工作，做好提供情报，配合美英盟军登陆的各种准备工作。[52]

在进行联美工作的最后努力中，还是毛泽东与谢伟思的两次谈话最为重要。第一次谈话是在1945年3月13日。第二次谈话是在1945年4月1日。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国共两党谈判刚刚破裂之后和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公开宣布扶蒋反共政策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向谢伟思再度阐述中共的联美政策，一是因为他不相信美国对华政策是固定不变的，二是因为他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意见不一致，三是因为他认为谢伟思是属于美国政府中对中共较为友好的一员，同他谈话可能使他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态度。

在3月1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特别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说："中国战后最急需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所以，美国的资本

对中国就特别重要。而且，“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毛泽东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并非无利可图。“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而中国也“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中国还能“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并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

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毛泽东论证道，中美两国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应当而且可能合作的。但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来看，中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而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农民根本利益的党。它的纲领，它的政策，都是“为了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切人民团体的团结，而不是在倾轧的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需要的实现，共产党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国民党与全体居民中的农民群众并无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地主集团组成的党，这些集团通过一个保守的和缺乏想象力的官僚机构施行统治。它对改善农民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废除现存的封建主义残余等十分重要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而且什么也不打算做。它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打击它的主要支撑集团的权力基础。”因此，美国要与中国合作，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毛泽东表示相信美国是愿意同中共合作的，说“美国的本意是好的。赫尔利大使到延安并同意了我们的5条基本意见时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说“如果不是他知道罗斯福总统有同样的想法，他不可能赞同这些意见。”直到这时，毛泽东还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指挥，如象英国在欧洲有指挥权一样”。但他指出，美国必须指挥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一切中国军队”。为此，他批评蒋介石提出的“改组共产党军队”，并“把它们置于美国统率之下的”建议具有挑拨性，是企图在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之间制造误解。[53]

4月1日，毛泽东与谢伟思作最后一次会见，因为谢伟思在3月30日突然接到美国政府召回美国的通知。毛泽东迅速召见谢伟思，向他阐明中共的联美政策。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毛泽东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共产党是否得到哪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他们都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与美国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这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地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望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与共产党人合作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就是“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54]有这么多好处，美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美国发出的最后一次要求合

作的强烈呼吁。这一呼吁仍然充满着对美国的信赖和诚意。毛泽东在呼吁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同时，还深深表示希望并要求美国能对蒋介石国民党施加影响和进行帮助，使他能够进行改革并与中共妥协与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不知道，他这时的呼吁对美国当权者来说已不可能再起作用。他与谢伟思最后一次谈话的第二天，赫尔利就在美国公开发表了扶蒋反共的演说。

注　释

1　1944 年 2 月 4 日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

2　1944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于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的指示。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93—595 页。

4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55—256 页。

5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667 页。

6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 679 页。

7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704 页。

8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 705 页。

9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 707 页。

10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 697 页。

11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 717 页。

12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 713 页。

13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89—190 页。

1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2 页。

15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电，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6 页。

16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 190 页。

17 1944 年 10 月 17 日林伯渠、董必武同志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电。

18 1944 年 10 月 18 日董必武、林伯渠同志致毛泽东同志电。

19 1944 年 10 月 18 日董必武、林伯渠同志致毛泽东同志电。

20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37 页。

21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 191 页。

22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 191—192 页。

23 《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2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电，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第 416—417 页。

25 《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26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1 页。

27 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 638—640 页。

28 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 638—640 页。

29 1944 年 11 月 10 日毛泽东同志致罗斯福总统函。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 639—640 页。

31 《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32 《陈毅传》第 308 页。

33 《陈毅传》第 309 页；《周恩来年谱》第 587 页。

34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35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5 页。

36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第 417 页。

37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册)，第 972—973 页。

38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77 页。

39 《陈毅传》第 309—312 页。

40 《陈毅传》第 312 页。

4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590 页。

42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 97 页。

43 《周恩来年谱》第 592 页。

44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 91—95 页。

45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 92 页。

46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 99 页。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 641 页。

48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 203 页。

4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 204 页；巴巴拉·塔奇曼“如果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9 辑。

50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第 413 页。

51 1945 年 2 月 12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5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60 页。

53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331 页。

54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332—341 页。

第 四 章

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

一 从德黑兰到雅尔塔

从1942年冬到1943年春，美国实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即全力扶持蒋介石的政策，其军事目的是使蒋介石政府留在抗日阵营内，并尽可能地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政治目的则是要使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以实现美国对中国以至远东的控制。但是，到1943年夏秋之际，美国依赖蒋介石政府实现上述两项目的方针开始发生动摇。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使美国日益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很难在配合美国的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政治上，1943年夏的国共磨擦使美国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很可能在战时或战后导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这种局面的出现，将使美国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控制中国以至远东的愿望落空。

1943年夏，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开始寻求苏联的支持。本来，美国指望与蒋介石国民党的配合来实现上述两项目标。现在，它却开始将这种希望转向苏联。1943年8月，在美英两国举行的魁北克会议时，美国起草了《俄国的地位》的文件。文件指出：“美国在对俄国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的进行。有了俄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一个盟国，这场战争将比没有俄国参加而

能在更短时间内，以更少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来结束。要是太平洋战争在进行时俄国方面的态度不甚友好或消极的话，那么困难将大为增加，而且作战行动也可能遭遇失败”。[①]9 月，罗斯福总统又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他担心在打败日本以后，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苏联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进行干预，而西方列强可能因此被迫站在另一边进行干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罗斯福想促使国共达成协定，还想促使中苏订立协定，以排除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②]这样，从 1943 年夏开始，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对苏联就有了两项要求：一是取代中国在配合美国的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即扶持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并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协议。

1943 年下半年，美国努力争取苏联承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效。在 1943 年 10 月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斯大林向美国国务卿赫尔主动表示说，在德国法西斯被打败以后，苏联立即参加太平洋战争，帮助美英等国击败远东之敌——日本法西斯。赫尔对斯大林的表示感到惊奇和高兴。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有庞大的苏联军队冲击亚洲大陆的日军，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会快些，美国人生命的丧失就会少得多，而且还可以减缓美国物资的过度使用。罗斯福得悉斯大林的表示也感到精神振奋。他说，莫斯科会议的气氛“异常良好”，已经产生了一种“十分融洽……的心理状态”。他对记者们说：“莫斯科会议的成就驳斥了幸灾乐祸之辈认为会谈将充满猜疑而告终的预言。”[③]确实，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必将减轻美国依赖中国这个基地的程度，并在德国崩溃后减少苏联乘盟国在远东作战之机而在欧洲扩张的可能性。这一可能足以使罗斯福认为，莫斯科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就。

莫斯科会议后，罗斯福急切希望与斯大林会晤，以便直接或正式地得到斯大林的承诺。经过努力，罗斯福终于实现了与英国首脑丘吉尔和苏联首脑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会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美英两国首脑同苏联首脑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德黑兰会议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共进行四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中国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并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罗斯福向斯大林正式提出中国问题，说在开罗，他曾同蒋介石就中国这一总的题目有过一次有意思的谈话；并说，美国现在正在装备和训练三十个中国师以便在华南作战，并且正在建议继续再搞同样的三十个师。④罗斯福的用意旨在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但斯大林却批评蒋介石等，说中国人仗打得很糟，在他看来，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斯大林的回答当然不能使罗斯福满意。然而，在接下去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说，苏联政府欢迎英美对日作战的一切胜利；并说："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⑤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所作的郑重保证，也是罗斯福急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苏联的保证使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好象吃了定心丸。他们不再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缺乏中国的有力配合而过分担心了。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几天前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刚刚被承认是一个强国。现在，中国居于次要地位了。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决心要利用机会为中国人取得成功；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罗斯福为了取悦于斯大林而牺牲了蒋介石。他在舞台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舞伴。美国对蒋介石国

民党的依赖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及合作的决策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所做的对日作战的承诺，特别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所做的对日作战的正式保证，并不是如此慷慨无私的。这种承诺和保证在分化美蒋关系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希望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去获得有利于苏联的国家权益。在德黑兰会议即将结束时的一次三国首脑午餐会上，斯大林开始提出他的要求。他询问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美英等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正是为了这个理由，他希望听听斯大林对开罗宣言的意见，“因为他对苏联政府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感兴趣”。斯大林起初表示，当然，俄国人有他们的看法，但是这也许等到俄国人积极参加远东战争时再说比较好些。随后，他又转弯抹角地说，在远东，俄国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海参崴只是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他所感兴趣的是中国东北的大连这个完全的不冻港。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以换取他在其他方面赞同英美的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一个方案，认为自由港的主张也许还适用于远东，并提议大连可作为一种可能性。斯大林认为，中国人不会喜欢这样一个方案。罗斯福则说，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的主张。斯大林说，那将是不坏的。⑥

在德黑兰会议时，罗斯福曾提议，在战争胜利后，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一个“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的警察委员会，即“四个警察”。斯大林则屡屡表示，对中国的参加问题存有疑问。他说，“例如，一个欧洲国家或许会对中国有权利对它运用某种机构表示不满。而且，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中国在

战争结束时是非常强大的。”罗斯福实际上赞成斯大林的看法。他说，“他曾坚持要中国参加莫斯科四国宣言，并不是因为他没认识到现在的中国很弱，而是他想到更远的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把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⑦

关于远东问题，尤其是个中国问题，美苏双方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讨论，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在会议结束前，罗斯福却起草了一个涉及远东问题的秘密文件交与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在回莫斯科后，他将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进行研究。会后不久，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俄国在西伯利亚没有不冻港，很希望能得到一个。”因此，他“对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表示赞成”，还“打算使西伯利亚的进口和出口经过大连港并通过满洲铁路和西伯利亚地区连接起来。”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支持。他说：“他同蒋介石委员长和斯大林元帅的讨论令人非常满意。”他还说：看到委员长和斯大林元帅在关于太平洋的主要问题上和他的“看法一致”，也使他非常满意。所以，他认为，一旦日本被完全征服，达成关于控制太平洋的协议将不会有什么困难。⑧

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在德黑兰会议前后可以说只是有了一个开端。美国对苏联的两项需求只是提出一项，即只提出了对日作战问题。苏联也只是向美国提出了初步的条件。

德黑兰会议后，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问题很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德黑兰会议，罗斯福认为，美苏是完全可以合作的；由于美苏的合作，中苏合作，即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的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只要中苏能够合作，国共关系则必能和解；只要国共和解，那么，维持美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才不致于发生问题。这就是美国实施

对华政策的三个步骤。现在，第一步的美苏合作已经实现。下面应当努力促成中苏合作和国共合作。

但是，正当美国欲促成中苏合作时，却发生了中苏冲突的新疆事件。中苏关系自从1943年以来就由于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反苏反共而开始恶化。1944年春，中国政府军队向进攻新疆的苏联哥萨克军队发动反击，苏联飞机则沿新疆与蒙古边界对中国军队进行扫射，打死中国军人。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不仅要中国赔偿它遗留在新疆的财产，而且要求对抗日战争初期运往中国的供应物资和武器装备付款，款项的支付又要以经俄国土耳其斯坦的陆路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的方式进行。这种苛刻的条件必然进一步激化双方的关系。3月30日，苏联与日本签订渔业协定。随后，苏联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不将全部兵力用于对日作战，而是用大量兵力去包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国民党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苏联和日本已达成协议，互不进行战争。在此期间，蒋介石几次致电罗斯福，声称，来自外蒙古的苏联飞机多次轰炸和扫射在新疆承化和奇台地区追击叛军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自2月份以来，中共军队开始在陕北集结，准备夺取河防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这显然是由于苏联的支持。为此，蒋介石要求美国介入，以解决中苏纠纷和国共纠纷，实际上是要美国支持他并压制苏联和中共。

中苏关系的恶化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因为它干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为此，美国采取措施，努力防止中苏纠纷扩大化。1944年4月18日，罗斯福打电报告诉蒋介石，值此战争进行之际，中苏发生纠纷会影响盟国的团结，他建议蒋介石采取现实的态度，“冻结目前的事件”，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另一方面，美国又做苏联的工作。6月份，罗斯福首先命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会见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征询关于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意见，然后又派副总统华莱士使华，了解蒋介石对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态度。6月10日晚，哈里曼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哈里曼首先阐明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人。因此应当鼓励蒋介石，首先使他想和北方的共产党和解，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其次使他在国内放宽政策。对罗斯福的看法，斯大林表示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方面，表示支持，认为蒋介石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必须给予支持。实际上，这也是苏联政府自中国抗战以来的一贯政策。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埋怨蒋介石这个最佳人选并不太好，认为蒋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并举出事例加以说明。他说他有一种印象：蒋介石周围的许多人都是些无赖，甚至卖国贼，因为重庆所发生的一切，日本人似乎了如指掌。斯大林还埋怨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他表示这种争论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冒牌的共产党，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是抗日的。斯大林的上述意见，看上去十分明确，但实际上，无论对中苏关系还是国共关系，他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既可这样解释，也可那样解释。尽管如此，美国对斯大林的回答也表示满意。首先，斯大林毕竟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了支持，这就使中苏纠纷可望得到解决。美国尤其对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共产党的提法感兴趣。由此说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并非密不可分。所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接受美蒋的条件而愿意合作。会谈之后，哈里曼将斯大林的意见及时转告了即将赴华的华莱士副总统。

6月下旬，华莱士抵达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数次会晤。当华

莱士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希望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解，并转达了斯大林与哈里曼谈话的某些内容，尤其是转达关于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共产党的观点时，蒋介石几乎是断然拒绝了上述建议和意思。蒋“大发中共的牢骚”，认为美国不了解问题的真象，并且说共产党用心机敏，因而散步一种印象：他们并非真正的革命者，只不过是土地民主改革者而已；他们也不依附于苏联，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比俄国共产党更共产党⑨。然而，蒋介石在拒绝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同时，却要华莱士转告罗斯福总统，表示他热切希望在美国的调停下，与苏联进行会谈并达成某种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将同意不给中国共产党以任何支持。为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表示，他准备付出代价，比如俄国人在远东的不冻港问题。如果同俄国人达成了这种协定，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就范，因为到那时中国共产党人会发现他们已丧失了任何外国的支持。蒋介石要与苏联达成协定的愿望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他拒绝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观点却遭到美国的批评。由于美国的坚持，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以探寻美国与中共合作以及国共合作的途径。

8 月 31 日，罗斯福总统私人特使赫尔利抵达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再次征询关于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意见。莫洛托夫向赫尔利指出：苏联同意美国对华政策，并深盼美国对于中国事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居领导地位。关于蒋介石，莫洛托夫详细地谈到 1936 年蒋介石在西安被囚事件，并说那时中国与苏联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但是他说，苏联政府对于张学良和汪精卫所领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并向苏联寻求同情与援助的革命党派，不加理会，而发出下列声明，即日本的挑衅是西安暴

动以及中国其它事件的原因。由于苏联政府政治上与道义上的支持，蒋被允许回到政府所在地，而革命领袖张学良却被逮捕。苏联曾希望，由于他们这个行动的结果，中苏关系或可好转。但中国人对于增强关系表示很少兴趣。相反的，这种关系近年来每况愈下。莫洛托夫在这里明确表示了自西安事变发生以来，苏联政府都一直在支持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或其他人。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前进，而且逐步倒退，这丝毫不是苏联的责任，而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因此他认为，在蒋介石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之前，苏联不打算关心中国政府的事务。关于中国共产党，莫洛托夫也向赫尔利明确表示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因为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的改革；他们虽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某些贫穷地区人民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因此，莫洛托夫认为，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所谓的"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比如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最后，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同时，实际上明确表示了苏联愿与蒋介石政府改善关系的态度，只要蒋介石能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促进双方关系的具体步骤。莫洛托夫的态度使赫尔利离开莫斯科时相信，苏联政府（1）不希望中国有内战，（2）不承认中共，（3）希望与中国政府有更和谐的关系。

至此，美苏之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交易即告一段落。双方对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尽管这时苏联报界还在大力谴责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但由于苏美之间的交易，中苏关系却有了改善的可能性。赫尔利于 1944 年 9 月抵达重庆

后，为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向蒋介石做了大量的工作。12月，赫尔利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他在重庆的工作成效："我到这里的时候，蒋介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工具。现在，他则确信俄国政府毫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苏维埃政府的代理者"。因此，"他觉得现在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和外国没有纠葛的中国政党而与之获致解决办法。"⑩

当美苏双方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之后，苏联在华权益问题又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美苏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交易，集中体现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德黑兰会议时，美苏双方曾就苏联在华权益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交易。现在，由于美国为了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迫切希望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这就大大增加了斯大林要求苏联在华权益问题的砝码。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实现他的两个目标：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苏联支持美国关于国共关系的政策，决定付出代价。为了第一个目标，罗斯福认为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由日本交与俄国。为了第二个目标，他认为苏联应该在满洲得到商业特权，特别是苏联的进出口货物应该有在大连港自由转运的权利。他希望这两个让步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并能就远东问题达成一项总的苏美协议，作为他正在争取的全球协议的一部分。⑪但是，罗斯福很快发现，他不得不对斯大林付出比他预计的更大的代价。早在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在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俄国不仅要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而且希望再次租借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港及其周围地区，同时租借中东铁路，其中包括"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铁路"。⑫

这一要求大大超过了在德黑兰会议前后苏美交易中提出的只是使大连港成为一个国际化自由港的主张。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提出要美国承认中国外蒙古独立的要求，实际上是要外蒙古完全脱离中国而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是过去在苏美交易中没有涉及的问题。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上述问题同罗斯福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交涉。这一次，斯大林向罗斯福公然提出要恢复沙皇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拥有的一切权益。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必须得到“沙皇曾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港的铁路线，以及从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的铁路，在那里同哈巴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连接”。斯大林认为，他所提出的要求都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因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对于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尊严的在华权益，是否真正代表苏联人民的意愿，这里暂存疑问。否则，就无法评价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还是苏联人民的责任，或者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斯大林解释说，对德作战是由于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同一个同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因此，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⑬。

斯大林当时处于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首先，是因为罗斯福很不了解日本的形势和关东军的虚弱情况。当时的美国战争战略处负责人威廉·唐纳文将军曾指出：“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为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而做出的让步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缺乏对日本关东军的正确估计。”⑭那时，美国人无法公开或秘

密地到中国东北去了解关东军的情况。罗斯福和美国国务院的消息是由那些习惯于夸大日本关东军力量的军事顾问们提供的。他们认为日本关东军的潜力是很大的，从一个个海岛逐步攻到日本本岛需要牺牲数目大得惊人的美国生命，而如果苏联军队从宽阔的陆地向日本进攻将要容易得多。⑮这就是雅尔塔会议时美国政府的基本想法和要求。这种想法和要求极其有利于苏联方面提出苛刻的条件。其次，即使罗斯福对日本的形势和关东军虚弱情况的了解比他实际上知道的清楚，那也还存在着一个苏联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国共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最后解决，比如中苏协定和国共协定都还没有签订。鉴于上述情况，最后，罗斯福不得不向斯大林让步。2 月 10 日，罗斯福和斯大林首先起草了雅尔塔协定。2 月 11 日，丘吉尔也签了字。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共有三项：(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维持。这一条苏美双方略有妥协，即没有直接写出“外蒙古独立”的字样。(2)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这一条基本满足了苏联方面的要求，唯一妥协的地方是维持了罗斯福提出的“大连商港国际化”主张，实际上大连港仍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3) 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⑯雅尔塔协定几乎完全是苏美之间相互交易的结果。它是在没有中国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的以中国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协定。因此，这一协定集中体现了美苏两国在中国抗战后期无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国主义作风。

从德黑兰到雅尔塔，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取得了重要进

展。《雅尔塔协定》就是这一重要进展的标志。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德黑兰会议时，这种交易曾使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依赖，并促使它去探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44 年 9 月赫尔利来华后，这种交易又促使美国逐步走向扶蒋反共的道路。

从 1944 年上半年开始，美国虽然在军事上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依赖，但无论在军事上还在政治上，都没有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美国决策者认为，为使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争取苏联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 1944 年 9 月来华之前先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的重要原因。在这次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向美国特使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美国关于国共关系的政策。所以，赫尔利来华后，就代表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使其同意与中共合作，同时向他阐明，由于苏联已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尽管放心地与中共合作。赫尔利来华后执行的政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充分支持。罗斯福在 1944 年 11 月 18 日致电赫尔利说："我希望你以我的名义秘密告诉委员长，我认为，在委员长和华北军队间作一富有成效的安排，将会极大地加速实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目标，这也是俄国人的意见。我此时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他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对他强调'俄国人'这个词。"⑰

本来，美国也曾一度希望与中共真诚合作。特别是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经过一番考察，纷纷写出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共合作，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与美国合作。中国学者牛军在其《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书中指出："综观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构成，美国

为使之成行所做的不寻常的努力，以及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的高度重视和国民党对它的高度过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它完全可以以美军观察组为战略支点，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然而美国学者迈尔伯克的评价是：“迪克西使团在通常意义上是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不能不说与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密切相关。由于美苏之间的交易，斯大林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许诺大大增加了美蒋与中共交涉的砝码，使得美国在国共谈判中一次又一次地迁就蒋介石国民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理建议，从而导致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国共谈判走向失败。

1945 年 2 月，《雅尔塔协定》签订，国共谈判破裂，赫尔利离华回国述职。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期间，美国驻华官员们为使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灵活的政策，争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也做了最后的努力。2 月 14 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和卢登就中国问题联合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着重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弱点。建议指出：“只要有具体证据证明”蒋介石“愿意并能够统帅全中国抗日力量，支持他就是可取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毫无保留地公开声明支持”蒋介石“占着茅坑不拉屎态度的狭隘政策”，这种政策使美国“脱离了千百万有用的盟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支持蒋介石只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美国现在的政策声明表明“我们显示了一种把目标和手段混淆起来的倾向”。总之一句话，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建议要求美国政府“在我们的首要目标方面重新采取灵活的作法，应该立即调整我们的立场”。[18]2 月 28 日，美国驻华使馆的全体政治官员在临时代办艾奇逊的主持下，起草了一份题

为“中国的局势”的报告，呈递美国政府。报告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应立即采取两项重大步骤。第一步骤是由美国总统“以明确的措词通知”蒋介石，“军事需求要求我们向能够有助于对日作战的共军和其它适当的集团进行援助与合作”；告诉蒋介石，“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供应与合作为制约，限制他们的自行其是和进攻行为，把他们限制在他们目前的地区之内”；告诉蒋介石，“由我们援助共产党会比他们去寻求俄国的帮助或直接、间接干涉好得多”。第二个步骤是采取由蒋介石提出而美国“乐于支持”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一是“组成某种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内阁，共产党人和其他集团在其中应有有效的代表性，并对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分担某些责任；”其二是“共产党的和其他某些部队名义上合并于中央政府军，置于由魏德迈将军提名，经委员长任命的美国军官组成的作战指挥部统帅之下，各党派协议，这些军队只在他们现在的地区内或指定扩大的地区内作战”。报告指出，采取这两个步骤“将会解决中国现在的僵局”，并说，只有“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美国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作战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地为内战而进行的一切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⑲

美国驻华官员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刚刚从中国返回美国的赫尔利暴跳如雷。赫尔利指责这是美国驻华官员“对他的不忠诚行为”，并粗鲁地辱骂负责起草这项政策建议的谢伟思是“狗娘养的”。坚决反对上述建议的赫尔利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现在空前关心的是中国和远东长

远的政治发展，而不是中国作出的任何抗日的军事努力。虽然此前不久，罗斯福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仍然表示要在中国继续同蒋介石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合作，[20]但他依然担心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全国军事援助，与其说会增加中国成立统一政权的机会，不如说会破坏这个机会。他还认为，美国对共产党的直接援助将会同时招致苏联武器进入中国，从而使共产党反对同蒋介石和解。总之，这一措施可能引起他所希望防止的内战，破坏他在战后安全体系中利用和控制中国的计划，并使他遭到国内的攻击，说他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看来还是维护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交易过的政策最为理想：依靠苏联的力量在满洲同日本作战，并胁迫蒋介石在国内政治妥协；依赖苏联同蒋介石订立一个同盟条约而迫使中国共产党同意参加国民党政府。3 月 24 日，罗斯福在同赫尔利的最后谈话中指示赫尔利返回重庆时，途径伦敦和莫斯科，争取英国，主要是苏联再次肯定支持蒋介石控制下的一个统一的中国。[21]正是基于罗斯福的认识和指示，赫尔利才于 4 月 2 日离开美国赴莫斯科之际，发表了扶蒋反共的公开讲话。赫尔利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他声称中共的力量被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向中共提供援助。美国的支持只在蒋介石国民党方面。[22]赫尔利的讲话，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这是美苏关于中国问题交易的必然结果。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使得中国共产党和许多美国驻华官员积极追求的中共与美国的合作最终未能实现。

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会议以后，美苏之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实际上还在继续着，主要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为了促成中苏协定和国共协定的签订，美国还要做最后的努力。既然美国对苏联在华权益问题做了重大让步，那么苏联也该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同美国形成根本一致的意见。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就表示了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愿意同蒋介石国民党改善关系的态度。但那时，苏联毕竟还没有表示完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这与美国政府已定的坚决扶持蒋介石的政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雅尔塔会议时，斯大林曾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认为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中，“蒋介石应担任领导”㉓。但他仍未直接主动地表示苏联支持蒋介石的态度。1945 年 4 月 15 日，赫尔利在伦敦争取英国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后，又来到莫斯科，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赫尔利就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晤，在会谈中，赫尔利首先回顾了以前斯大林所作的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声明，叙述了最近国共谈判的梗概，然后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向赫尔利坦白地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并说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有贪污发生，但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㉔。这种称许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还是第一次。它是苏联对华政策进一步演变的结果。为此，赫尔利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充满了满意之情。报告说：斯大林“希望我们知道，他将完全支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在充分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将中国军队统一起来。简

言之，斯大林完全赞同我们在这次会谈中向他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㉕。5 月下旬，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㉖派霍普金斯赴莫斯科，询问斯大林，苏联是否继续执行美苏双方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霍普金斯说，杜鲁门总统希望继续贯彻罗斯福的政策，并想在实际上和精神上履行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一切协议。斯大林在答复中表示，苏联也将坚持执行雅尔塔协定。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说，苏军将在 8 月 8 日作好准备并进入阵地，但实际决定何时开始作战，将取决于雅尔塔协定的履行，即如果中国在 8 月初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苏军即在那时开始进攻。㉗关于中国问题，斯大林说，他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负起统一中国责任的领袖；中共的领袖却没有一个有资格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㉘但他又说，中国要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统一和自立，美国必然要起最大的作用，因为苏联会忙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而英国也将陷身别的地方。当霍普金斯说，“我们在中国或远东没有独占性的利益，也确实不想把任何其它国家排斥在外”时，斯大林回答，他充分理解这一点，但他所说的意思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争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㉙当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询问：一旦苏军开入满洲，会让蒋政府来组织当地的民政吗？斯大林毫不含糊地回答：“在满洲，同苏军所到的中国任何地方一样，中国行政机构将由蒋来设立”㉚。在此，历史的发展已经基本促成了苏联援蒋不援共的对华政策。这是美苏进一步交易的结果。随后，双方就努力促使这一交易为中国所接受，即努力促成中苏协定和国共协定的签订。

1945 年 2 月，周恩来曾将美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扶蒋拉共

抗日”。[31]那时，美国在与苏联初步交易的基础上，压蒋同意与中共合作，以对中共友好的姿态，促使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在实现国共合作后再谋求中苏合作。4 月以后，美国开始实行扶蒋反共政策。这时，美国在与苏联进一步交易的基础上，企图利用苏联，压迫中共接受美蒋的条件，即在努力促成中苏合作后再实现国共合作。如果说，美国的扶蒋拉共抗日的对华政策尚有积极意义，那么，它的扶蒋反共政策就毫无积极意义了。虽然这时美国还在联合中国抗日，但其反共政策也抵消了它联合中国的全部积极意义。

苏联的对华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几经变化。抗战前期，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国抗战提供大量援助，虽然这种援助主要给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但那时，苏联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都是友好的。当时，苏联与中共的联络是通过共产国际来实现的。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1944 年上半年，双方关系达到了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在此期间，苏联与中共的关系由于战争的爆发而几乎中断。但在苏蒋关系恶化后，苏联对中共的英勇抗日行为进行了报道和赞扬。中共则继续对苏联表示友好。但是，从 1943 年底开始，由于美苏之间的交易，苏联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主要是调整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到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之后，这一调整过程完成，从而形成了苏联援蒋不援共的对华政策。

要评价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一政策是要美国在日本战败后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它违反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这一政策极为不利于中国以及同盟国家的对日抗战，因而也是违背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反动的政策，是应当受到指责的。

然而，要正确评价苏联的援蒋不援共的政策就不那么容易了。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历来具有双重性。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面对着一个分崩离折和革命高潮迭起的中国。苏俄做为一个革命刚刚取得成功的国家，大力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持与俄国革命遵循同一主义和抱有同样理想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苏俄做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又不能不与中国的合法政府打交道或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就在这两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

应当说，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以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为主，但也从未拒绝与中国的国民政府进行联系和建立外交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则是以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即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主，但也没有放弃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及对它的支持。在这里，不管是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以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为主，还是抗战爆发后以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为主，苏联对华政策的积极意义都是主要的，即在主要方面是进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虽然在抗战爆发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主，以支持中共为辅。但是在大敌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这种政策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已暂时收敛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放弃了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革命任务，并与之合作，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苏联支持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主要成份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在抗战后期，特别是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

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日益反动腐朽。它实行避战、反苏、反共的政策而导致了中国的抗战不力、中苏关系恶化和国共关系恶化，影响了同盟国家的反法西战争。这些，苏联都是清楚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在抗战后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日益发展壮大。它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英勇地坚持对日抗战，不仅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和赞扬。这些，苏联也是清楚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赞扬。苏联的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在 1943 年以后，苏联为了同美国做交易，却屡屡称许蒋介石，贬低中国共产党，并在雅尔塔会议后形成了援蒋不援共的对华政策。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确的。苏联之所以同美国就中国问题做交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是获取中国外蒙和东北的部分民族权益；二是保持苏联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利于苏联的国内建设和发展；三是以中国的大部分权益让与美国，以换取美国在东欧以及其它地区对苏联做出让步。这样，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就是利用和牺牲中国，即“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和革命利益，以达到苏联的上述目的，这就是苏联援蒋不援共政策错误的根源所在。

应当看到，苏联的援蒋不援共政策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仍然是有区别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双重性虽然模糊不清了，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并依然在发挥作用。就“援蒋”来说，一方面，作为在远东对美妥协的一部分和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估计，苏联一再申明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并表示给以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仍不断强调对国民党政府“有许多保留意见”，并继续抨击它的政治腐败和内外政策，谴责

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就“不援共”来说，苏联与中共有着深远的历史关系；并且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领导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既不理解，也不信任，以致公开曲解中共的性质，并表示对中共不支持的态度。尽管如此，苏联和中共在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总趋势中毕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处理同美蒋的关系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对苏联来说，中共在牵制蒋方面毕竟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中共从上到下仍然对苏联那样友好，把它做为自己最终对抗美蒋的革命后盾，这一点，在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确立以后更加明显。苏联之所以对中共进行非难，首先是为了迎合美国，其次是不相信中共有足够的力量同美蒋抗衡。由此可见，苏联的“不援共”，实际上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份。所以，苏联的“不援共”——表示与中共并无联系和不支持中共，与美国的“反共”——其目的是消灭中共，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实，这时苏联与中共本来就没有多少联系，而美国和蒋介石却硬把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争端扯在一起，并蛊惑人心地把中共说成是苏联的工具。因此，苏联在外交上表示与中共隔绝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向美国做了一个不难做的“顺水人情”。美国对此却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压共屈服的救命稻草。正当美国和蒋介石为争取苏联的承诺所取得的成功弹冠相庆时，苏联仍持续不断地借助舆论公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这就说明，虽然苏联为同美国做交易而确立的援蒋不援共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是应当批评的，但总的来说，苏联对华政策仍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就苏联关于同中共没有联系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本身来说，也并非完全不利于中共，它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美蒋攻击中共受苏联控制的借口。同时，苏联在舆论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对中共还是支持的，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这两方面更加明显。因此，对苏联的上述政策，是不应当一概否定的。

雅尔塔协议签订后，苏联的政策也是首先改善中苏关系，试图利用苏军参战的有利条件，尽快落实雅尔塔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其次才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推动国共谈判，使中国出现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利于苏联的国内建设和发展。因此，在雅尔塔会议后，特别是1945年5月下旬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苏联以后，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开始为推动中苏谈判进行积极准备。

赫尔利4月中旬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时，曾讨论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问题。当时，斯大林就表示，可以给赫尔利全权，根据他的判断决定何时将雅尔塔秘密协定通知蒋介石。斯大林的意图当然是要美国促使蒋介石尽快接受雅尔塔协定。赫尔利于4月下旬回到重庆后，就极力说服蒋介石改善中苏关系。所以，他迫切希望将雅尔塔秘密协定早日告诉蒋介石。5月上旬，他先后两次致电杜鲁门总统，提出这一要求，但直到5月下旬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后，美国得到斯大林进一步承诺履行雅尔塔协定和关于“援蒋不援共”的明确论断时，才决定采取行动，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和同意进行中苏谈判，签订中苏条约。

6月9日，杜鲁门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向赫尔利发出指令，要求他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二是亲自会见宋子文，向他转述雅尔塔协定内容；三是向斯大林发出通知，说明宋子文将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

杜鲁门在给赫尔利的指令中说："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已同意苏联就其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所提的这些要求。我也同意这些要求。这项消息已告诉宋子文。兹命令你在6月15日同蒋介石谈判这个问题，并且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他的赞同"。[32]

杜鲁门在会见宋子文时说，宋子文有必要开始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杜鲁门对宋子文表现出对苏联意图的不信任不屑一顾。

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通知中告诉斯大林，宋子文将去莫斯科。说他"已指示赫尔利大使在6月15日把苏联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并尽一切努力取得他的同意。还指示赫尔利大使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定。"[33]这一指示说明杜鲁门对迫使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是有把握的。

6月15日，赫尔利遵照杜鲁门指令，将雅尔塔协定通知蒋介石时，特别强调了"斯大林元帅对中国在满洲主权的明确的保证，和他对中国门户开放原则的口头赞同。"[34]显然，这是要以把东北的主权交给蒋介石作保证，来换取蒋介石对协定的同意。但是，蒋介石却向赫尔利提出，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的军事基地等等。[35]这实际上是以一个多国条约代替中苏条约。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要利用美国和西方列强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涉。然而，由于美苏之间的交易，使得美国无法赞成蒋介石的提议，它只能要求蒋介石政府在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同苏联进行谈判。当蒋介石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只支持他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之后，他也就非常乐意地派出了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以订立与苏联之间的互助友好条约。

宋子文一行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7月1日，谈判

一开始，苏联方面就提出要求：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周围地区与海域，即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沙皇政府所占的租借领域；同意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企业。[36]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政府指示宋子文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范围。为此，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同苏联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关于外蒙问题，中国代表团拒绝承认外蒙独立，认为这是在试图修改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宋子文极力说明，如果使外蒙古独立，那么西藏问题就会复杂化，中国的国内局势也将激化，而这有可能导致蒋介石政府倒台。宋子文在7月7日同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的条款，即维持其在法律上和事实的现状。在这里，宋子文同意美国对这一条款的解释，即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这一条款的含义是：从“法律”而言，外蒙古的宗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事实”上不能实行这一宗主权。[37]为此，宋子文进一步提出：如果需要，中国将同意外蒙古实行更高程度的自治，包括拥有独立的军队的权利，外蒙古可以自由地同苏联达成任何军事安排。宋子文的提议符合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的条款，而且向苏联做了最大让步。参加代表团同苏联谈判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积极支持宋子文，并证明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月8日，蒋经国还以蒋介石的名义向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说，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立场将使谈判陷入绝境。然而，这一切争辩都无济无事。在外蒙古独立方面，“苏联表现了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的态度”。[38]斯大林争辩说，雅尔塔协定意味着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为一独立的共和国。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分苏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

立的协定的草案。宋子文说，蒋委员长不会同意以行政法令来出让领土，并重申如果委员长试图这样做，他的政府将垮台。斯大林拒绝接受这一立场，继续进行争执。致使会谈陷入僵局。

实际上，在宋子文7月7日与斯大林会谈的前一日，蒋介石在与他的顾问们长谈之后就致电宋子文，对外蒙古问题提出了如下新的建议：如果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主权的完整，如果苏联在协定中明确同意不向中共和新疆的叛乱武装提供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委员长同意把外蒙古的现状维护到战后，届时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假如投票结果表明普遍希望独立，委员长将依法向中国国会提出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承认其为一独立的共和国。但是，直到7月8日早晨，宋子文才收到蒋介石的来电。7月9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再次会谈。双方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蒋同意战后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如果举行的公民投票赞成独立的话。这一协定将在战后公布。尽管斯大林不承认苏联支持了新疆的叛乱，但他同意苏联政府承担不支持这些叛乱武装的义务。斯大林还明确宣布苏联将不向中共提供道义和物资上的协助，明确宣布他在中国只支持国民政府，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应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39]。随后，双方又就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区域和铁路管理权问题进行磋商和争论。为此，蒋介石政府极力谋求美国的支持。宋子文则于7月14日返回重庆，请求进一步的指示。

由于希望苏联尽快出兵对日作战，由于在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满洲铁路特权来阻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同时再度表示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按照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说法，斯大林在他们面前公开痛斥中国共

产党，企图借以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支持。斯大林还说，他们不过是“一伙法西斯分子。”[40]因此，美国政府再度敦促蒋介石政府继续同苏联谈判，并尽快顺利结束以达成中苏协议。为此，宋子文一行于1945年8月7日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立即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8月9日，苏日战争正式开始。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后，参加中苏谈判的苏方代表开始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斯大林对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很快同意达成中苏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斯大林的这一要挟击溃了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心中的最后一道纺线：为了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一切都可允诺。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正式签字。这一条约包含关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六项内容，除此之外，还包括涉及苏联在华权益问题的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在这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中，苏联方面一开始提出的、明显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三项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而中国方面所得到的唯一“重要之点”，就是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虽然在条约的措词中，没有明确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是，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时一些美国人都认为这一措词应更明确些，但宋子文认为，“这完全是个信用问题”。他的意思是苏联政府是不会自食其言的。因此，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宋子文认为已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而且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来说，他对条约也是满意的。[41]确实，在他们看来，如果条约的签订能杜绝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并阻止他们占领满洲，那么，这一成果毕竟大于政府在条约中向苏联方面所作的让步。

中苏条约既已签订，无论是签约的哪一方，都不得不尊照执

行。尽管在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内，都有人怀疑苏联的地位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是，正如美国政府所承认的："纵令苏联认为它所签订的协议实际上不足尊重，但协议的存在，一如国民党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党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42]因而极大地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条约签订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通知赫尔利，认为中苏条约指明：1. 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2. 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3. 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迪恩更是露骨地表示："斯大林的协议的精神和文字，都排除了苏联帮助中共的任何可能性"[43]。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也断言："斯大林的条约是勾销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笔。"[4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具体体现，也是美苏关于中国问题进一步交易的结果。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获取了比《雅尔塔协定》规定给予苏联的更多的中国的民族权益，并通过控制外蒙和东北的铁路和港口，确立苏联在整个东北亚的军事优势，从而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防线由此确立。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蒋方面则获得了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因此，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和苏联的直接支持下，压迫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而同意合作，实际上是使之接受蒋介石国民党的控制。

赫尔利在第一次来华期间曾同中国共产党积极联络，表现对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从 1944 年 10 月中下旬开始，到 1945 年 2 月中旬，赫尔利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呕心沥血，多方奔走。他对中国共产党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和他为促使国共合作所做的努力，曾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热烈称赞。但是，赫

尔利在1945年4月第二次来华后，却对中共表示异常的冷淡。虽然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仍是他这次来华的重要使命，但他在来华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却尽量避免与中共接触。过去，他曾以干涉者的姿态到处活动，直接插手国共关系的谈判。现在，他却一反常态，经常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似乎决心要尊重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4月28日，他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明“中国人民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作他们自己的决定，并且对他们自己的国是负责。”[45]6月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曾派出七人委员会赴延安同中共谈判。七人委员会在赴延安之前曾往见赫尔利，“寻求他的帮助和意见”。赫尔利却向他们表示，“目前对于中国人——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其它政党，最重要的是跟随他们的领袖，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并对自己的政策负责”；又说，“中国不应要求外国为他们作出决定”，所以，他“拒绝向任何一个党派组织提出劝告”；并说：“作为美国大使，不论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五点建议的优点，还是强调国民党三点建议的优点，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适当的。”[46]6月下旬，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接见赫尔利时，赫尔利也采取了敷衍态度。他尽量避免谈及实质性问题，只是标榜自己曾为争取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中包括一名中共代表而努力，曾去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曾送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曾和中共代表一起起草讨论五点协议。总之，他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最好的朋友。”[47]

赫尔利第一次来华之所以对中共有浓厚兴趣，是因为那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联共或拉共，他要以美国的友好合作态度，诱使中共接受蒋的条件而与国民党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来华之所以对中共表示冷淡或采取敷衍态度，是因为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走向扶蒋反共，他要以美国的冷漠，特别是苏联的压力，迫使中

共接受美蒋的条件而与国民党合作。

赫尔利关于运用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的观点，表现在他在 1945 年 7 月 10 日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48]赫尔利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斯大林曾赞同或将赞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仍充分希望苏联支持它们抵抗国民党政府。除非苏联公开表明态度，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会改变"。赫尔利还指出，虽然去年（1944 年）9 月以来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今年（1945 年）5 月，斯大林又向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做了内容相同的声明，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仍然相信苏联会支持他们。因此，除非苏联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中，苏联应当支持国民政府。否则，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意见不会改变。"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会支持他们，而国民政府能充分正视现实，在政治上采取宽大的解决办法，则他们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如有苏联支持，方可在中国发动内战。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赫尔利的上述论断基于下列几点认识：一是相信苏联对华政策的诚意；二是相信苏联的态度必将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三是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一、二两点认识，上述论断已经说明，赫尔利在报告中还谈了第三点认识。在他看来，过去美国政府的"官吏们、军官们的、新闻报纸与无线电宣传，大都接受共产党领袖们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声明"。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曾被夸大；共产党统治的领土区域曾被夸大；依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数目也曾被夸大"。赫尔利的最终论断是："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文字写在墙上，他们自然会去读的。任何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而

只有事物的坚定的发展将改变他们的态度。”

既然如此，赫尔利又何必象第一次来华时那样去到处活动，操劳奔波呢？莫不如坐而等待，等待中苏谈判的结果。一旦中苏谈判成功，中苏条约签订，国共争端的解决和国共合作自会水到渠成。因此，中苏条约在8月14日一签订，赫尔利就不无得意地宣称：“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袖地位，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49]并认为，只要条约一公布，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他的口袋中”的愿望就会实现了。为此，他立即建议蒋介石在条约公布之前就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以和平的姿态，在条约公布后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正是在赫尔利一手导演下，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后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谈判。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美国都有人不同意赫尔利关于对华政策是“易变的，有弹性的”，是要“承担最小限度的义务”，去发展“最大限度的势力”；认为苏联支持中共与否，与中国事态的发展可能毫不相干。[50]但是，无论罗斯福政府，还是杜鲁门政府的多数人，都支持赫尔利的看法。所以，赫尔利的政策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内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争论或意见分歧究竟是谁对谁错？也就是说，苏联关于中国内政问题的公开表态到底是有诚意的妥协，还是某种权宜之计？事实表明，苏联相当忠实地履行了条约义务和自己的承诺。就在赫尔利和国民党利用中苏条约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之时，苏联也开始向中共施加压力。条约签订后不久，斯大林就以联共（布）中央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51]斯大林还邀请中共派代表去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并对他们说：“我们认为

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时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52]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蒋介石国民党并无诚意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或合作。开始，毛泽东只准备派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后来，他又决定亲自去重庆谈判，不能说与苏联的态度无关。但是，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主要是从大局着眼，为打破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使得中国广大人民，也使得苏美两国人民及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而不是如赫尔利之流所推断的那样，是迫于苏联或美国的压力。正如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党内通知中所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53]

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 28 日乘飞机离开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 43 天的谈判，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双十会谈纪要》。纪要规定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协商会议，但仅此而已。由于受降、军队和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双十会谈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重庆谈判尚未结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便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危机从 10 月中旬起日益严重。毛泽东在“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日，即 10 月 11 日返回延安。其他留在重庆继续谈判的中共代表也于 11 月全部撤回。这样，美国所热衷推动的，得到苏联诚恳支持的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内战的炮声中宣告结束。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具体体现，《国共

双十会谈纪要》又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影响的结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国共双十会谈纪要》都是美苏交易的结果。尽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进行了独立自主的艰苦努力，为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要求，达成了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人民的协定，但由于美苏之间的交易和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使得国共谈判取得的成绩，终于在美国直接支持下，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破坏。

注　释

1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7——388页。

2　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

3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3页。

4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5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59——60页。

6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担会议纪录摘编》第59——60页。

7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38——41页。

8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96——98页。

9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1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160页。

11　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第264——256页。

12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 233——241 页。

13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担会议纪录摘编》第 160——163 页。

14 戴维·达林：《苏俄与远东》，美国耶鲁大学 1971 年版，第 270 页。

1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77 页。

16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 231——232 页。

17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6 页。

18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311——312 页。

19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312——317 页。

20 《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71——175 页。

21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年中国）第 242——246 页。

22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年中国）第 317——318 页。

23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 169——161 页。

2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60——161 页。

25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318 页。

26 罗斯福总统因病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去逝，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27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343 页。

2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78 页；哈里曼《特使》第 525 页。

29 哈里曼《特使》第 524——525 页。

30 哈里曼《特使》第 525 页。

31 《周恩来年谱》第 603 页。

32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191 页。

33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192 页。

3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78 页。

35 戴维·达林《苏俄与远东》，第271页。

3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79页。

37 国务卿贝尔纳斯致驻苏大使哈里曼电，1945年7月4日。《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38 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转引自《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6年第4期。

39 驻苏大使哈里曼致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电，1945年7月10日。《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40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6页。

41 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第272——277页。

4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7页。

43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415页。

44 同上。

45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54——655页。

46 同上。

4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7页。

4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3——164页。

4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2页。

50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21——222页。

51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52 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8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3页。

第 五 章

毛泽东确立联苏抗蒋战略

一 战略还是策略？

1945 年 2 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只支持国民党，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由原来的扶蒋联共或拉共转向扶蒋反共。4 月 3 日，赫尔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和苏联，促使英、苏两国领导人赞成和支持美国新的对华政策。4 月中旬，赫尔利从苏联回美国做短暂停留后，于 4 月 22 日返抵重庆。4 月 28 日，赫尔利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着重说明美英苏三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意见。

赫尔利的上述一系列行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4 月 5 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赫尔利 4 月 2 日的讲话，并发表文章，对赫尔利的讲话进行批评。文章说，赫尔利 4 月 2 日的讲话“只是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并且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①4 月 3 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署名白克的短文，进一步批评赫尔利的 4 月 2 日讲话。文章认为，赫尔利关于“中国只有在打败日本的军事统一完成以后，才能希望该国政治上的统一”的说法，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国际国内民主人士都会以为遗憾的。”②4 月 30 日，《新华日报》又刊登赫尔利在 4 月 28 日

重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并发表编者按，批评赫尔利在讲话中对中共派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一事的评论不符合事实。

从中共对赫尔利的这些批评能否得出结论，认为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刻认识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由扶蒋联共或拉共转变为扶蒋反共了呢？当然不能。

中国共产党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之前就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以扶蒋为主”③，或“偏以扶蒋”，④并对美国可能与中共的合作或对中共可能提供的援助表示怀疑和失望。毛泽东在3月1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⑤3月下旬朱德又对谢伟思说：“我们真的不指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武器了。”⑥但是应当说，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可能与中共合作或对中共可能提供的帮助仍然抱有很大希望。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王若飞的指示中，对将来苏美英等大国干涉中国内政，迫使蒋介石做出“民主让步”抱有希望。⑦。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两次与谢伟思举行长谈，再一次全面阐述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谢伟思回美国后促使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4月4日，谢伟思离华回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期待着他能给中共带来佳音。

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对赫尔利的讲话进行了批评，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并没有批评美国政府。其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赫尔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也许只是赫尔利本人的意见，或者只代表美国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期望并努力促使美国政府认清中国的现实，纠正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赫尔利进行了温和的

批评，但又尽量避免批评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仍然大力宣传盟国与中国合作，以及美国与中共合作的重要性。

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之后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没有关于赫尔利言行和批评赫尔利言行的任何文字。直到5月8日，《解放日报》才转载《新华日报》所刊之赫尔利4月2日讲话和4月5日，4月6日的两篇批评赫尔利讲话的短文，而且未做任何其它评论。《新华日报》发表的两篇短文也只限于对赫尔利本人的批评，而且在批评赫尔利的同时说明中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4月5日的文章说："要最后打败日本，有赖于中国几百万军队的牺牲奋斗，我们有的是人力，所缺的是武器，这是我们有赖于盟邦援助的地方；美国有的是物资，缺的是人力，这是美国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们彼此都需要帮助，都需要合作。"4月8日的文章在批评赫尔利的同时又表扬赫尔利，说："赫尔利将军继史迪威将军、高斯大使之后，致力于促进我国团结统一之即早实现，盛情厚意，中国人民深深感激。"

有人往往用毛泽东在4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中共对美政策转变的一个标志，或者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向扶蒋反共。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或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⑧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赫尔利的4月2日讲话，提醒英美两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不要采纳赫尔利执行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政策。但从这段话，却不能得出结论，说毛

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美国政府采纳了赫尔利的政策。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在长达5万多字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内容也有5千多字。但仅有这一百来字对英美两国政府可能执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婉转的和提示性的批评。报告中却有大量内容论述中美苏英几大盟国的团结及其重要意义，论述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和中国及外国一切反动派的预料相反，英美苏三大民主国一直是团结的。他们之间，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可能发生某些争议，但是团结终究是统冶一切的。这是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克里米亚会议最后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英美苏三大民主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团结，最后地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很快就可结束"；"英美中三大国团结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事业上。由于中国人民在八年战争中的长期艰苦的奋斗，英国在东方的协同作战，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使战争迫近了日本的大门。……苏联已经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件事给了中国人民及太平洋各国人民以极大的兴奋。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这样说：到达最后地完全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我们决不可轻敌；但是胜利的把握是更大了，我们一定能胜利。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象现在这样有利的国际条件，这个条件鼓励中国人民支持了长期的战争。"在谈到外交政策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与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

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中国人民将和美英苏法各大国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巩固的与持久的’世界和平”。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表明，在赫尔利4月2日讲话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尽管对美国政府可能采纳赫尔利的错误政策有担心，并提醒全党警惕这种结果的出现，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仍是以表扬和争取友好合作为主，而以批评和斗争防范为辅。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的两大报纸《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4、5两个月份，这两大机关报大量报道美英等盟国活动的消息和有关文章，关于美国的报道和文章多是赞扬和友好的态度。4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刚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是“民主的巨星”。4月16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人们要坚持罗斯福总统的方向，即遵循“他的进步的展望，对法西斯侵略誓不妥协的态度，以及他为确保将来世界安全而作的努力。”⑩4月19日，《新华日报》在题为《保卫罗斯福总统的理想》的时评中，对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一篇讲话给予高度赞扬，说他“保卫了罗斯福总统的理想。”“对于杜鲁门总统的演说，我们抱有期望，也抱有信心。”⑪

后来，事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怀疑。甚至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都产生了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政策的忧虑。针对这种状况，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在5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的宣传方针仍然是：向人们说明，“美国要迅速彻底打败日寇，并减少自己牺牲，绝对需要联合中共力量。因而专门扶蒋的政策，将来不能不变，就是现在也不会助

蒋进行反共内战。”⑫这就说明，直到5月底，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认识到，美国政府已经确立了扶蒋反共政策，而且仍期望与之进行积极的合作。

正当王若飞致电中央，提出中共对美政策的宣传方针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表总结讲话，着重阐述了国际形势问题，比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还多。政治报告中对英美，特别是美国，主要是赞扬，主要是阐述英美苏中几大国的团结与合作及其意义。总结讲话中对英美，特别是对美国，则主要是批评，主要是阐述并批评英美等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反对苏联的行动，阐述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必然失败，以苏联等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目前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而社会主义则正在走上坡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开始将赫尔利4月2日讲话与美国政府联系起来，指出，现在美国政府不承认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的。关于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是想控制中国，中国将来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抗战前，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抗战中国民党依靠美国，中国可能变为以美国为主，美国插一支足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发生这一变化。”毛泽东曾说，政治报告“黑暗讲得少”。而总结讲话则提醒全党，要充分看到困难。因难问题，毛泽东列了十六条，其中有四条是国际方面的：一是“外国大骂”，即美国大骂我们，威胁我们；二是斯科比的危险，即美国可能对我们干涉；三是“不承认”，即英美等国不承认中共，不给中共援助，可能发生对抗；四是“外国无产阶级和苏联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

困难来时，远水不接近火。⑬四条困难，有三条是美国可能对我们的威胁和干涉。总之，总结讲话，说明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必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6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主任汇报会上第一次全面概括美国的远东政策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⑭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要估计最坏的一着。6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的指示中，第一次明确将赫尔利4月2日讲话和美国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指示说：“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府已决议全力扶蒋，不给我们援助”，只因“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因此，指示提醒林平，要警惕“蒋美特务合作”，对我们进行破坏。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认识，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6月11日举行的中共七大闭幕会上所作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在闭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这一完整的概念。毛泽东说：“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毛泽东进一步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⑯中共七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指示，说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广东区党委发出指示，说明“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国民党是“依求

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因此，指示要求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迎接新的情况出现。[17]。17 日，中共中央又给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答复他 5 月 30 日来电提出的建议，向他明确指出：“美政府目前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因此，指示认为，王若飞在 5 月 30 日所提的对美政策的宣传方针是不合适的。指示说：“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促使美国觉悟，而不是预言美国不会助蒋内战与必会联合中共。须知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18]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变化，还表现在当时驻延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斯特尔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斯特尔在 4 月 12 日的报告中说，中共对他本人和其他“友好”美国人的态度仍然是热情的。最使共产党人感到不愉快的是罗斯福明显地和赫尔利一鼻孔出气。然而，斯特尔认为，共产党人仍将力图和美国合作，因为他们感到没有什么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可是，到了 6 月初，斯特尔报告说延安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共产党官员不掩饰他们对美国的担心和忧虑。一些事态的发展使这种新的气氛更加突出。可能由于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担心一场苏美交易或许会使斯大林在一旦参加对日作战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斯特尔写道，说得更具体些，中共担心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这样美军就可能突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让国民党部队尾随而来。总之，到了 6 月，中共已经开始感觉到，美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的军事行动是为国民党打先锋的[19]。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 5 月底和 6 月初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扶蒋和反

对中共，从国际上来说，主要是在1945年5月初法西斯德国被打败后，美国和苏联的矛盾开始出现。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4月下旬开始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就波兰问题、阿根廷问题以及联合国组织的权力行使等一系问题上的争论和矛盾，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政治分野初露端倪。这种国际形势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5月底和6月初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扶蒋和反对中共，从国内来说，主要是赫尔利在中国贯彻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大大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气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决定坚持独裁统治，一党专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会议确立了反共反人民和支持内战的基本方针，蒋介石在大会期间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20]会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公开宣称：将以美国援助的武器进行反共内战，并调集军队，准备进犯解放区。国民党六大的召开及其结果，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不会如此嚣张。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5月底和6月初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扶蒋和反对中共，还与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两大事件有关：一是在希腊发生的英国占领军在斯科比的指挥下，武装镇压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事件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二是在美国发生的《美亚》杂志案件，使得以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对中共

友好的美国人士遭受逮捕和审讯。这两件事都是国际上的反共事件。希腊的反共事件给蒋介石国民党带来鼓舞，他们在国民党六大前后公开表示期望中国在美国的干涉下，走希腊的道路。美国的反共事件则直接配合了希腊的反共事件和赫尔利在中国国内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思想行为。这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赫尔利，以至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绝不只是赫尔利的个人意见，或蒋介石国民党的独立行动，而是有美国政府给以撑腰的，是国际反共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1945 年 5 月底和 6 月初，即中共七大结束前后，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转折点。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七大也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呢？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如牛军在其所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书中说："1945 年 4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改变对美政策的转折点。"[21]章百家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认为："1945 年 4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这一转折是由争取友好合作的战时政策转向以防范为主的战后政策，即：防止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防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防止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22]应当说，这些学者对中共对美政策的有关论述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们关于中共七大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的论断却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

首先，在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 1945 年，笼统地说在这一年召开的长达五十天的中共七大是中共某一项政策的转折点，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共七大召开时，德国法西斯还没有被最后打败，旧金山会议还没有开幕，美苏矛盾也还没有明显暴露。中共七大召开时，国民党六大还没有召开，蒋介石独裁反共的真面目尚未完

全暴露。这些，都使得美国全力扶蒋和反对中共的政策还不甚明朗。而到中共七大结束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直到这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又何谈其对美政策的根本转变呢？

其次，是中共七大应当以什么为标志？如果以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标志，那么，根据以上论述，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作为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虽然对赫尔利等帝国主义分子有所批评，对美国政府可能采纳赫尔利的政策提出了警告，但报告的主旨仍是赞扬美苏英等盟国的团结，强调中国和盟国的合作，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毛泽东在政治报告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的题目下，先后两次提到中国人民要努力配合盟国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题目下，毛泽东先后三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作战；毛泽东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具体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28]一个主旨是强调与美英苏等盟国合作的政治报告，不可能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

如果中共七大前期，或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不能作为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那么，中共七大结束前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重大转变能否作为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呢？显然也不能，因为认识的转变不等于就是政策的转变。认识的转变只说明政策转变的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并不说明政策转变的客观条件也完全成熟。当时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日本侵略者还没有被打败。因此，中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了美国已经实行

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但与日本侵略者比较，中共与美国的矛盾毕竟不是主要矛盾。更何况，美国与中共在抗日这一点上仍是共同的。这种客观条件就决定了中共必然在战略上实施与美国继续合作的方针和政策，而不是相反。

为进一步说明中共七大不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还必须明确和区分两种政策概念：一种是战略性政策，一种是策略性政策。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战略性政策是决定全局和在一个较长时期或完整阶段内起作用的政策。策略性政策是在局部和较短时期或部分阶段内起作用的政策。战略性政策决定策略性政策，策略性政策服从战略性政策。二者既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更不能割裂。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而且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为了实现这两种战略性政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性政策。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有时以主动联合求得团结，有时以批评和斗争求得团结；在联合时不能放弃原则，在批评和斗争时要有理、有利、有节。主动联合也好，批评和斗争也好，总的目的或战略目标都是为了团结，即实现反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也同样适用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1937 年前）就形成并付诸实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在 1941 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形成并付诸实施。毛泽东在 1944 年间确立的联美拉蒋战略则是上述两种战略性政策的集中表现。毛泽东之所以把联美同拉蒋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实行的扶蒋

政策使得自己与蒋介石政府绑在了一起。

弄清了战略性政策和策略性政策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就会明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也不会改变。既然如此，毛泽东确立的联美拉蒋战略也不会改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共七大召开时或结束时，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断言中共七大是中共对美战略性政策的转折点显然是不妥当的。

是否可以说中共七大是中共对美策略性政策的转折点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更严格一点说，中共七大结束前后才是中共对美策略性政策的转折点。因为作为一种政策，是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也许从中共七大召开时，甚至从4月2日赫尔利讲话时开始，中共对美策略性政策就在转变过程中。但毕竟那时是以争取友好合作为主，而以批评和斗争为辅。直到中共七大结束前后，中共对美策略性政策才发生了根本转变。这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以友好合作的态度不可能使美蒋方面改变态度，只有以批评和坚决斗争的态度和行动，才有可能使美蒋方面改变态度。但是，这种批评和斗争绝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继续合作，是为了继续实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45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负责人林平的指示中，虽然指出“美国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们帮助”，要求注意“蒋美特务合作破坏我军”，但同时，指示又要求对美方仍“可表示愿与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敌情、气象及地上救护。”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虽然严厉批评了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但这种批评仍给美国留有余地。毛泽东说：“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

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㉕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只是扶蒋反共的人和他们执行的政策；对美国政府中持现实态度的人士，中国共产党仍是希望合作的。另外，还应当注意到，直到中共七大结束时，中共报纸从来没有公平批评过美国或美国政府。过去只有《新华日报》发表、《解放日报》转载过批评赫尔利4月2日讲话的两篇短文，也只对赫尔利进行了温和的批评，而且只字未提美国或美国政府。就是说中共是将赫尔利的反共言行同美国政府区别开来的，而不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虽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总结讲话和闭幕词中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行为进行了谴责，但这两份文件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

中国共产党直到七大结束后较长时间才开始公开批评美国或美国政府。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长篇时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批评美国的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将6月6日在美国《美亚》杂志六人被捕案与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第一次公开把赫尔利4月2日讲话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关于《美亚》杂志案件，文章说：“六人被捕案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什么泄露‘秘密’，而在于六位友华人士剧烈反对国务院里面部分统治人物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六人被捕案，无疑不是偶然的，而是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的事件”，“六人被捕案，正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剧烈争论的表面化。”关于赫尔利的4月2日讲话，文章说：“由于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内部绥靖主义分子的协力活动，使近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一次，文章严厉批评赫尔利的讲话“粉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称之为‘并无法西斯野心’，‘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而走向民主政府’”；“他把阻碍中国统一战线的原因，归之于‘有武器之政党’，就是说，归之于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他抛开政治上的民主团结，而谈中国的‘军事统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更感觉到有恃无恐，增强了坚持独裁，摧残民主，准备内战的决心；本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公开声明将从盟国租借武器进行内战，即是一个例证。”文章还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反动路线。这条路线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而又不是中国人民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头子与杀人魔王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因而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文章认为：“主张这条路线的有美国的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是其代表者。”尽管如此，文章仍表示，只要美国能改变现行政策，中共仍愿与之合作。文章说：“今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究竟将要怎样呢？支持独夫民贼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呢？还是赞成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呢？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加以慎重考虑”；又说：“我们中国人民欢迎美国人民给我们以更有效的援助，我们准备和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一致努力，配合作战，来完成击败日寇和重建远东和平的伟业。”㉘

6 月 25 日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又分别于 7 月 10 日和 12 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进一步批评和公开谴责赫尔利的反动政策，明确指出，赫尔利 4 月 2 日讲话，“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

的意见”；“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因此，如果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㉗

中国共产党在严厉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同时，也在实际行动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中共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解放区，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不再准许解放区的美蒋组织派人到前线去，特别不准许美军在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并监视其行动。”㉘驻华美军曾经提出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构；在中共各军区、军事区建立通讯网；在敌后增加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和派人到山东降落等等。这些要求均被拒绝。

舆论上的严厉批评也好，实践中的拒绝合作也好，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能够合作。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中说明，拒绝与美军的合作，目的是“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中共中央在另一份指示中说明，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其改变政策；拒绝美军合作，其目的是使美国感到“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从而“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㉙毛泽东在7月底发出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仍指出，我们对赫尔利政策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

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因此，“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能停止的。”[30]苏军出兵东北后，毛泽东在8月11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又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31]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说明，中共对“赫尔利之流”以至美国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在实践中暂时中断与美国的合作仍是中国共产党对美策略性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一政策仍是服务于中共与美国合作、继续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政策的。尽管中共要求对蒋介石绝对不要存幻想，而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斯科比危险”也依然存在，但是，“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32]

既然策略性政策是服从于战略性政策的，而中共七大前后中共对美国战略性政策又基本未变，那么，笼统地断言中共七大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转折点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　联苏抗蒋

虽然在中共七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上没有放弃与美国的合作，但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及美国顽固地执行扶蒋反共政策，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考虑调整其外交战略的重点，即由以联美为重点的外交战略逐步转向以联苏为

重点的外交战略。

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和对美政策在实质上是不同的。中共与苏联之间尽管有过一些历史的宿怨和矛盾，但双方毕竟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和朋友，共同的革命利益和革命目标将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不多，但中共始终将苏联看作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最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即使在毛泽东确立联美拉蒋战略之后仍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中共一直将苏联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力军，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都是采取积极地、友好地合作的政策。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苏联陷于对德战争之中无瑕顾及东方问题，所以中共在抗战后期没能把苏联作为自己外交战略的重点而与之合作。从1945年初开始，特别是从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必将转向东方，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特别是在确立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外交战略时，不能不考虑苏联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45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就指出了苏联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并指出，苏联参战后会对中国政局，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发生影响。[33]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另一份党内指示中又说："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4]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然性，并且开始考虑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重点。4月18日，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就是中共考虑调整外交战略的开端。指示说：

“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将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时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今后我们的任务，在配合苏、英、美三大盟国（过去一年只提配合英、美）作战中，主要配合苏联”。指示还说：必须使干部了解，“英美虽然在抗日中帮助了中国，但其政策目前还是偏重扶蒋”，“目前许多干部对美国还存在着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这种盲目是有害的”；必须使干部了解，“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民最先的主要支援”。根据这两点，所以“今后我们配合盟军，主要是配合苏联，而且现在就要加紧准备这种配合”。如何准备这种配合？首先，在敌占区着重宣传苏日中立条约的废除，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远东战争没有苏联参加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宣传在苏联援助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总之，进行这些宣传是为了使敌占区人民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前途，以增强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信念。其次，是扩大解放区，并把主要发展方向放在热河、辽宁和雁北地区，大力发展这些地区，使之成为直接配合苏联作战的前进阵地。第三，是教育干部，积极培养能代替所有工作的干部，以备在将来开辟察北、东北，配合苏联作战时能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同时抓紧主力军、地方军训练与民兵训练，以备将来能抽出若干主力，作为开辟察北、东北，即配合苏联收复东北之用。

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的这一指示既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外交战略的开端，又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重点由联美转向联苏的标志。这一指示所表达的思想很快就反映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高度赞扬苏联，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

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及其以后的北伐战争时，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毛泽东又预言，“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35]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讲话中进一步说明，美英苏法中五大国家团结起来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五大国中又以苏联为首；又说，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说没有英美无产阶级和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不能胜利。毛泽东考虑到将来苏联出兵东北后，可能给中共造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就是通过与苏军配合作战，夺取东北做为自己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他说，东北四省很重要，有可能在我们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就有了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就有了基础。要夺取东北，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当然不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一次讲话中又强调，我们一定要选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志，这对于我们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苏联出兵东北后，我们要在东北大力发展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着中共七大的结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日益暴露，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讲话和闭幕词中就强烈谴责了美国在国际上执行的反苏反共政策，在中国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共中央在七大结束后的一次党内指示中也正式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同时又指出：“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36]这种认识显然加强了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基础。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及时调整了外交战略的重点，即将自己外交战略的重心由联合美国

转移到联合苏联，利用着重配合苏联对日作战，创造解决国内问题的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共调整外交战略时，正是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易时。由于美苏之间的交易，苏联表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即苏联对华政策也是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的态度极为不利于中共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实施。

中共七大结束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外国无产阶级和苏联有可能长期不援助我们。为此，他号召全党，国际没有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又预言，国际援助最后总要来，苏联援助最后总要来。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国的援助。因此，中共七大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以联苏为重点的外交战略。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根据同年 2 月与美国和英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对日本宣战。8 月 9 日凌晨，苏联三个方面军共 150 多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攻入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苏军进入东北后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主力。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军攻入中国东北后，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8 月 9 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 月 10 日至 11 日，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反攻命令，令中共所属各部队配合苏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其中第二道命令，令八路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即日向东北进发。12 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37]20 日，毛泽东又致电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

副参谋长耿飚和一二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兼晋绥野战军司令贺龙、八路军晋绥军区政委林枫，指出，在苏联红军南下攻入中国东北地区后，你们的主力部队的任务就是“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和大同”等地。[38]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和晋察冀分局的电报，要他们抽调九个团（每团不少于1500人），即行开赴东北，其任务就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39]自8月中旬起，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召开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誓师大会，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发出了“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号召。[40]尽管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不了解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如何，但仍尽一切努力，采取一切措施，积极与苏军配合。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冀察晋分局，指出“红军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的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一部武装进驻。”[41]从苏军攻入东北开始到8月底，中共冀热辽军区各部队积极配合苏军，先后解放了赤峰、围场、平泉、承德、绥中和山海关等地。东北抗日联军则在东北境内从各方面配合苏军对日作战。中共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所派出的部队则日夜兼程开赴东北。

苏联出兵东北，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上半年确立的以联苏为重点的外交战略是正确的。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

东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国共产党配合苏军作战的积极行为，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抗战后期实行的联美拉蒋战略转向战后初期的联苏抗蒋战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由实行联美拉蒋战略转向实行联苏抗蒋战略，既是自觉地，又是不自觉地。所谓“自觉地”就是说，中共实行联苏抗蒋，并不是由于苏联对中共的友好表示和主动支持，而是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所谓“不自觉地”，就是说，中共实行联苏抗蒋，是由于形势所迫。这种形势，一方面是苏联出兵东北，成为中国政局变动的决定性力量，而且苏联与中共有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顽固执行扶蒋反共政策，使得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希望逐渐破灭。此外，在日本投降前后，美蒋方面还有联合和拉拢苏联压迫中国共产党就范，促使中共交枪和投降的阴谋，就象法共和意共所做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了日寇投降以后的内战危机。8月11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的指示中指出：“苏联参战，敌寇投降，内战迫近，华南马上出现蒋、余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42]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严正指出了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的严重危险。毛泽东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43]这样，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确立的在战略上的联蒋或拉蒋的方针就变为战后在战略上的抗蒋方针。那么，以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配合国内的战略抗蒋方针？毛泽东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力量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其次要努力争取国际支援，主要是苏联的援助。总之，联苏抗蒋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做出的战略决策。

击溃日本关东军是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因此，苏军十分欢迎中共各部队奔赴东北前线配合苏军对日作战。两军的配合作战，促进了双方的战斗友谊，他们在战地结下了友好合作关系。8 月 30 日，中共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同苏军在山海关会师。当时，中共指挥员曾指着背后巍峨的长城说："我们两国的友谊，将象这万里长城一样，永存于世！"苏军指挥员也指着海滨说："还象你们的渤海一样浩瀚、深厚！"[44]随后，曾克林部就在苏军代表陪同下，在山海关乘火车进抵已被苏军解放的沈阳，途中还接管了铁路沿线的兴城、锦州、黑山等 15 个县市。9 月 5 日，曾克林部抵达沈阳，经与苏军协商，暂时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对沈阳进行接管。曾克林任沈阳市卫戍司令。14 日，中共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率军直机关及直属部队抵达沈阳，并经苏军同意，接管辽宁省和沈阳市，任命朱其文为辽宁行署主任、白希清为沈阳市长。[45]就在曾克林、李运昌等部进入沈阳前后，中共山东渡海部队也在大连与苏军正式接洽。苏方表示，对中共军队在乡村开展活动不加干涉。在此前后，东北抗日联军不仅直接参加苏军在东北各地的军事行政机关，而且在苏军的支持下，将所部组成五十余个工作组分赴东北各个重要城镇和战略要点，收复东北失地，并发动群众，肃清日伪残余，保证抗战胜利果实。[46]

但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与战场上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却有一定差别。8 月 14 日，苏联政府在条约中表示，苏联只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它的国内敌人，即中国共产党。8 月 15 日，美国驻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命令，规定在中国战区，苏军作战地区的日军向苏军总部投降，其它地区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面对麦克阿瑟这一排除中共受降的命令，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除表示支持

外，只提出两点补充意见：1、让苏军在库页岛受降；2、让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北半部。[47]在这里，他们没有维护中共特殊利益和地位的任何表示。8月27日，当中共部队配合苏军对日作战已取得重大成果时，斯大林还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蒋介石担心红军会推进到张家口和北平，并与这些地区的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他说他已再次向蒋保证，他不想占领这些地区，将来也不想占领。他还说明，到目前为止，苏军在满洲尚未发现任何共产党游击队，也未接触任何地方的共产党。[48]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为什么在中共军队密切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却对中国共产党无任何表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抱负——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取胜——根本不符合斯大林要在划分‘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同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达成协议的宿愿。为实现这一宿愿，只有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政权方有可能：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人接受蒋介石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控制。因此，斯大林一直对中共领导施加压力，要他们与国民党达成这样一种妥协。”事实正是如此。当时，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尽快去重庆同蒋介石会谈，并说毛在重庆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49]斯大林还告诫中共应决心停止内战，取得蒋介石同意实行民主化。从斯大林的论断来看，好象中国内战的责任只在中共方面，所以，他总在对中共施加压力。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之所以在战后不支持中共，并屡次对中共施加压力，还因为斯大林根本上并不信任中共。早在战争后期，斯

规定："红军在东北有与地方上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抗日部队合作的需要。"于是，中共就向东北派大批部队。[53]中共对此一行动的解释是："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54]虽然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只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其国内敌人即中国共产党以任何支持，但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同苏联的谈判和交涉，在苏军的默许下，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不以公开名义，不用八路军番号，或秘密或以自治军和地方军的名义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在一份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中共各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并且"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心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对苏联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联络，亦不要请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55]中共中央在另一份指示中指出，中共各部队进入东北，不能用八路军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可能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56]在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种艰难的方式去争取苏联的支持，以与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对抗。同时，苏联的态度又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与美国妥协与合作的战略方针，以便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活动并创有根据地，所以不能撤；中共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第一书记，陈云、程子华、叶季壮、伍修权等为常委，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立即陪同苏军代表赴东北工作。经过谈判和交涉，苏方最后同意：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允许中共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能进入东北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允许中共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即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铁路沿钱地区。

9月17日，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离开延安乘苏联飞机赴东北，13日抵达沈阳。彭真一行抵达沈阳后立即与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并就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联系之初，苏军向彭真等提供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中共军队。彭真等听了非常高兴，并立即报告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但等中共部队到达沈阳时，苏军又临时变卦，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由于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出尔反尔，结果搞得中共部队十分被动。[52]随后，同样的事件又发生多起。

虽然苏联对中共进行很大限制，使得中共在东北不能有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军事上的迅速进展。但是，中国共产党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争取苏联的支持；如果不能争得苏联的支持，也努力争取苏联不反对中共在苏军占领区的行动。为实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极力利用中苏条约和苏联方面宣言中的可乘之机。中苏条约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红星报》又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道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中苏条约还

大林就多次指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共产党。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向美国议员团的代表们说：中共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中共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50]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之所以在战后不支持中共，并屡次对中共施加压力，还因为斯大林根本不相信中共有能力同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相抗衡。斯大林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51]

关于苏军同中共军队的合作，斯大林早就有所解释，说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苏联对日作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对苏联军队来说，利用这些地区和中共部队是很自然的。但苏联政府害怕这样做，因为这会与国民党之间引起麻烦。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东北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不能不影响苏军在东北与中共部队建立的战地友好合作关系。9 月 14 日，东北苏军指挥部派卫斯别夫中校为代表，携带苏军驻东北最高军事长官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件，与中共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一起，由沈阳乘飞机抵达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谈判解决双方在东北的关系问题。苏军代表提出：根据苏军统帅部指示，在苏军从东北撤出之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因此，请现已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撤出沈阳、长春、平泉等苏军占领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方面自行解决；中共中央应派负责人到东北，以便协调双方的行动。针对苏方意见，中共领导人答复说明：中共军队可以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并撤出沈阳、长春、大连等地，但热河、察哈尔和辽宁的一部分地区，因自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有八路军

然而，上述苏联对中共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会有所变化。9 月 11 日至 10 月 3 日，美、苏、英、中、法五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义，讨论缔结和约和管制日本等问题。这是同盟国家在取得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胜利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有可能对各同盟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美苏两强国之间的利益进行安排或妥协，所以才有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进一步限制，这种限制能换取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和妥协。但是，会议由于美苏争执不下无结果而终，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在美苏争论中，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积极追随美国的立场，于是，苏军就在中国东北采取冲破中苏条约的作法：一是拖延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时间，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二是在东北造成对国民党政府的牵制力量，即积极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如果说，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之前，苏军在东北是消极支持中共，而这次会议之后，苏军就开始积极支持中共了。从 10 月上旬到 11 月中旬，苏军对中共的帮助主要有：1、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活动提供方便。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东北的中共部队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随后，苏军远东司令部正式通知中国东北苏军，不限制佩带此种标志的部队的行动。2、将缴获的部分日军武器装备移交给中共军队，而不象过去那样给予过多的限制。3、不仅将由山海关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交给中共军队控制，而且将葫芦岛和营口这两个进入东北的海上通道也交给中共控制。这就进一步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

苏联政策的转变，为中共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自日寇投降以来，中共派出大批部队和干部陆续开入东北，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决策，决定长江以

南部队撤江北，华东部队撤华北，抽调华北部队控制冀东和热、察两省，并相机进入东北。但是，由于苏军的限制，中共部队进入东北相当谨慎，行动非常迟缓。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发出《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就反映了这种谨慎。指示说："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在执行中还可能发生许多阻碍"，因此，"我发展东北决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重点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57]10 月初，苏军东北当局通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要中共抽调 30 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北大门，并决定立即向中共提供步枪 30 万枝，机枪 100 挺，大炮 15 门。苏军东北当局甚至转达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同时，苏军更主动表示愿将东北全部交给共产党人，并且不顾外交条约限制，催促共产党人迅速接收各省市政权。苏联的积极态度，使中共至为欣慰。10 月 6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苏联既下决心支持我方，"我应表示我方自有办法。"但向东北派 30 万人办不到，现在一个月内可有 10 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 5 万到 8 万。同时，电中要求东北局与苏军当局商量能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使中共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条铁路线上与蒋军的重大冲突中，能得到苏联的"必要的援助"。中央要求东北局"力求此着之成功"，以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利"，从而对东北及全国局势产生"大影响"[58]。

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国民党政府与苏军东北当局关于东北接收的交涉开始，苏联担心中共接收东北地方政权会引起外交上的

麻烦，因而对中共进入东北的部队再次给以限制。10 月下旬，当苏联了解到美国在华北的登陆部队开始公开帮助国民党抢占关内进入东北的铁路，并武装执行护路任务后，苏军再次决定对中共部队进入东北给以支持。10 月 25 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同时开始全面交接政权工作。中共的一份指示称：11 月 15 日前"如顽方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随之，苏军即应东北局之请求，先后将营口、葫芦岛等地较交中共驻防，以阻止蒋军由此登陆。苏联的态度，促使中共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蒋介石 80 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他承认中共在华北和东北的自治地位，从而实现全国的和平局面。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别向苏联政府和苏军东北当局提出，要求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中共的行动予以帮助：一是"推延撤退时间至明年（1946）一月或二月，因美军要到那时或更迟才会撤出中国，热河友军则请留至十二月底才撤"；二是"在上述期间请求友军拒绝蒋军登陆及接收政权"；三是"允许我方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力量"。如得苏联支持，其中关键是在 11、12 两个月内不许蒋军登陆接防，则中共在 10 月底，可有 3 万军队，6 千干部到东北，11 月将有 6 万军队，2 万干部到东北，12 月将有 3 万军队，5 千干部到东北。总计至 1945 年底，共有 12 万军队，3 万干部到东北，而蒋军在 1945 年则"无入东北之望"。28 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要求即按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59]

10 月下旬和 11 月上旬，毛泽东的联苏抗蒋战略取得重大成效。中共军队大规模开入东北各大中城市，全面接收政权并布防。

平绥、平汉、同蒲及津浦路均被中共军队切断，在上党、邯郸等战役中，国民党近 20 个师被歼。蒋介石国民党通往东北的海陆空通道全被堵死。面对这一有利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60]上述形势如果继续下去，中共的这些目标未尝不可以实现。但是，这种有利形势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于东北问题交涉遇到的麻烦所破坏。

早在 10 月上旬，蒋介石就派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前往东北负责接收。国民党第 13 军也于同时在广州、九龙乘美国运输舰前往大连登陆，准备接防，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正式交涉由此开始。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东北交涉开始时，正是苏美两国在伦敦外长会议上争执不下无结果而终时，所以，苏联就在东北采取积极支持中共，而努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措施。从 10 月上旬到 11 月中旬，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交涉的第一阶段。双方讨论的中心是国民党向东北运兵问题。国民党的交涉方针是利用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要求苏联允许并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再辅之以整编伪军，迅速确立在东北的军事优势。东北苏军则针锋相对，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国民党大规模向东北运兵。在彻底解决东北悬案之前，不许东北有大量国民党军存在。

10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就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说国民党第 13 军在大连登陆，违反中苏条约关于大连港商业化的规定，苏联拒绝任何军队在大连港登陆。10 月 13 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与东北苏军当局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谈判一开始，熊式辉便提出：国

民党军队准备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希望苏军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给予协助。马林诺夫斯基在答复中表示，在大连登陆涉及中苏条约，应由两国政府之间解决；营口和葫芦岛可以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但苏军不能保证安全，亦不了解港口的设备情况。这实际上是婉转否定了国民党军队从上述几个港口登陆的要求。但他建议国民党军队最好经铁路进入东北。而这时，从山海关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已被苏军让与中共军队控制。所以，这一建议也难以实现。17 日和 19 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与东北苏军当局又就大连登陆问题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蒋经国还同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均未获得成效。[61]

国民党政府在大连登陆的计划失败后，又决定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因为，在这两处登陆，苏联在外交上没有反对的理由。而且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正式谈判中已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港口登陆。25 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国民党军队将根据熊式辉和马林诺夫斯基达成的协议，于 29 日在营口和葫芦岛两处登陆。26 日，熊式辉也向东北苏军当局转达了蒋介石委员长的这项命令。28 日，蒋介石会见苏联大使，要求苏方为第 13 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提供保证。29 日，东北行营根据蒋介石指示与苏军代表举行第四次正式谈判。苏军代表表示，可以掩护国民党军队在营口登陆，在葫芦岛不能负责；国民党如果在北宁路运兵，在锦州至山海关一段，苏方也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的安全。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也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同意第 13 军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

但是，苏联一面公开表示信守以往谈判中的诺言，一面却将营口和葫芦岛交给了中共军队，利用中共军队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11 月 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就通知国民党政府，营口已被来历

不明的军队占领。当载满国民党军队的美国运输舰抵达营口时，发现该港已被中共军队占领，他们正在登陆地点附近挖掘战壕，修筑路障。美军指挥官曾上岸与中共代表联系登陆，但遭到拒绝。在葫芦岛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62]11 月 5 日，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五次正式谈判。熊式辉质问，既然苏联方面已表示部队在营口不会出麻烦，为何现在港口周围有大量共军？马林诺夫斯基却反驳说，苏军不能阻止中共军队在营口登陆，而葫芦岛早已被中共军队占领，苏军不能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而且从 10 日起，凡是苏军撤出地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方均不再过问。[63]马林诺夫斯基还谴责国民党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再次表示反对东北行营整编曾与苏军作战的伪满军队。第一阶段交涉由此中断。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在东北交涉的第一阶段失败后，就在美国的积极援助下，一方面在山海关地区向中共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将东北行营撤出东北，从而对苏联发动了强大的外交攻势。11 月 15 日，国民党政府通知苏联大使馆，由于苏方一再阻挠接收东北，中方决定东北行营从长春撤至山海关，后撤于 17 日至 23 日之间进行。同一天，秦皇岛到山海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东北交涉的暂时中断，并不意味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将破裂，更不意味着苏联将继续支持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对抗。苏联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不过是对美国在远东采取霸权态度和国民党政府积极追随美国政策的一种报复和警告。对日战争结束后，苏联外交政策的主旨是争取有利于恢复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以实现与美国的妥协，而不是公开对抗。实际上，苏联并没有预料到国民党政府会采取撤出行营使东北交涉中断的方式。11 月初，当双方交涉遭遇极大困难时，斯

大林还表示希望蒋经国前往莫斯科访问。蒋介石也很快表示同意蒋经国以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64]。因此，苏联在接到东北行营即将撤退的通知后就立即做出反应。11 月 17 日，东北苏军副参谋长巴甫洛夫斯基郑重地通告东北行营代表董彦平：苏军延缓撤兵，以协助中国政府在东北建立政权。[65]苏联驻华大使也于同日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地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以应有之协助；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共产党，过去未曾予以任何帮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产党活动乃由于中央政权未建立之故；如中国政府希望苏军缓撤，可延缓一月或二月。[66]24 日，苏方再次照会国民党外交部，保证国民党军队无阻碍地在长春及沈阳降落。26 日，国民党政府表示接受苏方意见，并决定立刻派代表前往长春，恢复谈判。[67]从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交涉又重新开始。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发动的对中共军队强大的军事进攻和对苏联的强大外交攻势，迫使苏联放弃在东北积极支持中共的政策。11 月 19 日，东北苏军当局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他们根据上级将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决定：1、凡苏军驻扎地区，中共军队不得进入，不准与国民党军队作战；2、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内，亦不准作战；3、中共军队必须退至铁路沿线 50 公里以外；4、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大城市撤出。20 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19 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同日，中共中央即电复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68]苏方政策的突然转变，曾一度引起中共方面的不满。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等反复向苏方代表说明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不

应撤出沈阳的理由，而苏方代表却不作任何解释，只说这是上面的指示不能讲价钱，必须这样做。并说如果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为此，彭真同苏方代表还大吵了一架。[69]随着苏方政策的转变，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不能不作相应的调整。22 日，中央就作出决定，由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实行的“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转变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中共部队继续留在东北活动并与国民党军进行坚决的斗争。23 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你们应根据自己的计划放手进行工作和进行作战”，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70]这表明，中共中央虽然根据苏方政策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但仍坚持中共在东北独立自主地放手开展工作。

从 11 月下旬开始，中共各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陆续从东北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撤出并转往乡村地区。从此以后，苏联政府和苏军东北当局则集中全力与国民党政府交涉军事撤退工作。这样，东北苏军和中共之间就很少直接联系。从 11 月下旬到 1946 年 5 月苏军撤退，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双方之间偶尔有一两次接触，但也谈不上真正的合作。中共的一切政策都是独立自主制定并独立自主执行的。中共代表王炳南曾在 12 月份对美国驻华大使说：苏联的政策是一回事，但中共的政策是他自己的，与苏联的政策无关。[71]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在此时公开作证说：“请把他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区别开来，因为他们是不相同的。……俄国根本不承认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俄国不是在支持共产党。”[72]1946 年 1 月 16 日，苏联也向国民党方面公开表示：“苏方与中国共产党毫无联系，如彼不

攻击苏军，苏方即不予顾问。”[73]总之，此时苏联对中共的政策仍是原来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政策，即不相信中共能与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因而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以免引起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指责。

尽管如此，毛泽东争取与苏联合作的战略方针仍然没有改变。12月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应该了解目前如无友方的直接帮助，我欲占领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如有这种帮助，则有这种可能，当尽一切力量以争取之。前一时期友方似有这种帮助，但以近来情形看似乎又没有了，因为中苏条约不能不执行，苏联不能不保障蒋在东北至少占有一份，否则将在世界暴露苏联不守条约信义，苏联决不会作。”指示要求东北局与苏军东北当局接触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74]随后，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国共双方都对马歇尔寄以厚望。尽管如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仍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苏联的支持，以与蒋介石国民党对抗。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指出：“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因此，电中要求代表团告诉苏联友人，说“我们在东北在全国均和国民党采取坚定的和平合作的方针，批驳党内违背此方针的一切思想，望友方助我实现此一方针。”同日，中央又致电东北局，要他们“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中共的和平合作方针。27日，中央又给东北局发出指示，要其告诉苏军东北当局，“苏联决不能助我进行内战，但可助我争取和平民主及与国民党合作。”[75]苏军撤出东北之前，毛泽东连续几次致电东北局，要他们力争苏联的支持，使得中共在苏军撤出后能占领更多一些地方。3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请速与辰兄（指苏军东北当局）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

部担负占领任务。”27 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指示，要他们力争得到苏联支持，“由我军占领长、哈及中东全线”，以“阻止蒋军北进”。后来中共军队能在蒋军到来之前占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完全是这种争取的结果。

对于斯大林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约束和限制以至不友好的举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有意见的。毛泽东后来所说“对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其中就包括战后初期斯大林和苏联对中共的限制。[76]针对斯大林告诫中共领导人的话，说中共不要与蒋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提出：“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77]应当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苏联的约束和限制也有所抵制；他们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对斯大林和苏联的限制有所突破。但是，为能争取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实现与蒋对抗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的方面是维护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并积极支持苏联与美国的斗争。在美蒋联合批评或攻击苏联时，中共始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的一言一行辩护，指责美蒋方面反苏反共的言论和行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和国际信义的友好举动，深得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赞赏。这也是苏联经常突破与美蒋的协议和条约，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些秘密的帮助和支持的原因之一。

注　释

1　重庆《新华日报》1945 年 4 月 5 日。

2　重庆《新华日报》1945 年 4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年)。

5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1页。

6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3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38页。

8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9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10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4月16日。

11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12 王若飞关于目前大后方民主运动概况及今后方针的请示报告，1945年5月。

13 参见《毛泽东选集补卷》，日本苍苍社，1985年版，第23—47页。

14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8页。

15 中共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进行破坏给林平同志的指示。

1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1103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145页。

18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美蒋反共发动内战的方针给王若飞的指示。

1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8页。

20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244页。

21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22 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转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3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24 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进行破坏给林平同志的指示。

2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2 页。

26 《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25 日。

2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110—1116 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179—180 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179 页。

30 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赫尔利问题给刘冰、张明同志的指示。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第 230 页。

3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30 页。

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8 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61 页。

35 《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2 日。

3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145 页。

37 毛泽东关于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苏联红军给晋绥、晋察冀分局电。

38 毛泽东关于配合苏联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等地给程耿并告贺林电。

39 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三省给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晋察冀分局电。

40 李鸿文、张本政《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42 页。

41 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给冀察晋分局的指示。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26 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26 页。

44 曾克林《大地重光》，载《星火燎原》(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45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46 《东北大事记》第 1043 页。

47 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中译本，第 340—342 页。

48 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415 页。

49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08 页。

50 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63 页。

51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47)，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0 页。

52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二辑；《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53 毛泽东给山东、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的电报。

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第 257 页。

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第 258 页。

56 中央关于我军在东北一律不用八路军名义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1945 年 9 月 15 日)；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 (1945 年 9 月 15 日)

5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99——300 页。

58 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59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报 (1945 年 10 月 27 日)。

60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

61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的指示 (1945 年 11 月 30 日)。

62 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第 63 期。

63 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419 页。

64 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419——420 页。

65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 120 页。

66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 26 页。

67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 47 页。

68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55 年版，第 142—143 页。

69 《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0—646 页。

70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

71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几个月》。

7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74 页。

73 张嘉璈日记，载《传记文学》第 38 卷第 3 期。

74 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

75 中央关于打一大仗决定东北大局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7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0 页。

77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09 页

第 六 章

毛泽东和美蒋的妥协与合作

一 战略退却

自从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以后，美国就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近四年的共同对日作战中，中美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受到了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称赞。国共双方都曾努力争取与美国的合作。然而，美国并没有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采取正确的态度，而是逐步形成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抗战后期，毛泽东曾经确立了联美拉蒋、共同抗日的战略方针。即使在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以后，这一战略方针仍然没有改变。那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实行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希望美国能放弃上述政策。但是，这种批评和抵制未能奏效。

美国在抗战后期制定的扶蒋反共政策，本来就着眼于战后控制中国以至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抗战结束以后，美国绝不可能放弃扶蒋反共政策，而且会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求彻底贯彻落实这一政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

何解除日伪军队武装，接受其投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敌后抗战达八年之久。现在抗战胜利了，它当然有权接收为其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武装。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可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收缴日伪军武装，接受投降，拒绝投降者，即予以消灭。其中一份命令写道："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要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①

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解放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区党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不应稍有犹豫。"②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际，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向美、英、苏三大国政府送出说帖。说帖以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明：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中共军队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投降后的工作；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③1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重申15日给美、英、苏三国说帖所提的要求，并指出：国共两党当使各自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各自的军队受降，这不仅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④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

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乞降到8月26日的短短十几天内，中共各部队就收复大小城市59座和广大乡村，同时配合苏军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

然而，当中国共产党迅速出击，收缴敌伪武装之际，蒋介石却发布命令，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按照既定的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共产党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还下令各地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蒋介石的命令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批驳和抵制。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发两电给蒋介石，批驳他的错误命令，同时，中共各部队积极向前推进，努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其投降。

蒋介石之所以下令阻止中国共产党接收敌伪武装和接受日本投降，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无力接收敌伪武装和接受日本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描述抗战结束时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时写道：“当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东南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再占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想占领东北也不可能。”而且，当时“在中国还有近三百万日本人，其中约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即使日本是被打败了，他仍可以靠他们在争夺统治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⑤在这种条件下，蒋介石国民党要收缴日本军队的武装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在收缴日本武装的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中国了。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而

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也宁愿提供这种帮助。

早在投降之前，蒋介石就与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会谈，就美国助蒋扩大地盘，包括运用美国海军陆战队，达成原则协议。为此，魏德迈还致函美国陆军部，建议增派美军，并授权其在蒋介石军队暂时来不及集结的地方代表蒋行事，从而为蒋调动军队铺平道路。他还要求为此批准他运用一切可能的后勤援助蒋占领地盘。⑥8 月 12 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电美国国务院，内称：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一切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并收缴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为此，他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将所有的在中国的武器，交给国民党政府；并建议，惩罚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作战部队。⑦

美国政府完全接受魏德迈和赫尔利的意见，当日本一宣布投降，经美国政府批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就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除苏军占领的东北地区之外，所有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同时，美国还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人，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绝不要放下武器，其原因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的："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杜鲁门说："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⑧

为实现使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迅速接受日、伪军投降和最终控制中国的目标，美国进行了空前规模地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的行动。魏德迈在一次报告中描述了这次美国运送军队的行动："领先收复失地的整军整师的军队由美国飞机空运到上海、南京和北平。从太平洋调来美国军队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后来运送军队至华北。另有五万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占领平津地区。负有军事占领任务的中国部队的空运工作由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负责。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⑨美国就是这样不惜血本，帮助蒋介石得以接受 120 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投降，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

面对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以图控制中国的行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确立了与美蒋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集中体现在 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蒋介石在抗战时期躲在峨眉山上，执行着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要下山来夺取人民辛辛苦苦得来的胜利果实；蒋介石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完全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关于美国，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既然敌人的方针是拿起屠刀，那么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也拿起刀来，"没有也可以打一把。"毛泽东号召人们对国民党和美国不要存在幻想，并指出："过去我们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露它。"毛泽东还号召全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不要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因

为“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⑩所以，要敢于同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总之，毛泽东的报告为全党制定了与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战略方针，并做好了与美蒋反动派大干一场的思想准备。

然而，在毛泽东报告几天之后，国内外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首先，美蒋反动派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并没有采取与中共公开对抗的方针，而是玩弄起和谈阴谋。8 月 14 日，日本一投降，赫尔利就敦促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随后，蒋介石又连发两次邀请电，要毛泽东务必克日来渝，磋商一切。其实，蒋介石是不愿和谈的。他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取决于蒋介石，而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可以说，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继续努力维持国民党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防止和反对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另一个基本点是在援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尽力避免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即避免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冲突。根据第一个基本点，美国积极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全面接受日军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抢占地盘，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在军事上对中共占据优势。根据第二个基本点，美国在表面上维持着与国共两党的平等关系和公正态度，同时借助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企图在政治上诱使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国民党的控制。美国之所以努力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美国之所以在支持蒋介石时尽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是因为如

果美国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它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干涉中取得成功确实力难胜任；而且这种干涉有可能引起国际上的纠纷而使自己不能自拔；同时蒋介石政府的腐朽统治又使它不愿与这样的政府完全绑在一起；最后，美国战后外交战略的重点是欧洲而不在亚洲，所以，它也不愿在中国陷得太深。基于这些因素，美国企图利用美蒋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样就可达到既控制中国，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又使自己不付出更大代价的一箭双雕目的。

其次，苏联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例》。条约规定，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只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它的国内敌人，即中国共产党。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也连续两次致电毛泽东，要他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否则，由此而爆发内战的责任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负。苏联之所以做出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是抗战后期以来美苏两国长期交易的结果，也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易的结果。换言之，苏联以承认中国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为代价，以换取美国在欧洲对苏联的让步。苏联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代价，以换取蒋介石政府在中国东北权益问题上的让步。斯大林之所以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是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有力量去与美蒋势力抗衡，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可能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涉，其结果有可能影响苏联在中国的地位，尤其可能影响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的维护。苏联的态度为美国所充分利用。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赫尔利就立即敦促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他相信，由于美国政府在争取控制中国的斗争中扩大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并敦促共产党与蒋合作；又由于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不支持和帮

助它的中国亲人”，所以美蒋方面无需要使用武力，而用和平的外交手段就能设法控制中国共产党。[11]赫尔利的想法十分符合美国对华政策需要，所以，他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最后，美国、苏联和蒋介石的上述一系列举措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8 月 15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此后，由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中的知名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由在上海坚持抗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一些学术界人士举办的民主科学座谈会，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的中国工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出实现民主、和平和反对独裁的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统一的共同意志和积极行动，汇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股洪流。

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于 8 月 23 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由于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在内外压力下，中国有可能避免内战，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政治方略。他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已进入和平建国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因此，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

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又说：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新的政治方略是1940年他所作《新民民主主义论》所提政治方略的退一步，是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提政治方略的退一步。这种战略上退一步，也许能达到进两步的目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略上的退让，准备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主要是美苏两国的纠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说：国共关系反映美苏关系，影响着中国政局。因此，虽然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于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同时共产党背后也站着一个苏联，城下之盟既可以设想，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作了城下之盟，就是苏联作了城下之盟。他又说，尽管现在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都不准中国内战；同时，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获得；反之，则和平可能获得。⑫

毛泽东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新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这次会议的前一日就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在军事上，指示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这一方针就是"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在政治上，指示认为：

“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在这次会议次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军区负责人饶漱石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党在新时期的政治、军事方略。指示说：“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与国民党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⑬2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26 日，党中央发出通知，说明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通知对谈判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进行了预测并提出对策：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们就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各项原则。⑭28 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正式开始。

绝不能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也不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与蒋介石“搭伙”和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仅仅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将“和平、民主、团结”当作战略目标而努力争取实现的。在毛泽东来看，尽管蒋介石是坚决反共和与人民为敌的，但由于他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而美国现在不希望中国内战并与苏联达成妥协，苏联也不希望中国内战，加上中共

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确实可能实现。由此也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政策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的对美政策。因此，战后初期，争取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仍然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权宜之计或只是一种策略。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英国记者甘贝尔的谈话中有进一步的说明。甘贝尔询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⑮毛泽东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政治上的战略目标有一致性，因而是可以合作的。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妥协与合作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毛泽东说，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好处；过去，即抗日战争时期，双方妥协合作是为了打法西斯，而现在，双方妥协或合作则是为着和平。

也绝不能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做出政治方略上的退一步完全是迫于苏联或美国的压力，更不象赫尔利所说的那样，只要中苏条约一签订，中国共产党读到这些写在墙上的文字，就会立即屈服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压力而与之妥协或合作。当然，中国共产党做出这样的政治方略上的退一步是充分考虑苏联、美国、蒋介石政府以至全国人民的态度的。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显然是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做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略上的退一步，也是为了更有利于争取盟友，教育人民和分化敌人，是为了更好地同敌人作斗争。退一步是为了将来进两步。

根据毛泽东关于同美国继续合作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 9

月1日向各中央局和各解放区党委正式发出《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民党特务，而不牵及美国人。⑯这个指示是抗战后初期中央对美政策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其中心是要继续与美国合作。甚至在9月底10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准备直接帮助蒋介石军队抢占地盘，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苏联不能让蒋军接收东北，中共也无力阻止美军在中国登陆，所以对美军在以上几个地区也不加阻止，并且对登陆队给以必要的配合。9月29日，中共中央给山东、晋察冀和华中各局发出《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指出："美国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及我之行政人员接触，我应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中共也预计到美军可能对我之行动进行干涉，所以指示说："美军如有反我行动，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方人员，占我地区，则系干涉中国内政。"但指示只要求速将美军干涉的具体情形，如时间、地点、人数和番号等尽速电告中央，并加以公布，而不是实施抵抗。⑰当时中共虽然指出赫尔利和魏德迈等人是很反动的，他们的方针是"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又认为，"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我们的甚多。"所以，"我们对于赫、魏等暂时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对美国情报人员、军事人员均应采取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如有美军在解放区登陆，应以主人翁地位予以欢迎，接待"；如有美军向我开炮进攻，或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等事，也只是将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番号等情形详细报告，以便对全世界宣布其干涉内政的行动。"同时我们在行动上则要忍耐一时。"⑱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

岛登陆。当地八路军主动派部队前往联络接洽，因遭美军袭击，被迫自卫还击，但随即主动撤出战斗。⑲同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给张爱萍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对美方针的指示，说根据毛泽东的重庆来电说明，重庆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美军助蒋是美国政府目前政策，即在美国亦有很多人反对”。“即使美军观察组人员亦多不以美政府目前政策为然”，美国对华政策将来也许可能转变。因此，指示要求各地目前对美军登陆部队及美军情报人员仍应取友好态度，不可报复，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⑳

二　反抗、中立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美蒋继续合作的战略方针后，不仅没有放弃与美蒋反动派的坚决斗争，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将反抗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作为实现和平目标的主要手段。

从8月底到10月初，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努力争取双方的合作，尽量避免与在华美军的直接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从10月上旬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共对美军在烟台等地登陆的态度和对策上。早在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还说：“如美军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我军应避免冲突，以善意对待之。”㉑所以，当美军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时，中共主动派部队联络接洽。但是，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就连电中共胶东区委并告山东、华中、晋察冀中央局及重庆中共代表团等，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威海和龙口等地登陆。中共中央在第一封电报中说：“美军在烟台登陆，我应表示坚决拒绝；”㉒在另一封电报中又说：“美国还

可能在威海、龙口及其他地方登陆，我军应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我军才予撤退”；“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其它各区如遇美军干涉和进攻，均照此办理。”㉓

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共与美国之间处于激烈对抗的形势。10 月 13 日，全付武装之美军官兵三十余人，包围搜查中共驻天津办事处，并将办事处房屋占据。10 月 21 日，美军飞机十余架突然以机枪扫射在河北安次县举行大会的中共军队和人民，死伤数人。同日上午，美军飞机十余架又飞往河北固安县上空，对该地中共驻军进行威胁，并投函限中共军队 3 日内退出，否则即进攻该地。20 日前后，美军在秦皇岛的登陆部队配合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阳镇，解除那里的中共武装。同时，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山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为进攻山海关作准备。31 日，美军又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美军指挥官甚至恫吓说，如再遇中共军队射击，就轰炸中共军队驻守的村庄。11 月 8 日，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宣布，他已决定安排 530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并且威胁说：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㉔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参加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强烈抗议，并实施抵抗。朱德和叶剑英分别致函驻华美军负责人，强烈谴责秦山地区美军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向山海关中共驻军进行军事压迫。他们要求美军离开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战场。重庆的中共代表也数访美国大使馆，抗议美军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并提醒美方注意，美军干涉中国内政，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

示有关部队：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表示坚决反对，并禁止任何美军武装人员进驻我军控制区；我军应在铁道线上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布置警戒，不许美军武装通过；如美军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只有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的条件下反攻之。㉕中共中央还致电东北局彭真、林彪，要求他们组织野战军，反对美舰掩护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指示说："美舰如向我军开炮以掩护顽军登陆，我军自然可以大炮还击美舰。但我不应向美舰先开炮。"㉖

中共之所以从10月上旬开始同美国处于激烈对抗的形势，主要是由于苏联和美国在伦敦会议上发生争执，使双方关系在战后第一次出现裂痕。于是双方就在中国积极支持国共两党努力争夺东北。在美苏两国的支持下，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展开了角逐，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夺，双方各有所获。但由于苏联和中共所处的有利地位，使得中共在东北明显地占优势。面对中共即将全面控制东北的局面，美国和国民党从11月中旬开始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强大的外交攻势和军事进攻。因为苏联不愿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和国民党把关系弄僵，所以，它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强大的外交攻势和军事进攻下首先做出让步，并对中共在东北及其所占领地区的行动再次给以很大限制，而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中共一时还无力同美蒋的联合力量相抗衡，因此不得不在东北从已经占领的大城市中撤出，而且不得不对美蒋，特别是美国再取和缓态度。中共中央总结日本投降以来对美蒋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与美国领导集团进行斗争的新策略，这就是中立美国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正式提出来的。中共中立美国的策略

是建立在对国际局势、美苏对华政策和蒋介石内外政策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指示说："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㉗

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中共的对美政策是公开抵抗美军在中国登陆和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地区的进攻。而现在，即从11月下旬开始，中共又提出中立美国的政策。同时，中共的文件中还说："但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㉘这就说明，中共在提出中立美国政策的同时，仍继续执行反抗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扶蒋政策。

应当看到，即使在中共与美国激烈对抗时，中共对继续与美国合作仍留有余地。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求中共部队对美国实施抵抗时绝不要先开枪。10月29日，中央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中仍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在一般外交场合下，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

友好合作的方针”；只是在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利益时，才“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29] 11 月 28 日，即中共提出中立美国政策的同一日，朱德总司令就中共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问题答外国记者，指出：中国人民，现在和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伟大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大民族的互不可少的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抗战中与抗战后，都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与美国军民相处的，任何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生活过的美国人都能不加思考地承认这一点。”[30]

11 月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决定派特使马歇尔来华，美国总统杜鲁门 12 月中旬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共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变化，中共认为，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杜鲁门更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但是，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中共对美方针也应有变化。这就是：“对于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对于美国飞行员之降落我区者，应加救护，给以热情接待和宣传后送其回队，“对于美国人员进入我区者，应给以善意的招待”；“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道我区真实情况。”做到这些，以使美国人员对我获得友好的印象，并给美国对华政策以较进步的影响。[31]总之，从 12 月中旬以后，中共又基本恢复了 8 月下旬到 10 月初对美友好合作的政策。

12 月中旬，中共调整对美政策后，马歇尔来到重庆，开始调

处国共关系。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向马歇尔坦率说明了中共的政策与现实目标，由此表示了中共的和平诚意和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良好愿望。周恩来说：中共目前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中国化，即在目前阶段，我们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共产党今天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借鉴，它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现代化。周恩来的意见与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 9 月与英国记者甘贝尔谈话所表达的思想基本一致。其目的都是从理论上阐明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从而消除美国对与中共合作的忧虑。周恩来在同马歇尔的谈话中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中共是愿意与美国合作的；而且，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32]在会谈中，周恩来还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对他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所做的努力，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战，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和美国合作。并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今天还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长期目标。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从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马歇尔表示他要说服蒋介石解除对中共动机的疑惧。[33]既然如此，目前美国完全不用

害怕同中共合作。2 月 21 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的谈话中再次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马歇尔的好意表示感谢，这种好意就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并赞成美国在技术上帮助中共军队。[34]

在马歇尔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中，中共也确实打算与国民党真诚合作。1946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说毛泽东将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2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和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自从 1946 年 1 月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中国就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35]为此，中共中央准备将中央机关从延安搬至淮安或淮阴，以便于到南京同国民党进行议会斗争。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也反映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诚意。

总之，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坚持批评、揭露和抵抗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度确立了实行中立美国的政策，但是，斗争也好，中立也好，都是服从或服务于中共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总目标。因此，战后初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总战略或总目标仍是实现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斗争或中立只是实现这一总战略或总目标的策略或手段。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是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美蒋反动派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

是，这一理论并不排斥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实行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如此，战后初期仍是如此。尽管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但是，中国共产党相信，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潮流面前，美蒋方面终究会改变自己的错误政策，即放弃奉行战争与独裁的政策，走向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而且，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实力地位，在国内动员全国人民，在国际上积极联合苏联，以与美蒋进行对抗，这都将迫使美蒋方面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而愿意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谋求妥协与合作，另一方面，进行斗争和反抗。这就是战后初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针对美蒋方面实行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而采取的革命的两手政策。其间，中国共产党还一度实行过中立美国的政策。革命的两手政策则是这一时期中共处理与美蒋关系的主要政策。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革命的两手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历史时期是以妥协与合作为主，而以斗争与反抗为辅；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是以斗争和反抗为主，而以妥协与合作为辅。从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到 1946 年 3 月，中共对美蒋的政策是以妥协与合作为主，而以斗争和反抗为辅。在这一时期，中共谋求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而反抗美蒋的斗争只具有策略意义。

那么，在战后初期，毛泽东确立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战略方针和他确立联苏抗蒋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从外交上看，中共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同联苏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联苏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的重点。苏联是中共在国际上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共与苏联联合是与朋友和同志的合作。与美国的妥协与合

作则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的重点，而且，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共与美国的继续妥协与合作实际上是与敌人的妥协与合作。如果说中共的联苏政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那么，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只是在相对于中共于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中立或反抗美国的政策才具有战略意义。而从长远来看，比如中国革命的全过程，甚至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比如从中国共产党政治外交的总战略来看，中共在这一时期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只具有策略意义。在某种意义或某程度上来说，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只是中共分化美蒋关系，在敌人阵营内部争取朋友或教育人民的一种手段。由于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得它在中国推行反动政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美蒋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又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和平呼声，以及苏美妥协和苏蒋妥协的现状，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有可能迫使美蒋方面不敢贸然发动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确立了继续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战略方针。从外交与内政的结合上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联苏与抗蒋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的主要政策，是毛泽东政治外交战略的重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将美国与蒋介石国民党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进行妥协与合作，还是进行斗争和反抗，都把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做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且根据国内外形势，将美国做为团结和利用的主要对象，而把蒋介石国民党做为打击和斗争的主要对象。

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政治

形势：美苏两国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和蒋介石国民党依恃大国的支持和援助图谋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联苏抗蒋为主，以争取与美蒋妥协与合作为辅的战略总方针。政治与外交战略交织在一起，是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之一。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 年版，第 217—218 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28 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年，第 238—240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44—1145 页。

5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71—72 页。

6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63 页。

7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374 页。

8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72 页。

9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38—1945》，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44 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23—1134 页。

11　《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4 页。

12　8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3—84 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43 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52—1155 页。

15　《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8 日。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243 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02 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04 页。

19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1 页。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08 页。

21 中央关于对美军在烟台等地登陆的对策给林浩和山东分局的指示。

22 中央关于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给胶东区委的指示。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19 页。

24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584 页。

25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35 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400 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455 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455—456 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390 页。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439 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494—495 页。

32 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载《党的文献》1989 年第 1 期。

33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41 页。

34 《周恩来年谱》第 645 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319 页。

第 七 章

美苏在中国的妥协和斗争

一 冷战与妥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曾结为同盟。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两个大国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早在 1945 年 4 月底，美国和苏联就因波兰问题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当面斥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苏联破坏了美英苏三国首脑同年 2 月在雅尔塔签署的关于波兰的协议，从而将波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对杜鲁门的斥责不胜惊讶，说："我这辈子没有见过有人对我这样说话"。杜鲁门又毫不客气的地回敬道："你执行决议了，就不会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①但是，苏联对美国的斥责不加理睬，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波兰以至整个东欧的控制。

苏联要求对波兰以至整个东欧的控制有它的理由。从政治上看，苏联坚持控制波兰以至东欧，是要使这些国家成为一个安全的"缓冲地带"，以确保苏联不再遭受"1941 年式"的进攻。从经济上看，苏联坚持控制波兰以至东欧，是要取得这些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以利于受战争严重摧残的苏联进行经济建设和恢复元气。

美国反对苏联控制波兰以至东欧也有它的理由。美国人以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和进行民

主革命。美国人说，美国并不是需要东欧这个市场，而是认为一个安全、兴盛的世界不能没有健全的欧洲，也就是说，要一个统一的欧洲，由东欧提供粮食，西欧提供工业品，互为依存。实际上，苏联控制东欧与美国必须发挥世界性作用的信念格格不入，也就是与美国称霸并控制世界的目标截然对立。这样，双方目标不一，必然产生矛盾和出现裂痕。这种矛盾和裂痕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步加深。

1945 年 9 月在伦敦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国际会议上，美苏两国再度发生公开争执，从而使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闹了个不欢而散。随后，美苏两国在欧洲、在中国、在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剑拔弩张，几次濒于开火。开始，在双方的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占主要地位。渐渐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西德政局与东德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法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在希腊，共产党重新举行暴动；在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实行政治统治；在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由妥协走向内战。实际上，希腊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非苏联的意图和目标；西方国家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考虑的也是他们追随者的情绪，而非苏联的什么指示。然而这一切，却被美国看作是苏联的支持及其预谋扩张总计划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作祟的结果。因而必须进行抵制并尽可能地加以扑灭。一位美国学者说：“自从美国同苏联在战争时期结成的联盟解体以后，美国人思想中固有的对共产党的恐惧和仇恨再次出现。依靠这种邪恶的刺激因素，妒忌、野心和报复心理能更加发展，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得势。赫尔利的行动是个开端，以后美

国就很快朝着参议员乔·麦卡锡轻而易举地强加于美国的恐怖时代的方向迈进了。歇斯底里发作的时代到来了。美国对华政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争议，蒋介石的代理人和支持者，即通常以院外援华集团著称的一批人，是助长歇斯底里的人。"②

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加深了同苏联的裂痕，而且对苏联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时指出："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运用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③斯大林的演说显然是针对战争结束后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不要忘记世界资本主义再次挑起战争的危险性。但是，斯大林的演说只是一般性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发生的一般原理，并不具有同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同美国的挑衅和对抗性质。可是，斯大林的演说却使美国吃惊不小。美国自由派领袖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斯大林的演说简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④3 月 5 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实际上代表美国回敬了斯大林的 2 月演说。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讲话。讲话首先对美国的力量大大赞扬一番，要求听众相信原子弹掌握在美国手里，而不掌握在共产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国家手里，为了好生利用原子弹带来的喘息之机，丘吉尔要求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在联合国的原

则指导下去重整世界。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势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期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即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最后说：“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的虚弱。”他的意思是，只有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抵制苏联的扩张。⑤

苏联对丘吉尔的讲话反映强烈。3 月 13 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向丘吉尔和他的美国“朋友们”进行还击，说他们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也散布种族主义理论，即“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斯大林警告说：“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⑥在随后的几周内，苏联开始实行一系列新政策。苏联终于拒绝了谈判 15 个月之久的 10 亿美元的贷款条件，还决定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使美国想以美元为诱饵，换取苏联让出东欧，参加资本主义世界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幻灭了。⑦

以丘吉尔的讲话和斯大林的谈话为标志，美苏两国的冷战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政府对丘吉尔的话以及丘吉尔提出的英美伙伴关系的建议却反应冷淡。杜鲁门总统在公开场合也没有在丘吉尔的建议之外加提什么方案。在1946年一年中，即使在美苏争夺伊朗和土耳其的危机时期，杜鲁门也没有公开说过谴责苏联的话。在1946年下半年，苏联对美国的关系也保持沉默。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发出了他自己的冷战宣言，戏剧性地向国会提出以“杜鲁门主义”而闻名于世的咨文。咨文要求全球承担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全国响应了。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正式破裂，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公开宣布将“冷战”作为国策。在此后近四分之一世纪内，杜鲁门主义一直支配着美国对外政策。因此，七十年代初，参议员富布赖特说：“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⑧杜鲁门主义提出后，美国政府又制定了援助欧州的马歇尔计划，以具体实施杜鲁门主义的方案。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就是以一个巨大的援助计划来防止欧洲和美国经济的崩溃，然后再将这个主义和计划在全球广泛实行。一位美国学者写道：杜鲁门主义的反共论点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不论共产主义存在不存在，西方经济都会陷入困境。由于美国人不太了解建设问题的复杂性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性，但是他们却容易懂得反共道理。所以美国人就根据杜鲁门主义中他们所能理解的理由，和他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理由大干其冷战。正如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希望的那样，杜鲁门主义成了美国大力重建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反对激进左派的思想意识上的挡箭

牌。因此从 1947 年以后，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认为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影响最深远和最富悲剧性的结果。⑨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理论基础是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在 1946 年 2 月给国务院的 8 千字电报中关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对策的全面分析和建议。1947 年 7 月，凯南又以 X 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进一步阐述 8 千字电报的内容，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凯南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由两种东西形成的：一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它鼓吹革命，要打倒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势力；一是独裁者一心想利用“资本主义包围”做为理由来加强控制苏联民众，便于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凯南深信斯大林不会放松共产党要推翻一切西方政府的决心，说苏联的外交就“象一个开足了发条的玩具，定下方向后就径直往前走，直至遇到无法应付的阻力才停下来”。为此，凯南为美国提出的对策是：“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区和政治问题上既严峻又巧妙地对它组织对抗，就能遏制瘟疫似的苏联侵略”；如果能把苏联遏制住了，而不是损害美国的繁荣和政治稳定，那么，苏联党的结构就要经历非常紧张的阶段，其最终结果将是“苏联政权要么垮台，要么逐渐软化”。凯南进一步说：“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⑩这一理论就是对“冷战”一词的极好解释。杜鲁门主义提出之前，杜鲁门的白宫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也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关系”的长篇报告，进一步阐述遏制苏联的理论。克利福德说，在苏联领导人主张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下，“就作出结论说，国际和平的希望只能通过与苏联一致、相互谅解和团结才能取得，那是极其危险的”。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仅限于目前它控制的地位”；因此，“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他们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⑪这样，遏制理论的近期目标就在于掠夺和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地区。克利福德的报告进一步完善了凯南的遏制理论，形成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完整的理论基础。

冷战，主要由美国发动。在美国发动的冷战逐步升级面前，苏联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对美国发动的冷战，苏联虽然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在总的方面，它还是要寻求同美国的妥协。在冷战过程中，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是寸步不让的。但在希腊，在中国，以至在伊朗和土耳其，苏联每每向美国做出让步，并达成妥协。在总的方面，苏联也屡屡表示愿与美国继续合作。而美国所发动的冷战，也不是要与苏联进行直接对抗或战争，特别是在中国，也是谋求与苏联的妥协。所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总结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时说：“既然美国公众要求遣返美军的喧嚷不可抗拒，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庞大的战时军队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复员，美国领导人又不想招致国内的政治灾难或去冒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保卫美国利益的唯一途径便是说服俄国领导人，苏美两国的在华利益是可以调和的。”⑫

早在 1945 年 10 月伦敦外长会议结束后不久，杜鲁门就和斯大林多次通信，就一系列相互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10 月下旬，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还带着杜鲁门的亲笔信到克里米亚会见斯大林，谋求打开美苏之间的僵局。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在莫斯

科召开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三国外长会议于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5个战败国和约准备工作的程序和罗保两国政府的改组达成协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国问题、伊朗问题和原子能等问题，并就中国问题、原子能问题达成协议。会议还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莫斯科外长会议可以说是战后美苏两国进行全面妥协的一次会议。

1946年开始，美国首先发起对苏联的冷战，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实行对苏联的进攻态势。尽管如此，从1946年到1947年初，美国和苏联还召开两次巴黎外长会议、巴黎和会、纽约外长会议，直至最后签订对5个战败国的和约。在此期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坦白说明美国愿与苏联维持合作。⑬斯大林也多次强调与美国继续合作的态度。当意识形态因素已经成为美国发动冷战的主要因素时，期大林还反复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影响美国与苏联的合作。1946年9月17日，美国《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询问斯大林："你是否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有可能建立友好的、长期的合作，以及华莱士演说中所说到的两种制度间的'友好竞赛'?"斯大林回答："我无条件地相信。"⑭1946年12月21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访问斯大林时问道："你是否认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同像苏联现存的国家政体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并肩相处，而且任何一方也不会企图干涉对方的内部政治事务?"斯大林回答："当然可能。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⑮1947年4月9日，即杜鲁门总统公开发表冷战宣言之后，斯大林仍向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

塔生全面阐述了美苏两国虽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仍可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史塔生指出：苏美两国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苏联的经济建筑在有计划的社会基础上，它的发展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美国所存在的是私人资本的自由经济。因此，他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这两种经济制度能在战后的同一世界内共同生活和彼此合作。斯大林回答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而且，就它们的合作而论，则彼此之间的差别并无重大的意义。"⑯

斯大林从三个方面论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苏美两国能够合作。首先从实践上看，斯大林说：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其次从理论上看，两种经济制度能够合作，这是列宁的观点。就是说，两种经济制度的国家永远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两个国家能否合作，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不是共同制度，而在于是不是有共同的合作愿望。如果有合作的愿望，尽管经济制度不同，合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的愿望，即使是经济制度相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会打起来的。现在，苏联人民和共产党有着同美国合作的愿望，只要美国也有这种愿望，则两国合作必能实现。最后，斯大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合作。他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制度究竟是好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然而，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

斯大林的论述表明，在战后初期，苏联是迫切希望与美国实行妥协和进行合作的，即使在美国发动冷战后仍是如此。妥协不是没有斗争，斗争仍是为了妥协。

中国，是战后初期美苏妥协的一个重要地区。美国将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志在必得。所以，它处处逼迫或说服苏联做出让步。苏联则利用它在中国的有利地位，以或打或拉或让步等手段，逼迫或说服美国在其他地区或其它方面做出让步。

1945 年 10 月，由于美苏在伦敦外长会议上的争执，苏联就在中国进行报复，利用它在中国东北驻军的有利条件，积极支持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阻止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但是到 11 月份，在美蒋的强大的外交攻势和军事进攻面前，苏联又主动做出让步，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和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提供各种方便条件。11 月 30 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说“苏联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所表示之愿望，同意苏联军队自东三省延期一个月撤退，即延期至 1946 年 1 月 3 日为止”⑰苏军的这一延期撤退的决定显然有利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如果苏军按预定于 12 月 3 日全部撤出满洲，那将使整个东北三省向已源源涌入的中共军队敞开，由于蒋介石无法预测他调往东北的部队靠步行和铁路运输（即便可能）何时才能到达，既不能通过海运送他们进入东北，也无法确知美国政府是否同意空运，所以他接受了苏军在东北延期撤退的提议。随后，由于苏联对中共的约束，国民党军队依靠铁路从山海关北进到锦州，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便夺取了葫芦岛。至 12 月 7 日，据报道他们离沈阳已不到二十英里，预计很快即可和平进入该城。⑱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协助，国民党政府在 1945 年 12 月和 1946 年 1 月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市，并成立了辽北、松江、嫩江三省的省政府。首批保安队也

于 1946 年空运至长春。⑲

苏联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显然是战后苏美继续妥协的产物，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向美国所做的让步。这种妥协和让步还表现在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问题上。

莫斯科外长会议是苏美两国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实行妥协的一次会议，也是苏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实行妥协的一次会议。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强调，苏联应当支持蒋介石，说："斯大林元帅已说过，蒋介石是目前中国的唯一领袖，还不能期望其他什么人能够实现中国的统一。"对此，莫洛托夫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⑳会议期间，贝尔纳斯又拜访斯大林，并向他表示："美国一直根据他所理解的美苏两国一致的政策支持着蒋介石。"斯大林答道："苏联与蒋介石政府订有一个这样的条约。"他还说，他仍旧完全同意他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即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应得到支持。㉑斯大林询问贝尔纳斯："美国为什么不希望把它的军队调离华北？"经贝尔纳斯解释后，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国希望留下它的军队，苏联政府将不反对，他们只是希望告知一下情况。"㉒会议经过讨论，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协议说：三国外长曾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一切内争。"㉓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前任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后来华的。马歇尔来华是接替赫尔利未完成的使命，继续调处国共矛盾，以实现美国控制国共两党，进而

控制整个中国的目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是要维持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治统治，通过调处国共矛盾，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并使美国尽量避免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美国当权者认为，要实现马歇尔的来华使命，仍然需要苏联的支持，需要苏联在中国执行与美国一致的政策，需要苏联表示对马歇尔来华支持。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可以说是争取到了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同时也争取到了苏联对马歇尔来华的支持。当时，贝尔纳斯对莫洛托夫说："马歇尔将军将试图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莫洛托夫答道："美国处于了解蒋介石政府的意图和计划的最佳地位上。唯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确实希望解决他的内部问题？"㉔当贝尔纳斯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的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㉕斯大林的态度可以使美国放心了。因此，当马歇尔来华后致电美国国务院，询问苏联对中国东北是否有特殊意图，苏联对华政策是否"有意破坏中国的统一"。美国国务院认为，苏联准备完全从满洲撤军这一事实，以及苏联方面的权威性表态，都说明："苏联至少目前在远东还是愿意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同我们打交道的。"因此，贝尔纳斯复电马歇尔，认为苏联现在并无特殊意图，说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中有关中国部分，取得苏联承诺支持"国民政府"是"我要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他的结论是："估计目前他们准备遵守与中国的条约，无意做任何破坏我们统一中国的努力之事。"㉖

1946 年 1 月，美国政府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拜访斯大林，再次寻问苏联对华政策。斯大林说，他最近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进

行了会晤，他已经向小蒋保证，莫斯科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期大林并向哈里曼表示，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非常少，苏联政府派在延安的三位代表已经召了回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不大。他还说，苏联不会对中共采取主动，但如果中共征求他的意见，他是准备劝说中共结束内战、努力和蒋政府达成一项协议的。当哈里曼询问斯大林对调停中国敌对各派的可能性的看法时，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分歧算不了什么，主要障碍是个人之间的不信任，即“蒋介石不信任毛，毛也不信任蒋。”[27]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这种态度更使美国感到满意。

1946 年美苏冷战开始后，苏联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曾一度处于对抗的形势。但不久，苏联就表示，在远东问题上，仍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1946 年 1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埃里奥特·罗斯福拜访斯大林并询问：“美国和苏联是否应当制定一个共同的、长期的援助远东各国人民的政策?” 斯大林回答：“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28]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提出美苏全球冷战的“杜鲁门主义”前后，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由于美苏冷战的全面开始，没能就处理德国以至欧洲问题达成协议。但在这次会议期间，马歇尔和莫洛托夫仍就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所达成的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交换信件，重申双方在中国问题上仍然恪守 1945 年 12 月三国外长会议苏美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认为中国仍然应当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与民主。马歇尔在给莫落托夫的信中叙述美国撤退在华美军的情况。莫洛托夫在给马歇尔的信中重申苏联政府仍然信任三国外长

会议的观点。[29]

美国发动对苏联的全面冷战后，苏联曾于1947年9月发起组织了东西欧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与美国对抗。但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并没有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面，即苏联对当时正在国内大战的国共两党的基本政策乃然没有改变。美苏之间的冷战主要体现在欧洲。在亚洲，尤其在远东的中国，苏联从其既得利益考虑，仍然是谋求与美国合作，并尽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苏联虽然给它以支持，但仍希望它服从美苏妥协和苏蒋妥协这一总战略，并尽可能地放弃同国民党的战争。

美苏“冷战”开始后，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在现在的局势下，任何战争都势必发展成为世界大战。”[30]因此，他在演说中暗示，希腊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都不是值得提倡的反帝斗争方式，因为它们有使苏联卷入另一次冲突的危险。由于苏联不赞成希腊和中国的革命战争，所以它没有邀请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局组织。而且在1947年9月成立的情报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只有几句话提及美国干涉中国和希腊，而根本不提中国和希腊两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并等于以外交方式强调，苏联对美国在中东和远东的利益持赞同的态度。日丹诺夫在报告中进一步暗示，1946年12月斯大林提出的“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有个条件：美国要放弃统治欧洲的要求。

一句话，苏联之所以不邀请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组织，是由于一邀请势必影响苏美妥协和苏蒋妥协的总战略。苏联采取“强硬路线”，只是想迫使华盛顿承认根据苏美两国在世

界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以保证它们平分天下而划分“势力范围”。为与美国达成协议，苏联仍愿做出让步。殖民地的远东，特别是中国，还有中东的希腊，都是苏联可以做让步的地方。苏联组织情报局与美国对抗，只具有策略意义；而其与美国妥协，在中国与蒋介石政府妥协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根据苏联的这一战略和策略，无论日丹诺夫的报告，还是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声明，都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也不联系当前任务把这一斗争作为长期目标提出来。日丹诺夫的长篇报告，只有几句话提到美国干涉中国和希腊，而且根本不提这两国共产党对此作出的革命反应，九国共产党的声明根本不提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及这两国共产党的反抗。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一位西方学者说：“在这方面，日丹诺夫的报告颇具匠心，为的是要华盛顿看到紧握的拳头下那只伸出来的手”；又说，“仔细琢磨这个报告，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即日丹诺夫和九国共产党声明的目的并“不是要攻击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而是比较温和地阻止资本主义的扩张”。当时，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周围的自由派完全懂得日丹诺夫报告中密码式的信息，他们力图使舆论界人士相信，应当接受斯大林合作的建议，但遭到可悲的失败。美国统治阶级觉得它们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使世界接受美国强制下的和平，”[31]所以，它继续采取向苏联的进攻态势。

尽管以后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就中国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没有改变。苏联虽然对美国违反苏美协议中关于撤军问题的条款进行了批评和谴责，但这种批评和谴责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实质性政策。美国虽然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有怀疑，但这种怀疑一直没有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现实性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在苏联不直接干涉

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的。

二　支蒋与援共

1946年3月前，美国特使马歇尔基本上还能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调处国共矛盾。由于马歇尔的调处，国共双方在走向和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月31日举行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问题、关于政府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在此前后，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当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冷战演说时，在中国东北发生了苏联军队驱逐美国记者的事件。美苏冷战使蒋介石感到兴奋。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美记者被苏方驱逐返回后，俄军在东北之阴谋暴行已完全揭露，美国舆论对俄谴责，亦已日渐积极；加以丘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将来临之感矣！"[22]美苏关系恶化促使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在马歇尔离华后，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从4月份开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发动了向中共部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在全国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民主人士。但是，蒋介石只看到美苏关系恶化的一面，没有看到美苏继续妥协的一面，特别是没有看到，美苏矛盾激化主要表现在欧洲，在中国，双方仍是要求政治解决而是军事解决的方案，即还是在中国寻求妥协。因

此，马歇尔在国共关系急剧恶化的 4 月份返回中国，继续调处国共矛盾。

然而，由于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政策底盘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合作，美国就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以控制中国；如果蒋介石国民党拒绝合作，美国仍继续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只不过是“在已宣布的美国政策的条款范围内对蒋委员长进行支持。”[83]因此，当蒋介石拒绝改革和坚持独裁、内战，反对成立联合政府时，美国最终还得给他以支持。也就是说，无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美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只不过在如何支持和支持多少的问题上会有变化，或者说，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无条件的，只是在如何支持和支持多少等问题上才是有条件的。这样，虽然马歇尔再度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但在蒋介石国民党日趋走向内战和独裁的道路上，马歇尔的天平开始倾斜，并一步一步倒向蒋介石一边。直至 1947 年 1 月，马歇尔应召回国。美国调处国共矛盾以失败而告终。

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一年多，曾因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谴责。但是，赫尔利来华期间，美国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援助却远远没有马歇尔来华期间美国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援助多。据统计，从 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6 月，即马歇尔来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给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援助总额，就相当于抗日战争胜利前五、六年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的两倍，共达 13 亿 3 千多万美元。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 1947 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赫尔利来华期间和马歇尔来华期间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援助进行了列举比较。文中说：“赫尔利时期，美国装备了蒋介石二十个师，马歇尔时期，装备了蒋介石二十五个师，比前一时期还多五个。赫尔利时期，美

国帮助蒋介石运了五个军；马歇尔时期又加运了九个军，比前一时期还多运了四个军。赫尔利时期，还没有订立规定军队不许调动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动员了一百一十个师进攻解放区；马歇尔时期，订了不准移动军队的停战协议，有三个月的短期休战，然后发生了更大的内战，蒋介石的二百一十八个师（有些现改称旅）进攻解放区，兵力比过去一时期多一倍，而且蒋介石违反停战协定，调动的兵力占其总兵力的百分之九十。赫尔利时期，美国政府给蒋介石以小的借款；马歇尔时期，美国陆海军给蒋介石价值八万万美金以上的‘剩余物资’，美国政府并‘赠送’蒋介石一支海军。赫尔利时期，蒋介石利用日军进攻解放区；马歇尔时期，蒋介石进一步用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做进犯解放区的顾问。……”㉞总之，马歇尔来华调处一年多，美国一点也没有停止或减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援助。而且，在这一时期，由于得到了苏联的默契和妥协，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援助比任何一时期都多。一位研究学者写道：“这一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有的上一年已开始，这一年延续或进一步发展；有的本年度决定，以后再付诸实施；有的实际上已在实施，到以后再正式追认。从数量和实效而言，美国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给予国民党的援助（除美元、实物外，包括训练、运送军队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这名为促和的一年中给的。”㉟

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一年多，美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的援助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留在华北，替国民党控制区和要害部门作警卫。

二是继续帮助国民党海运和空运军队。至 1946 年 6 月，由美国海远、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 54 万人。仅马歇尔来华

后，甚至1946年1月停战令发布后，美国还帮助国民党运送9个军，去扩大内战。仅空军费用就达三亿美元。

三是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军队现代化。军事顾问团于1946年3月成立，人数达两千余人，为国民党训练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达15万人。

四是延长租借物资。自日本投降至1946年1月，美国给国民党租借物资已达5亿美元，至1946年10月底达7亿8千多万美元。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通过《租借法》的援华物资只有7亿美元。这些物资主要用于帮助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军队；继续完成和装备39个陆军师；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空军，包括大约价值4千4百万美元的飞机和1千至2千万美元的零配件，以及空军人员的训练。

五是转让剩余物资。1946年8月，美国与南京政府签订《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和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价值约9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据美国援助远东民主委员会1946年12月28日发表的数字，这些剩余物资的价值至少在20亿美元以上，足供蒋介石两年内战之用。[36]这批物资中，有许多是军用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小型船只、船舶设备、各型车辆、建筑设备以及空军用的设备与物资。[37]

六是以对华军援立法的名义进行军事援助。1946年美国宣布战时及紧急状态结束。根据美国法律，以后对外派遣军事顾问团及给予其军事援助均需国会立法，方能实施。1946年6月14日，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共同提出军事援蒋法案。1946年7月，美国通过海军部立法，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派海军顾问团，同时借给271艘舰艇及其配套设备。

七是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名义向国民党政

府提供价值6亿5千8百万的物资援助，其中美国担负了71%，亦即4亿7千4百万美元的物资。当时美国以联总名义援助外国反动派总物资价值27亿美元，蒋介石政府即获得近4亿8千万，占六分之一以上。

八是进行经济贷款。马歇尔来华之初，美国曾决定给予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贷款。后因蒋介石片面召开国民参政会，并撕毁经马歇尔调处而刚达成的东北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5亿贷款未能兑现。但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在1946年第一季度批准了668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5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改进海港贷款1500万美元。6月14日，美蒋签订《在供应线上的租借法信用贷款》，在这项贷款下供应的物资共5170万美元。另外，在此之前的4月份，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并经美国全国顾问委员会的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还应允至1947年6月30日为止，拨付该行的资金5亿美元作为对中国政府及中国私人企业的个别信用贷款。㊳

马歇尔一方面以貌似公正的立场调处国共矛盾，一方面又向其中的一方面，即蒋介石国民党一方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歇尔调处失败后，美国对华政策显然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它继续干预中国，“由于中国人民的仇美情绪极深，美国将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蒋介石却还在要求美援，正如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顾问所说：“如果我们和他决裂，后果将是我们在中国的两个政治派别之间，在中国全境，失去所有的朋友。”㊴马歇尔说：如果美国想挽救蒋介石，美国“实际上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这将使美国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甚至脱不了身。”这样做，还会使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角逐场”，即成为美苏冲突的

角逐场。[40]针对这种状况，美国政府在1947年初一度采取减少给蒋介石政府援助的做法，对国民党政府持观望态度，并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形势的变化和马歇尔在1946年最后几个月对蒋介石一再重复的强烈劝告，最终将说服蒋介石进行重大的内部改革。

当时，美国不急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战场上还处于攻势，似乎还能维持一个时期。当时，美国临时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处境与希腊政府不同，它没有濒临崩溃，它没有面临被共产党击败的威胁。与共产党进行的战争就和二十年来一样地进行着。"[41]两年后，他又说："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大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42]1946年7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说："1946年底，共产党突然中断了马歇尔的调停，但那时，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首先，它是中国公认的合法政府，有着极高的威望和与此相应的物质手段。它占的地盘较大，有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陆军，又辅之以海军和空军，除去质量低劣这一点外，这都是对方所不具备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物质和财政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其价值大大超过了二十亿美元，主要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43]实际上，美国并不是要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的支持，而是指望在此之前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足以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如果蒋政府能进行自身的改革，中国的局势在暂时减少美援的情况下也许会发生奇迹性的变化。到那时，美再坐享蒋介石胜利的果实也不迟。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种等待和观望政策，很快就受到了美国国内以及世界性的反共潮流的冲击。美苏冷战全面开始后，离华回国后担任国务卿并主张实行上述政策的马歇尔倍受攻击。那些早就对马歇尔在华调处努力感到不耐烦的美国政府中的文职和军

职官员论证说，增加对蒋介石援助的时机已到，等待国民政府内搞一场纯洁化运动，即改革只对共产党有利。当杜鲁门主义宣布对地中海和欧洲事态发展愈来愈关切，并得出结论，只有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大规模援助才能从共产主义和苏联统治的威胁下拯救这些地区时，美国政府中的蒋政府支持者也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事态的关注，并努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

真正影响美国采取对华等待和观望政策的还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内战中所遭受的重大挫折。1946 年 7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曾叫嚣要在 3 个月之内结束战争，消灭中共。可是，到 1947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就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3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又粉碎了国民党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而迫使国民党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中国共产党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战略反攻的序幕。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种形势不仅使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而且促使美国政府公开放弃在国共两党之间貌似中立的旗号，明目张胆地站到蒋介石国民党一边。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就是 1947 年 7 月魏德迈使团的来华。

魏德迈一向是主张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的。一年前，他与马歇尔就在和谈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所以马歇尔临时建议收回对他的任命而改任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现在，决定派魏德迈使团来华，显然是美国调整对华等待和观望政策的信号。魏德迈就他的赴华使命在致马歇尔的意见书中写道："我认为零打碎敲的援华

方案殊非良策。那就象是给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的业已腐烂的躯壳堵漏洞。我们的援助应建立在一项能为该船造一新船壳的计划之上，并委之于一位能干、正直的船长和精干的水手。”[44]这实际上是要求美国对中国事态进行全面的干涉。但是，杜鲁门总统给魏德迈的训令中则指出：“在与中国居负责地位的官员和领袖们讨论时，你要说明你们负责的是调查情况的使命，并说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导致中国元气恢复的有效措施，美国政府才能考虑对一项计划提供援助。再则，任何可能使用的援助，必须受美国政府代表的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条件的援助方案。训令还要求魏德迈在中国先不要就援助问题对国民党作出承诺，而在调查报告中对援助的性质和程度作出建议。鉴于此点，魏德迈将自己的使华任务确定为：第一，“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出证据，证明美国援助将不会被浪费”；第二，说服华盛顿，必须给予这样的援助。第一点是美国政府的，第二点是魏德迈本人的。魏德迈就是根据这两点来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并回国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积极而全面援助蒋介石政府的报告。根据魏德迈的报告，马歇尔宣布，他在 1948 年初向国会提出一项在 15 个月之内给中国 3 亿美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同时，马歇尔批准马里安纳岛上的美国军火通过处理剩余物资的程序转让给蒋介石，批准从对外救援项下拨出 2770 万美元给蒋介石，批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补给和部队训练给予有限而又广泛的援助。最后，马歇尔还是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即“给予为满足美国公众舆论所必需的以及为防止中国政府的突然全面崩溃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援助。”[45]

马歇尔之所以拒绝魏德迈全面援助蒋介石的计划，主要是因为他不相信这种全面援助会取得预期效果。他认为，若无美军承

担大规模的义务，魏德迈关于较广泛地干涉中国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鉴于欧洲比中国占有优先地位，美国国会和公众对美军在国外承担新的任务是否支持大有疑问，而且，一项对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援助计划和美国在国民政府民事与军事行动中的广泛卷入，也将使美国并不充裕的物力和人才用于一个只有第二等重要性的地区。最后。如果这种干涉不断升级，使得美国不得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撤离中国，那将在全世界面前使美国的信誉受到损害。[46]基于这种考虑，马歇尔主张并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执行的是对蒋介石政府采取有条件支持和援助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马歇尔在 1948 年初写道："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援助以阻止不可逆止的经济崩溃。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基础如此动荡不稳，要想实施一项切实可行的有效的计划来恢复经济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过美国政府倒是愿意向处于现阶段危机中的中国政府提供一定的援助。这些援助可能暂时延缓其经济迅速崩溃，给中国政府赢得喘息之机，供其采取重要步骤以图自我恢复。"[47]

有条件的援助政策确定以后，美国政府就努力使其付诸实施。马歇尔开始建议援助的数字是 3 亿美元，并先拨 6000 万美元供急救之用。当美国将准备提供援助的消息通知国民党政府后，国民党方面又立即进行多方活动，争取早给、多给。国民党提出的要求是：一项以 4 年为期、总数为 15 亿美元的临时援助；条件大致与援欧方案相同；在通过方案前，另给 6000 万美元的临时援助；由美国贷款购买军械弹药，1948 年为 1 亿元；美国提供稳定币制的援助，等等。双方经过磋商和讨价还价以后，由美国国务院于 1948 年 2 月提出经济援华法案，以 15 个月为期（至 1949 年 6 月 30 日为止），共 5.7 亿美元。最后，经参、众两院审议，于 1948 年 4 月 2 日通过《援华法》，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为期 12 个月，

总数为4.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使用，实际上是为购买军火进行内战使用。

1948年《援华法》是在美国以至世界性的反共高潮中通过的，其反共目的不言自明。这一法案又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和走向灭亡的前夕通过的，其目的是力图挽救蒋介石濒于灭亡的命运也显而易见。

纵观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对付苏联始终是影响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从日本投降到马歇尔调处矛盾失败，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妥协有斗争，而以妥协为主。此间，美国以其它地区和其它方面的让步，换取了苏联基本上赞成美国对华政策，赞成赫尔利和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矛盾，实际上是赞成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并通过蒋介石政府实现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从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失败到1948年美国《援华法》的通过，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仍是有妥协有斗争。此间，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总的考虑是在中国问题上如何与苏联对抗。但由于美国当权者们相信，苏联虽然在中国问题上可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并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但是苏联不会在东亚实行代价昂贵的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政策，斯大林也不会为一个现成到手的礼物再付代价。因此，美国在1947年经过一段犹豫之后，决定增加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期望在苏联不直接干涉中国问题，不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支持蒋介石对消灭中国共产党再做一次努力，以使中国这个远东大国不致成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基地。

可以说，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苏政策是取得成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得到苏联的同意和支持。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也没能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这是为什么？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支持，为中

共部队进入东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条件。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要想大批进入东北并在很短时间内在东北占据对于国民党的优势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看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持和援助，并不是以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苏联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国的外交战略为出发点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总结日本投降前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时写道："克里姆林宫政策的首要目的和一贯目的是推进俄国的本国利益，不可能把任何另外一个党的利益等量齐观"；说"无论在雅尔塔协定中，还是在与蒋的谈判中，俄国都没有采取公开行动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利益。"㊽当时的苏联外交官在回忆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时写道：苏联既维护了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给予中共以很大的支持。他说："苏军司令部为中共部队从中国内地顺利进入满洲地区敞开了通道，向他们提供了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武器。从一开始它就帮助中共在满洲建立政权机关并阻止国民党政府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苏联政府利用苏军驻扎满州的条件，帮助中共在那里组建大批装备良好的武装部队。"苏联为什么给予中共以很大的支持呢？这位外交官写道："苏联企图依靠中共这个比较密切的意识形态盟友，对抗美国在中国及整个远东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对在满州的中共的支持，追求更大的战略目的，即不仅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及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还要影响整个亚洲其他国家民主解放运动及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㊾苏联外交官的回忆，进一步说明战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主要是苏联在对美蒋斗争中的需要。苏联是把中共作为与美蒋斗争的一个重要砝码，或者是随时向美蒋方面打出的一张牌，需要同美蒋斗争时就支持中国共产党，需要同美蒋妥协时就限制或阻挠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战后初期的中苏

关系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日本投降到马歇尔调处结束，苏联与美蒋有妥协有斗争，但主要是妥协。所以，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共的限制并不少于对中共的支持。

当苏军留驻东北时，苏联尽力争取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那时，苏联不仅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提供各种方便条件，而且努力争取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地区进行经济合作。11 月 24 日，东北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国民党派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正式提出一项中苏合办矿业计划，即“经济合作”方案。根据这一计划，列入中苏合办的项目包括煤矿、电厂、水泥厂、民用飞机厂共 81 项，约占东北重工业的 80%。[50]据有关材料记载，当时苏方代表曾给国民党代表这样一种印象：假如中国政府同意苏联的要求，苏联政府不允许中共在满洲扮演公开角色，而让他们充当一种纯粹的地方力量。在这种推论的基础上，张嘉璈便敦促蒋介石赞同中苏联合经营十至二十个企业。[51]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合作谈判，期大林再次敦促蒋经国赴莫斯科访问。12 月 15 日，蒋经国启程赴苏。从 12 月底到 1946 年 1 月中旬，蒋经国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两次。斯大林向蒋经国阐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斯大林说：(一) 苏联仍然希望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并愿提供经济援助；(二) 苏联不打算介入国共斗争，但希望国共两党和平共存，和平竞争；(三) 苏联赞成三国在远东合作，但希望国民政府能奉行独立政策，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52]。以上三点，除希望国民党政府奉行独立政策，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之外，可以说都是美苏关于中国问题妥协的产物。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斯大林表示愿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但苏联须取得自己的战利品，并且表示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苏联取得战利品和反对中国门户开放

是违背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因此，美国国务院 1946 年 2 月发出照会，认为东北工业如绝对由中苏共管，为违反门户开放，美方不能同意，因而表示反对“中俄两国政府对满州工业问题之谈判”。[53]由于美国的反对，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了与苏联的经济合作。

针对蒋介石政府追随美国，拒绝斯大林提出的在美苏两国之间实行不偏不倚的政策，并进而拒绝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苏联政府很快以大量搬迁“战利品”（东北地区的大量工矿业设备）和与国民党军队不合作的撤军措施进行回敬。2 月 23 日，马林诺夫斯基公开向外国记者说，他的军队搬运了东北的工业设备。[54]据美国考察团估计，到 1946 年 5 月苏军撤出时为止，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的价值共 8.58 亿美元，而弥补转移、损坏和一般损失的全部重建费用约达 20 亿美元。[55]苏联自己也承认，它从东北撤除的设备的总价值为 9 千 8 百万美元。[56]在苏联大批拆运东北工业设备的同时，东北苏军还实行了与国民党军队不合作的延期和迅速撤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两次商定，苏军从东北开始撤退的时间是 1946 年 2 月 1 日。但在 2 月 26 日，东北苏军指挥部却发表缓期撤军的声明。直到 3 月 22 日，苏联才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 4 月底全部撤出，而后苏军又迅速撤退，使国民党军队的接收跟不上苏军撤退的步伐。苏联搬迁“战利品”和苏军的迅速撤退，十分不利于国民党对东北地区的全面接收。这都是苏联同美蒋矛盾所产生的结果。

当苏军留驻东北时，苏联报刊对中国内争中的各方事态基本上不加评论，也很少报道。但当苏军占领即将结束时，上述状况开始改观。1946 年 4 月底，《布尔什维克》杂志自战后以来第一次出现评论中国事态的论文。文中说，国共之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均未致力于减少战斗，说 1 月里的政协决议是两党之间的重

大成就，但却被中国反动派严重地削弱了。苏军撤出后，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后，苏联报刊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日益关切，并开始公开批评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中共的战争。6 月 2 日，苏联《新时代》杂志撰文谴责美国“积极参加内战”。文中指出，苏军依照协定已按期自中国领土撤退，但国民党军依赖美国供应的军备，使其在满洲军事上占优势。6 月 22 日，《红星报》指出：“美国继续给予国民党武器帮助，是使中国内战展开的原因之一。”7 月 5 日，《消息报》则撰文指责“美国金融工商界的反动分子，首先是那些战前与中国有联系的商行，……正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8 月 2 日，《真理报》也发表评论，说“轰炸延安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最好的证明”，而美国仲裁人则用“左手进行调解，右手却在武装国民党的军队”。以后，这种指责仍持续不断。

苏联在公开批评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中共的战争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共有所支持。首先，苏联报刊开始刊载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声明和宣言。自 1945 年 9 月以后，苏联报刊从未刊登过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声明，但在 1946 年 6 月 27 日、7 月 11 日和 7 月 19 日，《真理报》却分别刊登了毛泽东抗议美国援华的声明，中共中央的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和周恩来警告国民政府的一篇声明。另外，在 1946 年 6 月底，苏联在旅顺口的驻军应中共的要求向山东解放区运去了一批武器，使山东人民解放军迅速粉碎了在美国积极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6 年下半年，苏联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军还帮助北满的中共部队修复、提供几十辆蒸汽机车，以帮助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57]

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仍表达了他们继续与美国妥协、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1946 年 5 月初，苏军刚刚撤出东北，斯大林就

邀请蒋介石赴苏联访问，以促进双方关系。但这一邀请为蒋介石所婉拒。此后，虽然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对中共的战争，但这种指责只限于“中国的某些反动将领”。1946 年 7 月 5 日，《真理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文章，将中国内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国民党内的某些反动将领。文中说，国共两党领导人已就中国实行民主发展的途径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的办法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一些反动分子却企图破坏这一协议的实现，说“蒋介石将军”对会议的成就表示赞赏，国民党军队司令部也已下令在满洲地区停止向人民武装力量进攻，休战半月，但这个命令马上就被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将军破坏了。[58]这是为继续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留有余地。

1946 年底和 1947 年初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失败后，特别是 1947 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和推行“马歇尔计划”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又有进一步援助。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苏联通过同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贸易往来，向中共提供军民生活必需品。1946 年 12 月 21 日，苏联外贸局长斯拉特科夫斯基和全苏粮食出口公司副经理苏利缅科与中共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进行首次贸易谈判。根据双方协议，苏联向中共领导的军队和人民供应各种苏联商品以及军医院、民医院和学校用的设备等，并转交战利品和苏军从日本人手中没收的粮食。根据协议，苏联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或经过北朝鲜港口向大连港提供粮食、植物油、食糖、罐头等，然后再经大连提供给辽东半岛的中共根据地。[59]由于双方贸易的发展，苏联同中国东北之间的贸易额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扩大了两倍，即从 4.138 亿卢布扩大到 9.159 亿卢布。1947—1949 年苏联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政权还

提供了石油制品、汽车、摩托车、工业设备、服装、棉纱、橡胶及其制品、各种食品等。[60]

二是苏联大力协助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主要发展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1947 年，在苏联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帮助下开辟的松花江航线，使苏联向中共后方基地不间断地供应一些必需物资，其中包括燃料、药品、衣服、靴鞋等。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帮助中共革命根据地大量修复铁路。应中共的请求，苏联还派来专家小组。截至 1948 年 12 月 15 日，苏联帮助修复的铁路线达 1500 公里，大中型桥梁 120 座。在此期间，苏联专家对人民解放铁道兵部队进行了培训，仅 1948 年夏季就培训了 4 千多名。另外，苏联专家对东北的公路和土路情况也作了技术调查，并制定了修复主要干线的两年计划。

三是在医疗方面，从 1947 年起，苏联应中共的请求，直接派出医疗防疫队到革命根据地工作，同时运去了大量防疫和治疗药品。

另外在军事方面，据有关材料记载，苏联对中共军队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1946 年秋，中共有两个团的军队在旅顺避难，以防国民党军的攻击。11 月又有约几千人的兵团，在国民党的进攻下撤退到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虽然苏联开始依据条约将这支中共军队缴了械，但后来，这支部队还是在苏联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了中国东北同国民党军作战。[61]

尽管在国共两党的内战全面展开后，苏联对中共创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给予了一定的援助，但事实表明，这种援助是极其有限的。它与当时美国对国民党在军事和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不可比拟。或者说，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相比，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而绝不象苏联学者所说的，苏联援助“对人

民军队向蒋介石政权发动总攻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2]中共能够同强大的蒋介石国民党相抗衡，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苏联的援助，而是中共自身的努力。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有限度的援助确实不能与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大力支持相提并论。更何况苏联还继续努力与国民党妥协与合作和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呢？1946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到东北调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夺取东北和俄国人又给过什么样的帮助。她询问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你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什么援助？”林彪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顾问，什么也没有。所有随苏军进入满洲的人员和武器在苏军离开时都回去了。所有他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和给养，他们都带回俄国或就地销毁了”[63]。斯特朗向其他了解情况的人进行了核实。她发现，人们根本不把俄国援助的说法当一回事。他们说：“那不过是蒋的宣传。”东北人一致认为，俄国人主要是完成了赶走日本人的任务；同时，俄国人进一步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有助于鼓励胆大的东北人解除农村及小城镇日军及其傀儡的武装。但是，俄国人没有直接给过中国共产党什么武器。与此相反，东北人认为，俄国人实际上帮助的是蒋介石，他们说，苏军保护在满洲各城市中由蒋任命的人员，时间长达好几个月，地区远至北方的齐齐哈尔。后来苏联在远东的一位少校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把共产党赶出沈阳并把蒋的人扶起来时，中国共产党非常恼火。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同蒋订有条约。”当斯特朗询问在东北的中共部队的一位军官，他是否见过俄国武器。这位军官回答说没有。然后他又说：“俄国在抗战早期曾经有一些步枪送给蒋，蒋后来用这些步枪打我们，被我们缴获了。这就是我见到过的俄

国武器。”[64]这位军官的话对苏联援助的说法带有讽刺的意味。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总之，苏联曾给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直接的军事援助；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军事援助则基本上没有。直到 1947 年 10 月，美国还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迄今为止是非直接的，而且绝对数量极其有限”[65]

从抗战后期到战后初期，美国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大量援助主要是军事援助。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先是苏联、后是美国的军事援助，积极从事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一些非直接的援助。这种援助在中国共产党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苏联方面来看，这种援助只具有策略意义。在中国，寻求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维持苏联在中国已得利益，换取美蒋在其它问题上或其它地区的让步，才是苏联的战略目标。根据这样的战略和策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并不少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种限制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开始了，在随后的几年中就没有断过。这种限制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军事方面。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做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苏联根据条约精神要求中共参加国民党政府，接受国民党控制。这是苏联在政治上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表现。苏联在东北将日本人遗留的武器从中共部队手中收回；苏联将中共部队从东北各大城市中驱出，并不准中共军事占领东北各大城市。这是苏联在军事上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表现。

从 1946 年 7 月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到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蒋介石国民党一度赢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这种形势

曾一度使美国统治集团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胜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希望。美国特使马歇尔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而国民党又取得军事上占优势地位的时候结束其调处国共矛盾的使命，就是建立在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的乐观估计之上的。

苏联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虽然对中共有所支持，但其对华政策的决策基础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可能取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将遭受严重挫折，中共在美蒋联合的军事进攻下遭到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可能的。苏联各报刊对国共两党内战事态的报道突出表现了苏联决策者的态度。那时，苏联的报刊只在 1946 年 7、8 月份国共两党全面内战开始时报道过中共领导人的几项政策声明，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有所评论和谴责。随后，苏联报刊对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就极少报道了。1947 年夏，苏联报刊曾发表一篇题为《两年来的中国内战》的长篇文章。文章叙述了国共两党自日本投降以来两年内战的情况。1946 年 7 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曾访问延安和中共其它解放区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谈她阅读这篇文章的感想时写道："我仔细地读了它，开头是热切的读着，然后是震惊。因为文章是以中共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延安的'不幸'撤退来结束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失败的语气。作为共产党的报纸，剩下的假设是：有一天共产主义势力还是会在中国再度起来的；而现在，他们显然是失败了。"斯特朗根据她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她在中共解放区所了解到的情况推断了这篇文章产生失败主义情绪的原因。她说："很清楚，这篇文章作者对于我已经在解放区了解到的中共战略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是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来设想中国的内战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是寸土必争地牺牲了大量人力。中共的战略则不

一样。他们痛痛快快地放弃土地以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军。很清楚，他们离开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把蒋军陷入城市。”[66]斯特朗认为，苏联对中共的失败主义情绪是因为它对中共的战略和策略缺乏了解。所以，她决定离开中共解放区后立即去苏联，把中共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战略告诉俄国人。

其实，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主义情绪还有其它原因。一位苏联学者写道：“引人注目的是，1946—1947 年间，苏联报纸及西方各国共产党报纸，几乎都没有报道有关中国事变的消息，苏联报纸读者根本不可能了解国共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斗情况以及中国东北发生的革命变革。斯大林几乎确信，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成功地展开攻势，美国就会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和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原来日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美国借助于蒋介石则可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军队不仅可以在欧洲和日本，而且也可以在苏中边界建立军事基地。斯大林在同中共领导人交往的信件中表示了这些担心。”斯大林“肯定还有另一些可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更大的担心：他害怕世界上出现比苏联更强大的、在其政策上可能独立于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的共产党国家。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早就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不太听莫斯科的劝告。斯大林同欧洲一些共产党首领之间已经出现困难，因此才建立所谓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但是，“在波兰召开的那次作出建立情报局决定的会议，甚至都没有邀请中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总之，无论是蒋介石在中国的胜利，还是中共的彻底胜利，都不会使斯大林感到满意，因为中共的这种努力可能打破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治地位。”那么，苏联在中国的迫切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位苏联学者写道：“斯大林

对中国出现‘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的局面很满意。他希望中共促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妥协：他的政府保留对华南、西南和华中省份的管辖，而共产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其实，斯大林在1945年就有这个愿望。1946年到1947年间，他曾在这方面向中共领导人施加压力。”[67]

美国和苏联都曾设想或预料，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不可能在美蒋联合发动的内战中取胜。但事实的发展恰恰出乎美国的设想和苏联的预料之外。这就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它是不依任何大国或强国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　释

1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64页。

2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3页。

3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1—442页。

4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国、俄国与冷战》1976年英文版，第39页。

5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51页。

6　《真理报》1946年3月14日。载《斯大林文选》(下)，第462—468页。

7　《美国、俄国与冷战》第40页。

8　《美国、俄国与冷战》第50页。

9　《美国、俄国与冷战》第58页。

10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101 页。

11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第 23 页。

12 威廉·斯图克《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179 页。

13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待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版，第 595 页。

14 《消息报》1946 年 9 月 24 日，载《斯大林文选》(下)，第 476—478 页。

15 《消息报》1947 年 1 月 24 日，载《斯大林文选》(下)，第 484—487 页。

16 《消息报》1947 年 5 月 8 日，载《斯大林文选》(下)，第 491—502 页。

17 《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 144—145 页。

18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4 页。

19 许湘涛《战后初期之中苏关系》，载《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

20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中国)，第 842—843 页。

2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465 页。

22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中国)，第 847—848 页。

23 《新华日报》1945 年 12 月 30 日。

24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中国)，第 844 页。

25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 中国)，第 850 页。

26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6—67 页。

27 《哈里曼回忆录》第 591—592 页。

28 《消息报》1947 年 1 月 24 日，载《斯大林文选》(下)，第 486—487 页。

29 《真理报》1947 年 4 月 7 日。

30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下册)，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8 页。

31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下册）第 170—171 页。

32 《蒋总统秘录》第十四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 1977 年版，第 49 页。

3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七卷，第 770 页。

34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4—395 页。

35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106 页。

36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 383 页。

3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272 页。

3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271 页。

39 《美国、俄国与冷战》第 34 页。

40 《美国、俄国与冷战》第 34—36 页。

4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143 页。

4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36 页。

43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3—204 页。

44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7，中国）第 638 页。

45 凯南 1947 年 11 月 4 日给马歇尔的信，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2 辑，第 115 页。

46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中国）第 467—471 页。

47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1 辑，第 197 页。

48 《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14—415 页。

49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2 期。

50 《近代中国》第 63 期第 124 页。

51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英文版，第 336—337 页。

52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5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617 页。

54 罗伯特·诺斯《莫斯科与中共》英文版，第 227 页。

55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45》，第335页。戴维·达林《苏俄与远东》，第244页。

56 查尔士·麦克兰《苏维埃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1931—1946年》，第235页。

57 《在中国的经历，1937—1945》，苏联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6期。

58 《真理报》1946年7月5日。

59 [苏]鲍里索夫·科罗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中译本，第23页。

60 [苏]罗曼诺娃《苏中在远东的经济关系》，载《苏中关系的形成，1917—1950》，符拉迪沃斯托克，1987年版，中译文见《西伯利亚研究》，1989年第4期。

61 戴维·达林《苏俄与远东》，第327页。

62 鲍里索夫·科罗斯科夫《苏中关系》，第25页。

63 《斯特朗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441页。

64 《斯特朗文集》(3)，第270页。

65 《斯特朗文集》(2)，第367页。

66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7，中国)第3457—350页。

67 梅德尔杰夫《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亚非人民》1989年第5期。

第 八 章

毛泽东反美倒蒋的理论和实践

一 战略的转变

1945 年底，接替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抵达重庆后，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曾考虑提议英国和苏联，主要是苏联也参加调处国共两党的矛盾，以实现“以夷制夷”的政策。指示说：“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不能拒绝，即对马参加范围使其不参加政治问题的解决，恐亦不可能，且亦不妥。我们不应提议限制马参加范围，但国民党既提议马参加谈判，我在此时似亦可提议苏联和英国参加，只要英苏同意在双方邀请下不拒绝参加，我即可提议，国民党与马均不好拒绝。如此亦可让英苏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谈判。因为这些问题的确实解决牵涉很广，如前线委员会技术司令部等，能有英苏参加均较好，如在停战问题上英苏不参加，其他问题将更难参加。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①但是，中共的设想没能实现。1945 年底召开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苏美双方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苏联表示赞同美国对华政策，并支持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矛盾。1946 年 1 月初，斯大林在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表示，苏联不参加调处国共矛盾，因为他不相信共产党人会接受他的意

见。因此，中共中央在2月12日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在停战谈判时，关于东北热河问题曾数次请苏联派人参加，但苏联坚不出面。"由此，中国共产党也逐步认识到，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似不只单独代表美国，而必须执行三国莫斯科会议协定并向三国报告，故其态度公平。"②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赞成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并积极配合美国特使马歇尔，力促其调处获得成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马歇尔的调处很快取得重要成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月31日政协会议作出各项决议和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整军方案。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1月10日发布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指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成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③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四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④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欢迎美苏调处国共矛盾的，并期望由美苏的国际妥协与合作来推动国共两党的国内妥协与合作。党在1月26日的指示中批评那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说"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说"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⑤党在2月1日的指示中又批评党内一部分同志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狭隘的关门主义"，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指

示说："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58]党对中国进一步走上民主化道路抱有希望。党的指示说："因为有苏美英三国的支援，有国内三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及民盟）的合作及三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6]所以，党要大力宣传和平合作方针，党和全国人民要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直至3月中旬，国际国内反苏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时，党仍坚信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的前途。3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及分局的指示中说："不论反动派破坏如何猖獗，甚至再打一时期内战，不论全世界，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我们应当有此坚信。"[59]

周恩来在1946年12月曾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进行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实行与蒋介石国民党妥协与合作方针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妥协与合作路线的的影响。周恩来说："从去年敌降后，国际形势的确还继续着在战争时期的一些影响，要为和平民主而团结。这还是战争时期罗斯福时代所提议的联合国路线，实行一个战后和平民主团结的路线。……战胜后，美国虽想独吞这个果实，尤其想把苏联以外的果实都独吞去，但这个情形在日

本投降后一个时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去年还有贝纳斯、杜鲁门的声明，他还要维持罗斯福过去的政策，这是好的。这样就影响了中国，有双十会谈纪要，及一月停战、政协、二月整军协议的结果。”⑦

1946年3月，国内外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反苏反共的演说，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苏冷战开始后，苏联决定从中国东北迅速撤军；美苏冷战导致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它在3月1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推翻政协决议；4月1日，蒋介石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拒绝承认东北的中国军队和民主政权。在此前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向中共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外反动派大肆鼓吹“美苏必战”，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也“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⑧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在党中央的部分领导同志中进行传阅。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短小精悍，只有四百多字，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战略策略思想坚定而灵活。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二）“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

时间”；（三）美、英、法同苏联的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四）“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五）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六）“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失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毛泽东的文章说明关于“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等论调是错误的，同时说明，党内党外“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和“惧怕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也是错误的，是不必要的。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是毛泽东不久以后创立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石；在实践上，它是毛泽东由确立和实施同美蒋的妥协与合作转向确立和实施反美倒蒋战略的起点和开端。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总的来说是在适应美苏妥协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于己有利的最好的条件，以实行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那么，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则表明，中共已开始考虑冲破美苏妥协格局的束缚，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的战略和策略。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与合作方针的确立与实施，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即国际妥协与合作路线的影响。那么，毛泽东关于新战略方针的酝酿则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指导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实施正确的政治、外交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很快就表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外交的实际斗争之中。1946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还指出：在东北，“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为此，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赴渝代表团，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70]但是，毛泽东在 4 月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就开始了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中东路的行动。在此前夕，毛泽东就连续两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他们集中全力，迅速控制长春、哈尔滨以及中东路全线。3 月 24 日的电报中说：“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黄李部（即东北民主联军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69]3 月 27 日的电报再次强调：“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全线，必须使用全力”；“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即苏联）决定，但我应力争。”[71]后因苏军回电，说他们在 4 月 15 日前不撤离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72]所以，中共部队直至 4 月 18 日才占领长春，4 月 24 日占领齐齐哈尔，4 月 28 日占领哈尔滨。此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数电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要他们集中全力，保卫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毛泽东在

给林彪和彭真的电示中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⑬

根据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以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为标志的东北地区将由苏军交与国民党政府接收。开始，中共曾希望从苏军手中接收这些大城市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但是，中共的意图和为此所采取的行动为苏方所阻止。现在，中共部队趁苏军刚刚撤出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而国民党军队未能及时接收的有利机会，不失时机地夺取这些大城市，因而使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成为一句空话。中共的这一行动显然冲破了国际妥协和中苏条约的限制。同时，这一行动还表示，毛泽东和中共对于通过与国民党谈判以达到和平、民主、团结的目标已不抱多大希望。当然，中共的这一行动也是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并得到了苏联的默许。但它毕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作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重大决策。

应当看到，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和中共部队攻取长、哈、齐等大城市的举动并不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内外政策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只是他酝酿新战略方针的开端。而且，他的这一文件当时只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传阅过，并未形成党的决议。就是说，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所表达的思想还未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虽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部队采取了攻取长、哈、齐等大城市的军事行动，但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有试探性质，并且仍是为与国民党进行妥协与合作的战略目标服务的，仍是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在谈判中更有利的地位服务的。所以，后来在美蒋的坚决要求下，中共部队又主动撤出长春，以换取蒋介石国民党在

其它方面做出让步。

1946年3月至6月，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从实行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战略走向反美倒蒋战略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争取与美蒋合作的最后机会，但已不再强调中国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多强调的则是中国走向全面内战的危险性。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从战略上继续争取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是因为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对马歇尔再次来华调处尚抱有一线希望。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在东北向中共大举进攻是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以后进行的。

马歇尔于1946年3月中旬回国述职一个月后，于4月18日返回中国继续调处国共矛盾。马歇尔来华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中说："马歇尔虽然是助蒋的，但主张早日停战，连日马歇尔及民主同盟奔走停战颇力，故停战协定之签订为期似不甚远。"⑭在另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说："马歇尔在关内主张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张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开明一点。"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⑮马歇尔来华后，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说"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⑯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与对策的指示，再次强调："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

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因此，“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停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⑰指示还要求各地改善对美国人的关系，说“无论美国是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

3月至6月，中共仍在不同场合继续强调与美国的合作。其中最主要的是5月3日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指示认为，“美国资本要控制中国今后的经济生活，其趋势已不可避免”，不仅国统区如此，解放区也如此；“苏联除开一般通商外是不会到山东及华中、华北来投资经营任何事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华中、华北，甚至东北等地区将来必不可免的要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而不是同苏联进行合作。指示说：“美国还不相信中共能和他们实行长期的经济合作，还怀疑我们要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以抵制美国”，因此，他们与我们的接触带有试探性，“在他们完全弄清我们态度后，才会确定他们对我们的方针和政策”；而我们呢？则“应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并“争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即可从中获得利益，否则是对我不利的”；我还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资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不与国民党法律抵触，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

美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进步团体，可以放手与之合作。”⑱这个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此时确实仍打算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而且打算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长期的合作。6月3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之做法一贯的愿望中国和平民主与马使命相合。我们愿其成功，勿失败。”⑲6月21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蒋方面指责苏联影响共产党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此时正在谋求与美国的合作，在停止冲突之后，欢迎派遣美国代表和人员前来调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他指出，这一点以及其他各方面都表示中国共产党政策同苏联政策之间的差异。⑳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共政策与苏联无关，仍希望与美国进行合作。

1946年6月底和7月初，是中国共产党由实行战略上同美蒋妥协与合作到实行反美倒蒋战略的转折点。6月下旬，在美国特使马歇尔一步一步偏向蒋介石国民党的过程中，蒋介石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条件下，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而且进一步提出和通过军事援蒋法案，试图向蒋介石提供巨大的和长期的援助。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逐步看清了美国以调停为名而援蒋打内战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看清了美蒋绝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由实行同美蒋妥协与合作战略转变为反美倒蒋战略的标志，是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以及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早在1946年6月初，毛泽东在给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和司令

员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就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㉑但随后，在马歇尔的调处和中共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再次停战15天，继续进行国共谈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这最后的停战谈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毛泽东在给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第27小组的中共代表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说："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毛泽东也提醒东北全军，"要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㉒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最后阶段的和平努力没能奏效。美国特使马歇尔说："不管是什么原因，看来清楚的是，在休战谈判中，共产党是比较愿意就停止冲突达成协议的，而政府则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共产党接受这些条件是不大可能的。"当时马歇尔已经明显偏向蒋介石，所以，他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仍抱有希望并且态度是真诚的。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恰恰相反。因此，马歇尔又指出："看来同样清楚的是，某些国民党文武领袖的力量和权力是以武力解决为目标的，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要比目前伴之以经济与政治停滞的半战争状态为好。"㉓就这样，蒋介石国民党于6月26日悍然发动围攻中共领导的中原解放区的战争，从而挑起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全面内战。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的预言实现。全面内战爆发前一日，毛泽东还致电林彪，说："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并说："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㉔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战略上放弃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方针，并由此确立了反美倒蒋战略。7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声明：在任何地点，如果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

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我被攻击，我军将采取坚决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的进行自卫战争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同日，中共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从二十六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的自卫战争实际上是打倒蒋介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当时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周恩来在1947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周恩来说："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号称四百万军队，这么多部队，一下子不容易打倒。过去有人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这种说法很深刻。大打起来后，在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部分中间分子，不是都与我们的想法相同，还有很多人以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如果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会不相信，不接受。同时，去年蒋介石刚开始大打，我们如提出'打倒蒋介石'，他就会反过来说共产党要打他，进攻他。如果我们把自卫口号变成进攻口号，那么就成为国共两方面都要进攻，就抵销了。我们说自卫，就是抵制他的进攻。但是怎样表明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呢？就是讲我们一定胜利！讲胜利信心，蒋必败，我必胜！而不是正面讲谁消灭谁"。㉖周恩来的解释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7月就已经确立了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只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而只提武装自卫或自卫战争的口号。因此，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而且在1946年下半年，中共仍在政治上维持与国民党的关

系，不与其公开破裂。7 月 3 日，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通过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就是打倒蒋介石。决议说："现时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已经是我们的主要敌人。"㉗

既然蒋介石是国民党走向内战和独裁的总头子，那么，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这个"我们的主要敌人"当然是应该被打倒的。7 月 20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题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㉘毛泽东的指示很好地说明了周恩来的上述解释，从而成为中共在新阶段的基本指导方针。

打倒蒋介石必然与反对美国联系在一起。因为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共产党确立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时，必然坚决反对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继续支持。虽然在 1946 年 7 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也不断批评说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国民党不愿走向妥协与和平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批评与 7 月以后的批评相比，其战略目标是不相一致的。前者的反对和批评总的来说是为了继续妥协与合作，后者的反对和批评则是为了使美国从根本上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而彻底退出中国。7 月之前中共批评和反对美国是对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尚抱有一线希望。7 月之后，中共对与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已基本丧失希望。所以，这时中共的反美是战略上的反美，而此前的反美准确地说只具有策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策略上反美走向战略上反美的标志，首先是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声明第一次明确指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支持。声明说："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声明指出，过去，中国共产党曾经同意过美国对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现在，这种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因此，"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29]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公开谴责美国的声明，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际对美国妄图以军事援蒋法案的形式继续援蒋打内战的重视，旨在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和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明确态度，号召人们起来制止美国对蒋介石援助。马歇尔后来在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声明时写道："这是我在华期间毛泽东发表的两项正式公开声明之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发言人常常发表政策声明，毛本人却难得公开发表声明。"[30]可见，马歇尔也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声明不同寻常。它是中共确立反美倒蒋战略的信号和标志。

毛泽东发表声明后，中国共产党又连续发表社论或声明，进一步阐述中共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思想和政策。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发表社论。社论再一次将美国说成帝国主义。在此之前已有近一年时间不这样提了。而且，社论还将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社论说："中国人民刚在八年中把日寇打出去，而中国的法西斯派为着把人民继续践踏在足底下，他们又和另一个外国反动派结合起来。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篡夺人民抗日的果实，他们正在狠心地从事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变成美国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同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评阿泽逊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代言人阿泽逊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辩护。表示中共坚决反美的最重要文件还是7月7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在全面叙述中共自日本投降以来，特别是美国特使马歇尔使华以来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果之后，指出，自从1946年3月以来，当国民党反动派发现美国政府并未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对于他们的反动行为继续加强军事援助，而使马歇尔的和平努力，事实上成为陪衬而且归于无效的时候，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进攻就愈加猖獗"；指出，"我国反动派为什么能在人民爱国战争胜利后继续独裁和内战？举世周知，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国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指出，美国反动派又为什么不顾中美两国人民的无数次责难，如此神秘地热心于义务式的"援华"呢？举世周知，这是因为善于出卖国家民族的中国反动派，允许美国侵略者实际上操纵我国的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毁灭我国的民族生产，自由

侵入，占据和使用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和内河。因此，“很明显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现在是已经受着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威胁，他们正在同谋着把我国变成尸横遍野的地狱，变为浩大的集中营，变为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新侵略战争的基地。”根据这些论断，中国共产党是绝不可能再与美蒋谋求战略上的妥协与合作了。因此，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的人们，一切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一切孙中山的信徒，必须警惕起来，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为完成我国的独立与民主而奋斗，为实现我国的和平而奋斗。”[31]这份宣言发表的次日，周恩来亲自将它转交马歇尔，从而给马歇尔以很大刺激。马歇尔称这份宣言“强烈而恶毒地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又一次抗议共产党所谓的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32]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公开表示反美态度后，中共部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磨擦也开始了。7 月 13 日，中共部队与驻华美军在北宁路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战斗中，中共部队俘获驻华美军 7 名。7 月 29 日，中共部队在天津与北平之间公路线上的安平县与帮助国民党运送军事物资的驻华美军再次发生冲突。在战斗中，有 3 名驻华美军被打死，12 名受伤，马歇尔认为：“这起事件，成了共产党重新发起反美运动的一个信号。”[33]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马、司发表联合宣言后，“将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在谈判中对马歇尔可持保留态度，对美国对华政策要彻底清算和批评。[34]

以上事实说明，在 1946 年 6 月底和 7 月初，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已经从战略上的争取合作转向公开对抗，与马歇尔的继续谈判不过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战争，并在政治上争取揭露美国与国民

党政府的欺骗手段，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从1946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开始的战略转变。

二　中间地带理论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悍然发动的反共内战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中共与美蒋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但是，美国特使马歇尔并没有退出国共两党的调处工作，蒋介石国民党也没有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谈判。双方的关系仍然维持着。不仅如此，马歇尔从7月以后还采取若干措施，进一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首先，马歇尔建议由各党派共同谈判改为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而后，他又提议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直接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最后，他又支持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参加国共关系的调解。可以说，为了进一步促使国共两党继续谈判，马歇尔费尽了心机。

针对马歇尔的继续调处和蒋介石的谈判烟幕，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反对马歇尔继续调处和不反对与蒋介石继续谈判的策略方针，其中心是为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进行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以此教育广大人民。正如周恩来所说：在1946年7月以后，“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所以，“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又说：“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

人民不了解；”[35]只有在我们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才会使人们看清：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所谓“和平谈判”或“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36]毛泽东后来也说：1946年6月以后的谈判，只是教育群众的作用，并无解决问题之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确立和实施反美倒蒋战略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转变仍留有一定余地。6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委、各区党委的指示中，一方面要求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地“注意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亦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对美方公正人士与普通人员，仍应争取其同情，指明真正破坏中美友谊者乃是中美反动分子的反动政策，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71]7月6日，中共中央给各局的指示要求各地“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37]对已经发生的中共部队与驻华美军的冲突，中央也指示尽量缩小事态的发展和影响。此间，周恩来也向美国记者斯蒂尔说，我们不反对美国人，但反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周恩来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于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周恩来又说，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38]7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美宣传中的政策问题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对美援蒋法案的声明和中央七七宣言已在国内外引起了有力的反应。今后我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政策仍应继续尖锐

批评，并以各种方式，向世界控拆美帝国主义分子帮助蒋介石发动和进行内战和把中国殖民地化的罪行。但为了争取更多美国人民与进步官员对我的了解和同情，我们在宣传中必须严格掌握美国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民主分子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同一个人（如杜鲁门、马歇尔）今天与明天态度的区别，同一个人同一机关所发表的同一篇声明或谈话中不同语句中的区别。不要笼统反对，更不要笼统反美。我们应在这些具体区别的基础上，作灵活的恰如其分的宣传，贯彻我们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赞成中美平等友谊合作的方针，争取美国广大人民与民主分子对我了解同情，以便迫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作可能的改良。为此，通知要求各地用八路军、新四军、民主联军、群众团体或其他适当名义，向美军寄发告驻华美军士兵书，向他们说明中美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合作的友谊，他们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受中美反动派利用，号召他们立刻复员回国，拒绝为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服务；用各地群众团体和名流的名义，联合或分别发表告美国人民书，说明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一贯友好态度，希望他们起来，纠正政府的政策；发动各地教育界名流和燕大学生致书司徒雷登，说明我之态度和正当愿望；并尽可能增加对美国记者、普通军政人员，学者的个别友好接触。[39]直到8月初，周恩来还向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应该继续调解中国的争端，但是也应考虑共产党与他们合作是否不现实的问题。[40]8月9日，周恩来又向马歇尔表示：美国对中国人民有道义上的责任，在把中国引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后，美国应该寻求某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解决问题，需要美国调解的努力，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和美国合作，不希望改变美国目前在中国所占有

的无可争议的首要地位。㊶

另外，在7月份，中共仍在一定程度上期望能通过自卫战争的胜利来争取和平。中共中央的七七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㊷7月13日中共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中说："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㊸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也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以争取和平。"㊹

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美国的政策转变留下的最后一点余地和对争取和平寄予的最后一线希望并没能实现。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中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的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马司联合声明实际上承认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失败。而且，马、司联合声明选定在中共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之后，而不是在蒋介石拒绝中共的要求之后发表，这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马、司联合声明发表后，美国政府不顾中共的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价值9亿美元的大批战争剩余物资转于国民党政府。8月30日，国民党政府还与美国军官陈纳德签署协定，设立陈纳德航空公司，担负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华北，华中各战场空运人员与军用物资的任务。美国在蒋介石日益扩大内战的形势下发表声明，承认调处失败，并给蒋介石国民党大批物资援助，表明美国已基本完成援助国民党以消灭中共的步骤，至此，中共完全有理由评析马歇尔的所谓"调处"和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马歇尔调处，并第一次公开遣责"国民党反

动派的头子”蒋介石。文章指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原因，首先是“马歇尔所称为‘顽固分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这批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自己”，其次是“美国政府自己破坏马歇尔的工作”，这是蒋介石敢于破坏调处的根源，即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第三是马歇尔本人的错误，而美国的援蒋政策使他不得不犯错误。文章还第一次指出，美国一面“调处”，一面援蒋；名曰“调处”，实则援蒋，是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内战的根本原因，否则，“中国早已获得独立、和平、民主”。因此，文章指出：“马歇尔可以宣布他自己使命的失败，但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蒋介石横行内战到底，也不容许美国反动派长久援蒋内战下去，把全中国弄得糜烂不堪”；“造成了这样的内战之后，美国政府要卸脱责任，不但中国人民不答应，而且美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决不会答应。”[45]9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文章，号召人们“必须彻底抛弃对于美国政府的幻想，必须彻底抛弃所谓独立、和平、民主可以轻易获得的幻想，”；“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46]

为揭露美国“调处”中国内战真相，毛泽东公开发表谈话，指责美国政府的调解政策，说，“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47]为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继续进行内战，中国共产党于 9 月份发起开展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

上述事实说明，1946 年 8 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切实实行彻底

反美倒蒋战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尽管在此之后，中共仍维持着与马歇尔的关系，还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旋，但其一切目的均在揭露美蒋调处与和谈的阴谋，从而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8月31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并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和李先念，说："现时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马、司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48]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并告叶剑英，"在全国大打条件下，一切谈判是为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目，教育群众。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的最后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49]这是毛泽东关于以革命的两手对付美蒋反动派反革命两手的战略和策略的继续。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在蒋介石国民党日益扩大内战的事实面前，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必然暴露，其和谈骗局必然要被揭穿。11月15日，蒋介石决定抛弃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民盟，悍然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宣布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公开破裂。国民大会的召开，表明蒋介石国民党最终放弃了和平谈判，表明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或"和平攻势"的彻底破产。从此，他就走上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之一途。蒋介石"和平攻势"的破产，也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结果。国民大会召开后，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因而实际上关闭了谈判的大门，所以，他和中共代表团人员决定撤回延安。11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中共代表团人员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国共产党仍不拒绝与蒋介石国民党继

续谈判，因为马歇尔仍在中国进行“调处”。“国大”召开前后，他还在积极支持和推动第三方面人士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他还要用“国民大会”通过的蒋记宪法进行欺骗。因此，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决定，今后仍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仍要求在恢复1月13日停战令时的位置和实行政协决议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50]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现在是否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恢复1月13日停战与政协协议。[51]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仍留董必武、吴玉章等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同时，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表示：尽管由于伪“国大”的召开，政协协议已被破坏无遗，国共两党已无谈判基础，但“为符合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国共两党仍可重开谈判。”[52]12月28日，周恩来在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中共对于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但是，蒋介石迷信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暂时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提议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12月7日，蒋介石向司徒雷登表明坚持内战的决心，表示“于1947年内结束共产党的问题”。根据这一思想，陈诚在12月26日举行的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宣称：将在“一年内消灭中共”。30日，蒋介石发出第七十号密令，指示其部下：“明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的境内股匪”，“在今后一年期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53]

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狂妄计划，马歇尔觉得已不需要他继续在中国进行调处了。经美国政府批准后，他于1947年1月7日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离开南京返回华盛

顿。而他选择蒋介石在军事进攻中取得表面胜利的时候离华，正是便利于蒋介石放手大打。他认为，已经由美国全面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也许能在今后的国共角逐中取得胜利。但同时，马歇尔的举动恰恰也暴露了他调处国共矛盾的真相，即他的调处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和团结，而是为了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从而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使将中国人民重新投入残酷的战争之中也在所不惜。因此，周恩来于1月10日发表演说，评马歇尔离华前的声明，揭露“美国政府是在有意助长蒋介石大打内战”，并号召各界人民“要为停战协议与政协路线继续奋斗。”[54]

至此，历时一年的马歇尔调处终于结束了，美蒋方面向中共进行的“和平攻势”最终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经过一年的调处和谈判，广大人民终于认清了美国调处的真相，认清了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的罪恶目的。中国人民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美蒋方面“和平攻势”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实施反美倒蒋战略创造了条件。

自从1946年7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方针，即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和平谈判为辅的战略和策略。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实施这一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反美倒蒋战略的确立与实施，不仅取决于对美蒋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否正确和取得成效，而且取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是否赞成和支持这一战略。

早在1946年3月美苏冷战开始后，“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声浪就甚嚣尘上。针对这种错误论调，毛泽东曾于4月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进行批驳。毛泽东的这份文件既是他酝酿新战略的起点，也是他创立新

理论——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点。毛泽东这份文件的基本点：一是指出美苏不是必然进行战争而是必然进行妥协；二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进行国内妥协。毛泽东撰写这份文件后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美苏妥协的格局，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过程中，为毛泽东形成新的战略和理论创造了条件。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也及时确立了反美倒蒋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时刻，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类宣传的影响下，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产生悲观估计并散布妥协的论调仍然遍布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

在国内，广大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美国的力量和蒋介石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困难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的有利条件也估计不足；因而表现为不敢同美蒋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并要求对美蒋做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说明：“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59]6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负责人给中央的报告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关于国际形势，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各国人民势力有了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欧洲有了更大的发展，但人民革命势力的中心——苏联却严重地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得胜利；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在战争中打死打伤，极大地削弱了，但在战争中美国却相对地打强了，形成世界反动势力之中心，所有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包括战胜国与战败国目前都依赖着美国来恢复元气。因此各帝国主义之间、战胜的与战败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暂

时相对潜伏着与减弱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矛盾则更尖锐了。鉴于上述两种情况，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力量不能依靠已有的势力采取进攻，形成大规模的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也未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而且，目前世界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动势力，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世界人民革命势力特别是苏联则采取防御、巩固的状态，这个基本形势可能延长 3 年或 5 年，3 年或 5 年之后，苏联元气恢复，美国经济大恐慌，英法与战败国恢复元气，已解散各国（南波等）全面巩固之后，世界形势才又能发生基本变化。只有那时，世界人民的力量才又可能发动进攻。关于国内形势，报告说：中国八年抗战中，人民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这实际成为领导人民解放的中心，但人民势力少一个更坚强有力的实力中心，即没有几个省区联成一起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中国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是削弱了，但是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 CC 派特别在抗战后则加强了，这个加强表现为：嫡系军队的增多，杂牌的中央化，遍布全国的特务网，官僚资本的发展等，又得到美国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反革命势力有着严重的困难（经济恐慌、内部矛盾、人民不满等），但目前均不能制反革命的死命，今后数年之内，在美国的强大援助下，反革命派可能克服其困难，加强其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根据以上形势的分析，党的方针应当是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具体办法有三：需让步以达和平；需拖延以待时机；需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目前已到和战最后关头，拖延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两路可走。目前党应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如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部分解放区，求得全国范

围内部分民主改革，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放下屠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很危险，胜利把握不大。报告最后说："上面意见我们考虑了半年以上时间，想来想去还是这样想，到底对不对，自己无把握，故报告中央，一方面供中央参考，一方面得到中央判定，来最后确定对二次大战后时局的基本认识。"[56]

这个报告说明了在党内存在的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中国政治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和自觉地掌握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的坚定性问题。党内如此，党外就更不用说。在国外，主要是苏联，也存在对美国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问题。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苏联领导人就一直要求中共与美蒋妥协，为此哪怕是解散自己的军队也在所不惜，为此，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共施加压力。1946 年 1 月，苏共中央转来意见认为：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57]1946 年 5 月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是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反对两党的冲突和战争，即用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格局来约束国共两党的内争。所以，苏联继续保持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5 月份，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直到 1947 年 4 月，苏联还表示，在中国仍应按 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确立的妥协方案去做，即维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的国共妥协与合作。应当说，在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苏联的上述政策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在总的方面符合中国共产党与美蒋妥协与合作的战略方针。但在 6 月以后，苏联的政策与中共确立的反美倒蒋战略就不相一致了。在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形势面前，苏

联对华政策已经落后于中国现实了。这一点再次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

党内党外的糊涂认识也好，苏联对华政策的干扰也好，这都是人民内部存在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也只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对美蒋可以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其反革命的两手；对待苏联以及国内的人民和党内的同志，只能用说服的方法或讨论的方法。解决后一个问题并不比解决前一个问题更容易，甚至可能更复杂和更难些。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一方面领导全党及时确立了反美倒蒋的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他们反美倒蒋的必胜信念，同时说服苏联赞同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的战略和策略。这一理论工作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7月6日，毛泽东复函东北局西满分局负责人，明确表示对其报告的意见。复函指出："你们分析中的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7月中下旬，毛泽东又找斯大林于1945年底派来给毛泽东看病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向他说明蒋介石国民党于6月底进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军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毛泽东说：宣化店

事件非同小可，它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但蒋介石装着若无其事，毫不在乎，那是因为他得手了。然而人民却不是这样想的，也不可能不在乎。须知若干年前的平江惨案、皖南事变，人们并没有忘记，而今天又来了宣化店事件。这一事件是蒋介石预谋策划的，是给我们的又一教训，实际上他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难道可以不记取吗？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事件是全面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我们能不提高警惕，能不防范吗？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回答斯大林的。[58]它说明，在美蒋反动派的大举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决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5年8月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月份，就在这一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年以后的1946年8月也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月份，就在这一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实际上承认1945年8月以来调处国共矛盾的失败；就在这一月，毛泽东发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系统阐述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震动中外的著名论断。一年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真诚希望与美蒋达成妥协与合作，希望中国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一年后，毛泽东却发表谈话，系统阐述反美倒蒋的理论和口号。可见，一年间的变化有多大。

毛泽东阐发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是针对美蒋方面散布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论调，针对在这种论调影响下，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妥协思想，其目的是说明在中国实行反美倒蒋战略的必要性，树立反美倒蒋的必胜信念。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点：一是关于

当今世界实际矛盾不是美苏矛盾的观点；二是关于美苏之间存在辽阔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三是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四是世界反美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观点。

关于第一个基本点，毛泽东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国内外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在目前，美国反动派的反苏宣传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而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原来在目前，美国反动派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

关于第二个基本点，毛泽东说：目前美苏之间并不会发生战争，这是因为，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现在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其次，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他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还

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样一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即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

关于第三个基本点，毛泽东说：美国利用原子弹这个新式武器，叫嚣进行反苏战争，进攻世界人民；蒋介石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支持，叫嚣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进攻中国人民，看起来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不可怕；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所以，结论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力量则要比他们强大得多。抗日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因此，未来的历史必将证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美蒋反动派。[60]毛泽东又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反动派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要支撑全世界的反动派。如果他们不出来支撑，房子就会倒塌。而这种房子只有一根支柱，病人很多，医生只有一个，而这些病人患的又都是不治之症，即使打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61]因此，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在反对本国反动派的同时，都与美国帝国主义发生冲突。

关于第四个基本点，毛泽东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反对

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它包括美国的爱好民主的人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它包括一切社会阶级：工人、农民、爱国人士，以及资产阶级中的主张和平的人士。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表现为：东欧建立了一些新的民主政权；英国和法国正在向左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民中出现一些向左转的倾向；以中国为首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泛的人民斗争正在增长；拉丁美洲的民主力量正在发展；美国出现了罢工运动和华莱士事件。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一些直接斗争，而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同苏联之间的冲突。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支柱”，但并不是这些直接斗争的直接参加者。[52]

根据毛泽东理论的第一和第二个基本点，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即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和地区的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如中国的蒋介石之流；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能避免，否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在中国实行反美倒蒋战略的必要性。

根据毛泽东理论的第三和第四个基本点，世界人民应当在战略上藐视美国反动派，中国人民也应当藐视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应当树立反美倒蒋的必胜信念，应当敢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在中国实行反美倒蒋战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这篇谈话，标志着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基本形成。它是毛泽东反美倒蒋战略的理论基础。因此，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反美倒蒋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与斯特朗谈话后不久，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力量是极大地发展了。不管中

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因此，毛泽东要求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63]

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应当看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他的思想影响在当时还有一定的限度。这次谈话首次发表时间是1947年4月，而且是斯特朗在美国的《美亚》杂志上发表。6月份，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才将斯特朗的文章译成中文发表。直到这时，毛泽东的谈话才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但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已经见诸报刊而传遍全世界了。这就是1947年1月4日和5日陆定一依据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的长篇文章。

陆定一的文章经由毛泽东修改而成。它第一次公开而又全面阐述毛泽东在与斯特朗谈话中所表达的思想。它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即反美倒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陆定一的文章首先指出：“一年多以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复杂与中外反动派有意广泛散布的武断宣传，截止现时为止，中国民主阵营中还有一些人，对于战后国际政治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了解，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他们之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左翼批评家，一部分中间派批评家。”所以，文章打算针对这种状况，对国际政治形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个根本的解释。”这几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毛泽东同斯特朗的谈话所阐述的几个问题。

关于当今世界的实际矛盾不是美苏矛盾的观点，陆定一的文

章进一步概括为美苏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但不是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文章说："美国的垄断资本与军阀，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在性质上说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之一"，"苏美之间的矛盾，虽然是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却不是紧迫的矛盾，即不是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矛盾"。16个月事变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了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更具体地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

关于美苏之间隔着辽阔的中间地带的观点，陆定一的文章指出：希特勒的反苏曾经就是奴役德国人民与蹂躏全欧洲的代名词；日本法西斯的反苏，曾经就是奴役日本人民与侵略太平洋沿岸各国的代名词；美国反动派的反苏与以前德日法西斯的反苏口号的含义又有不同：德国离苏联很近，因而还能进攻苏联，日本与苏联接壤，因为国力不如希特勒，只能攻击中国及太平洋，来不及侵苏就被打败了；美国离苏联很远，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欧亚非三洲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加上其他条件，因此，美国很难进攻苏联，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战后时期的实际意义，就是压迫美国人民，侵略苏联以外的一切国家。

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陆定一的文章着重论述了美苏之间辽阔的中间地带国家民主力量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英法等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及其与美国矛盾的发展，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是没有根据的；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特别是中国反对美蒋的战争，其

性质是祖国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许多殖民地半殖地国家都发生了。这些民主势力的发展，必将取得自己的胜利。文章批评这样一些悲观论点，即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势力向前发展的规模还不如第一次大战后的规模那样大；所谓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反动力量将如何了不起，将如何压得全世界全中国喘不过气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可避免，或快要来临，巩固与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取得等等。文章指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就在于被国际国内反动势力暂时表面的强大所迷惑或受反动派的宣传蒙蔽，因而过高估计了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

关于世界反美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观点，陆定一的文章重申世界规模的反美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这一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是世界民主力量的发展，就是世界人民的进步。

最后，陆定一的文章总结道："世界的进步，苏联的成功，美国的危机，这是对于世界今后历史发展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因素。"[64]苏联的成功和美国的危机自不必说，世界的进步则表现在：东欧、东南欧各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巩固进步；英法两国人民的飞跃进步；以中国为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斗争的蓬勃发展；德意日三国人民的迅速左倾；美国罢工运动的高潮和华莱士事件的发生；南美洲各国民主力量的广大发展。这三个决定因素中，摆在首位的是世界的进步。

毛泽东关于决定世界今后历史发展的三个因素的观点明显突破美苏确立的雅尔塔格局的思想和论断，是对用美苏妥协约束世界人民斗争思想的严重批判，与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公然对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最终确立。这是从1946年4月以来，毛泽东反美倒蒋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4月

份，毛泽东反美倒蒋的思想开始萌芽时，只有党内部分同志有所了解。4 个月后，毛泽东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系统阐述了反美倒蒋理论，但也只是非正式地表达和半公开地发表。又 4 个月后，毛泽东的理论就得到公开而又正式的发表。这是毛泽东反美倒蒋的理论由产生、发展到完善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关于世界的进步、苏联的成功，美国的危机是世界今天历史发展的三个决定因素的思想，也是后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反美倒蒋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一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世界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源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理论一旦发展成熟起来，并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为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掌握，必将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就是如此。

1947 年 1 月陆定一文章的发表，表示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或反美倒蒋理论工作的完成。随后，这一理论就回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反美倒蒋的伟大事业。2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贯彻毛泽东反美倒蒋理论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65]毛泽东认为，这个人民大革命不仅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一样，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性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打倒蒋介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为实现党的反美倒蒋战略做了各方面的工作部署。会议为使党将自卫战

争变为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从此，全党思想统一了，事情也就好办了。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粉碎了美蒋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于6、7月份转入战略反攻。9、10月份，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为党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纲领。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在1946年4月撰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说明毛泽东关于冲破美苏妥协格局的反美倒蒋理论最终为全党所接受。[66]这次会后，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毛泽东原曾估计五年之内打倒蒋介石，现在看来要大大提前了。这是因为，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对于胜利前途，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感觉到了。所以，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67]十二月会议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战略决战，打垮了美蒋反动派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宣布了美蒋反动派在中国统治的覆亡。这是毛泽东反美倒蒋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是中间地带理论或者说反美倒蒋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　释

1　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

2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

3　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1946年1月10日）。

4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5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

6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7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页。

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4——1185页。

10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电报（1946年3月24日）。

11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1946年3月27日）。

12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苏军回电给中央和林彪的电报（1946年3月31日）。

13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599——600页。

14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1946年4月29日）。

15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第一政委彭真的电报（1946年5月15日）。

16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1946年4月20日）。

17　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日）。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96——397 页。

19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69 页。

20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74 页。

21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郑位三（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电报（1946 年 6 月 1 日）。

22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军调处执行部第 27 小组的电报（1946 年 613 日）。

23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190 页。

24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当前形势问题给林彪同志的指示（1946 年 6 月 25 日）。

25 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的电报（1946 年 7 月 1 日）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7 页。

26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3——274 页。

27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5 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86——1187 页。

29 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1946 年 6 月 22 日）。

30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464 页。

3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1946 年 7 月 7 日）。

32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465 页。

33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466 页。

34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1946 年 3 月 21 日）。

35 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1——261 页。

36 《解放日报》1946 年 12 月 13 日。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40 页。

38 《周恩来年谱》第 680 页。

3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59——460 页。

40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208——209 页。

41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 214 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44 页。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49 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86——1187 页。

4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84——489 页。

4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 484——489 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02 页。

48 《周恩来年谱》第 688 页。

49 《周恩来年谱》第 679——698 页。

50 《周恩来年谱》第 706 页。

5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1 页。

5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26——727 页。

53 《解放日报》1947 年 2 月 24 日。

54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2——267 页。

55 《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30。

56 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的报告（1946 年 6 月 28 日）。

57 《周恩来年谱》第 639 页。

58 毛泽东同志对李富春、黄克诚同志关于时局的意见的复示(1946 年 7 月 6 日)。

59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4

319——340 页。

60 以上内容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1——1195 页。

6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6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见《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6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09 页。

64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8——392 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11 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11 页。

67 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决议（1947 年 12 月 25——28 日）。

68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 年 2 月 1 日）。

69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5 日）。

70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代表团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3 日）。

71 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1946 年 6 月 24 日)。

第 九 章

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观望和犹豫

自从抗战后期以来，美国运用各种手段实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先是用和平手段，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达到扶持蒋介石和控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而后又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去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为此，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前后两位总统为实施扶蒋反共政策殚精竭虑；前后两位总统特使不远万里，来华调 处；数十万美国军人在中国领土上助蒋内战；数十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然而，美国的巨大代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到 1948 年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宣告失败：美国极力扶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崩溃的危机局势，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美国极力反对的中国共产党已赢得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绝对优势，最后胜利指日可待。在这种条件下，美国被迫考虑调整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过去，美国确立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是基于这样两点基本考虑：一是对蒋介石寄以厚望，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使中国走向统一并接受美国的影响与控制，这就是把蒋介石等同于中国或“蒋

即是中国”的错误观念；二是认为苏联必将支持中共去打败蒋介石以达到影响和控制中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受制于苏联并听命于苏联的指使，这又是将中共等同于苏联的错误观念。根据第一点考虑，支持蒋介石显然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根据第二点考虑，反对中国共产党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苏联，一个受苏联影响和控制的党必然为美国所反对。

现在，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的这两点基本考虑均已发生变化。首先，到 1948 年秋，蒋介石必然灭亡的命运使美国对蒋介石的希望基本落空。其次，自从 1945 年以来，直到 1948 年秋，美国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了解，发现苏联与中共之间并无明显的瓜葛。苏联尽管给予中共一些援助，但这种援助也极其有限。而且，苏联与中共之间还可能产生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美国驻华大使在 1948 年 7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两三年中，苏联在各种场合中已清楚地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有时甚至是藐视。他们在满洲与中共打交道的直接经验，几乎没有增强他们对中共的尊重。”①既然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基础已发生变化，那么，对扶蒋反共政策本身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1948 年 9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内部考虑调整扶蒋反共政策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文件详细说明和论证了美国调整扶蒋反共政策的主要原因。

关于扶蒋问题，文件指出，早在 1925 年—1928 年蒋介石掌权和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就使美国有了希望，认为中国起码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他看来具有进步的和现代的世界观，他皈依了基督教，似乎有能力统一国家，保卫主权。但不幸的是，蒋既没

能统一也没能保卫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的反叛和国民政府在解决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失败，都挫伤了这一计划。在蒋江河日下时，美国政府对他的承诺却日益加深。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把蒋同我们所谋 求的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等同起来。这种持续地只为蒋承担义务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它没有旁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这种被动的局面在事件发展有利于我们时，也许还不致于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中国目前的局势发展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需要自由改变航向。或者哪怕是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为止。而且，由于中国是难以预测的，我们必须避免不可挽回地死走一条路线，或死抱住中国的一个派系，尤其当我们卷入的事情已经明显是输局时，必须心甘情愿地采取减少我们损失的措施。文件关于美国扶蒋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结果的这篇论述是同美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上述思想在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前后就有人提出并论述过，但并未为美国决策者充分注意和采纳，直到这一政策注定要失败时，才又被重新提起。

关于苏联支持中共击败蒋介石以实现影响和控制中国的问题，文件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资源薄，加以政治不稳定，缺乏管理人才，工业化的希望很小；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毫无浪 漫色彩的人对于中国的潜在实力会抱有任何幻想。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较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另外，克里姆林宫所关心中国的，首先不是在于如何帮助中国共产党打败反对力量；赢得国内战争，而是在于如何完全和持久地控制他们及其合作者。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希望隐藏其同莫斯科的关系的时候，也正是克里姆林宫最想施加最大压力，完

全控制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这样一种形势所带给美国的机会，就是有可能使中共与苏联发生矛盾与分歧，这一点是不必细说的。

除以上两点基本考虑外，文件终于认识到，在中国起作用的是巨大的和根深蒂固的本国的力量，这是美国所不能控制的。因此美国必须接受下述事实：美国在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美国自己采取或别人使美国采取了与中国的基本力量相对抗的行动，这种局限性就会成倍地扩大，美国就会自取失败；相反，如果我们采取了顺应这些中国本国的力量的行动，我们的影响就会扩大。既然如此，美国过去提供的援助就不能阻止共产党的推进，更不用说扭转整个发展趋势了；即使乐观地假设，美国人民对于为此在政治和财政上付出巨大代价不加反对，共产党被在战场上击败，国民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最高统治者，那时又如何呢？“我们能保证国民政府不会很快再次垮下来，倒在我们身上吗？”美国的行动并没有根治革命的起因，有什么保证革命不会从头再来一遍，再次被克里姆林宫利用呢？

根据以上三点基本考虑，文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扶蒋，因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性，而一个不是苏联附庸的中国，即使由中国共产党来统治，对美国的安全来说关系也很小。因此，美国将来的对华政策应当是：第一，继续承认现在的国民政府。这是对过去一贯政策的继承和延续。第二，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之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这是对扶蒋政策的调 整。第三，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

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是对反共政策的调整。②

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文件应当说是颇有见地。它是美国高层决策机构中最早检讨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不现实性并考虑调整这一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是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份文件的一个根本的缺点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评价仍是不现实的和不正确的。首先，它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国最后取胜，认为即使国民政府垮台了，内战可能仍将继续下去。其次，它认为共产党即使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但也管理不好这个国家。因为中共将遇到这样三个不好解决的问题：一是行政管理问题，即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管理好中国的行政事务；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将和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即认为社会主义最低程度上将碰到中国个人主义的消极怠工和抵制，在最大程度上将碰到引起社会动乱的反叛；三是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将和党对苏联的忠诚发生对立，这是文件中关于苏联与中共关系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认为苏联和中共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共对苏联的忠诚和苏联对中共的控制都是必然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就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到正确方面来，决定了这种调整的不彻底性和新政策的观望态度。

就是这样一份调整很不彻底的政策文件也未能为美国政府及时批准。文件印发各部门讨论之后，美国主要决策者仍一直处于观望犹豫之中，并继续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的活动。直到11月底，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协调各部门工作的对华政策声明仍然指出："共产党统治中国广大地区是对美国实现对华政策的严重障碍"，表示还得继续支蒋，只是不能全力以赴。最后，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取得胜利后，才促使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1949年2

月 28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上述政策文件和总统意见，进一步提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应当是：（一）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二）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三）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四）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③

根据新的政策方针，美国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并准备停止反对中国革命，同时尽量利用中苏矛盾以待时机。如果美国的新政策能切实执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美国在扶蒋政策的调整方面曾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李宗仁上台，取蒋而代之；二是在军事上撤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并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关于第一项措施，美国政府在 1948 年底就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政府透露，说美国方面认为“委员长”应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说美国政府属意李宗仁，正在让人写李的履历，说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增援。为此，蒋介石曾派人赴美和向司徒雷登大使探听此事。司徒雷登作了希望蒋介石下台的明显的暗示。与此同时，国民党内要求蒋下野的呼声也很高，一部分人想以谋和求得喘息的机会。这样，蒋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1949 年新年发表文告，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于 1949 年 1 月 23 日正式就位“代总统”，并开始与中共谈判。关于第二项措施，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早就得出结论，说国民党在内战中“没有一个战役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因此他早就建议美国停止向国民党运军火。但直到 1949 年 1 月 26 日，美国才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巴大维，次日宣布撤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但仅此而已。

美国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以后，对李宗仁又不愿放手支持。其原因：一是美国看到蒋介石“引退”是假，实际上，他让位并未让权，李宗仁虽然有了代总统职位，但并无实权，没有蒋的同意，他一件事也办不成；二是美国对李宗仁与中共谈判成立的联合政府的方案不满意，美国希望换掉蒋介石的原意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制共产党，决不是为了促成联合政府。现在李宗仁与共产党谈判所建立的只能是共产党占优势的联合政府，这正好与美国的目标相反；三是美国对李宗仁与苏联的关系有疑虑，李上台后立即派人与苏联驻华使馆联系，希望苏联出面调停。苏向李提出要求：中（指国民党）苏达成谅解，在任何将来的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中立，消除美国在华势力。美国在国民党中国身上下这么大本钱，就是为了与苏联争夺在华权益，最后却让苏联插手进来，当然不能容忍。美国在支持李宗仁上台前后还通过各种手段扶植蒋以外的反蒋也反共的人物。但是，美国最终未能甩掉蒋介石而另换他人。蒋介石演了一出“让位”戏之后，于 1949 年 7 月又从后台走到前台。美国绕了一圈之后，发现“无法绕过委员长”，只得仍旧同他打交道。④

美国在军事上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并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后，并未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火。当时，巴大维曾向美国政府建议，暂停向国民党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产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连原来力主援蒋的魏德迈也说：继续以武器援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1949 年 2 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防部的建议，通过一项提案，请总统向国会建议暂时停止在对国民党援助项下的一切军火供应。但是这一建议立即受到国会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不能让美国背“最后把可怜的中国推向灾难”的名声。杜鲁门总统终于否决了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提案，决定“为了不给反共的中国人泄气，不停运军火，但是也不采取催运措施。”⑤根据这一决定，美国政府一再延长《1948年援华法》关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拨款的使用期限，并明文规定，这些款项只能用于“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1949年3月，解放军向长江集结时，美国又向大陆和台湾运来军火，同时，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继续为国民党固守青岛等重要海港。而后，美国还通过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的新军事拨款。在此期间，美国还策划南北分治或隔江而治等等割据方案以延缓蒋政权的灭亡。

总之，尽管美国在政治上有过倒蒋的设想和行动，但它从未放弃过支持国民党，而且最终又恢复了对蒋的支持；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也有过停止对蒋军事援助的设想和行动，但它也从未放弃过对蒋的军事援助 。

对美国来说，扶蒋和反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扶蒋必然反共，反之亦然。不可能有一个只扶蒋不反共的政策。美国虽曾有过扶植反蒋也反共的力量的设想和行动，但都没能成功，最后不得不再次转向扶蒋。而扶蒋的结果必然反共；要反共也必须扶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扶蒋只是手段，反共才是目的。

如果说，美国在扶蒋政策的调整方面曾有过具体行动，那么在反共政策的调整方面则只有理论而无行动。从“极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到“极力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二者只有字面上的差别，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949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曾提出一句名言：“等待尘埃落定”。这是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第一份文件的形象表述。根据这一名言，从1949年初开始，美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政策，是在继续采取敌对态度的同时，又心存观望、举棋不

定。后来，艾奇逊在说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时指出：美国对中国主要关心两件事：第一，随便是谁统治中国，即便是魔鬼也好，都没关系，只要他是独立于苏联的；第二，如果有可能，最好不是共产党掌权，因为共产党总是围着苏联转。但如果共产党掌权，有两个办法：或是直接出兵去打它，或是尽一切力量把他们同莫斯科分开，前者不可行，而应致力于后者，“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与莫斯科发生冲突，因为莫斯科最根本的目标是和中国最根本的目标相敌对的。”⑥1949 年 6 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电报中仍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是“等着瞧”，声称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它是真正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赞成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这两条实际上是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并遵循美国的所谓人权立场。司徒雷登的意思是，只有这两条做到了，美国才会与中共新政权友好；否则，“它就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通过颠覆策略和武装部队进行侵略的公开宣言，并将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真正的帝国主义威胁。”⑦美国理所当然地也反对这样的政权。美国政府和司徒雷登大使以上述两项原则去要求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等人试探中共领导人的态度。司徒雷登还多次会见中共南京军管会外办主任黄华，向他阐述美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当然不会被中共接受。双方的接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美国的实际行动表明，它仍尽一切努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如果中共胜利了，也要尽一切力量促使中共新政权尽快垮台。就这样，美国于 1949 年 7 月初最终放弃了司徒雷登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机会，而将他召回国内。8 月初，在司徒雷登离华返美之际，美国又发表《美中关系白皮

书》，向全世界公开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是执行历史一贯的扶蒋反共政策，对于这一点是不应当有任何怀疑的。一位美国学者说：《美中关系白皮书》“表明了美国对蒋忠诚到何种程度，又是如何明确地拒绝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它“关上了原来半掩着的（与共产党）继续保持关系的可能性的大门。”[31]这话有一定道理，它揭示了美国对华一贯政策的实质。

194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终于迫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并向中国的现实性迈出了那么一小步。这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美国对华观望政策的由来。这种观望政策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示，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观望和犹豫的态度最终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能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直至最后，美国又重新回到原来一贯的对华反动政策之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性和不可改变性，完全是基于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轻蔑和敌视，更是基于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仇恨。美国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错误观念，是其对华政策没能调整成功的根本原因。这种错误观念使它走上了与大陆中国进行二十多年的全面对立。

二　热情与冷漠

如前所述，美国对华政策自从1948年下半年以来曾经有过一个短时期的调整。那么，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形势，苏联对华政策是否也有调整呢？当然，苏联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苏联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是苏联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在本质上不同的根本原因。但是，苏联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一致性，这是美苏双方相互妥

协的产物。这种妥协在抗战后期有，在战后初期仍然有。这种妥协在国共两党和谈时有，在国共两党战争时仍然有。妥协的原因已有详论，此不赘述。这里只指出一点，即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美国妥协的原因之一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共能否在中国取胜信心不足。那么，到了1948年下半年，特别是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已无可怀疑时，苏联对华政策是否也有调整，特别是苏联与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妥协是否有变化？

应当说，面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苏联对华政策是有变化的，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 的信心增强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早在1948年上半年，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等人的谈话中就曾承认，过去两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错了。斯大林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找到某种同蒋介石妥协相处的安排，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权，并解散他们的军队。但是，他们集合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并且象我们现在见到的，他们正在打败蒋介石的军队。目前，从中国的情形看，我们承认我们是错误的。这证明对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斯大林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对中国的认识，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进了一步。这样，苏联和美国在1948年对中国的认识都进了一步：美国终于认识到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的命运，苏联也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强大力量。

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苏联加强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特别

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1948年5、6月份，斯大林亲自指示组织了以科瓦廖夫为组长的技术专家组前往中国，帮助中共解决经济问题和修复铁路等技术问题。⑧据记载，斯大林还向科瓦廖夫等人说：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⑨

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正确认识的结果是减弱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援助，于是产生了它的观望政策；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的结果则是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这也是美苏两国的认识及政策更接近于中国现实、更符合中国革命发展潮流的进步表现。

如前所述，自从194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不深刻的，不彻底的。正是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了美国统治集团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扶蒋反共政策上去，最终放弃了与中共和解的机会。同样，自从1948年以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虽然也加强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增强了对中共的援助，但是，它在战后确立的对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仍然维持在美苏妥协的基础上，对华谋求国共两党的妥协。

关于苏美妥协，斯大林在1948年和1949年上半年仍几次强调这种妥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的公开信所作的答复中公开表示赞同华莱士信中所提的美苏妥协与合作的方案。斯大林说："我认为，在最近的许多以巩固和平、建立国际合作和保证民主为目的的政治文件中，美国第三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文

件”，“这封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限于声明，而是进了一步，认真向前垮了一步，给和平解决苏美分歧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华莱士的方案可以作为达成这种协议和发展国际合作的一个良好而有效的基础，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苏美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绝对必要的。[10]1949年1月，斯大林在回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利·斯密斯的问题时仍然表示愿同美国一起发表共同合作的联合宣言，并表示愿就双方合作问题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会晤和磋商。[11]

关于国共妥协，在1947年底之前，苏联曾反对参加国共关系的调解。那时，斯大林的理由是，中共领导人可能不会接受苏联的调解，因为苏联已从延安召回了它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多少接触了。”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赞成苏联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所以，他认为，如果苏联打算调解并失败了，苏联政府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2]从1947年底以后，苏联对直接参加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47年12月19日，苏联在华官员在宴请国民党政府官员时表示，中共问题不能用军事解决，而应当由苏联出面调停，达成政治解决[13]。在此前后，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也向国民党官员张治中和邵力子等人表示，苏联希望中国内战早日结束，并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假如中国政府邀请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苏联愿在这方面协助，并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14]由于苏联方面的表示，国民党政府不久就给苏联政府发来一信，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苏联政府接信后将信转给中共中央，只说这

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作任何其他说明。⑮其实苏联是愿意调解国共之争的，只是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所以将信转交中共。如果中共同意苏联调解，当然会立即写信或发电表示态度，如果不同意苏联调解当然也就用不着回答而态度自明。这件事后来由于中共未予答复而不了了之。然而，苏联对调解国共之争仍不死心。1949年1月8日，当蒋介石向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发去要求调停内战的备忘录后，斯大林当即把备忘录及草拟的复文转给毛泽东，征询中共的意见。复文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⑯这个复文名为征求中共的意见，实则表示苏联同意参加调停。但是，斯大林的表示仍为毛泽东婉转拒绝。随后，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和谈开始。李上台后即派人与苏联使馆联系，希望苏联出面调停。苏联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能在国际关系中严守中立，并努力消除或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苏联就愿意进行调停，并愿与李宗仁政府实行密切的合作。这一次，苏联不仅有友好的表示，而且有友好的行动。当李宗仁准备任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时，苏联即给予破格的礼遇，正在生病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抱病接见，斯大林也予接见。苏联这一次同意进行调停的表示没有再向中共征求意见。因为这次如参加调停显然是保护李宗仁政府的一种举动，显然是赞同李宗仁政府设计的关于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划江而治"的方案。这一方案是为中国共产党所坚决反对的。

苏联在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向优势，国共两党决战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已确定无疑时，却一反常态，

积极要求调解国共两党关系，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苏联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上的迅速溃败，政治上的日益反动和经济上的全面衰退。实际上，它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即美国的支持和帮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苏联不只是看到这一点，它还看到了美国直接干涉的现实危险性。过去一直担心这种危险性现在可能要出现了。其明显的迹象就是1947年下半年美国特使魏德迈的使华及其向华盛顿的报告，还有1948年美国《援华法》通过。苏联以希腊的经验为鉴戒：希腊反动政府虽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队的进攻下迅速溃败，但由于美国的直接干涉，革命起义的烈火终于被扑灭，反动政府继续掌握全国政权。苏联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与在此之前希腊的形势并无二致，其所处的国际地位也完全一样，都是美国全力维护的势力范围。既然蒋介石政府已经处于最后失败的危难境地，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面对这种局势，苏联应有相应的政策。中国和希腊都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因而不需要苏联象对待东欧各国那样去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对希腊的政策又有所不同。苏联在希腊并无特殊的民族权益，而且苏联与希腊并不接壤，鞭长莫及，所以只能或索性听任美国的干涉而不加过问。苏联在中国不仅有特殊的民族权益，主要是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权益，而且与中国有长达上千公里的边界接壤。这就使得苏联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这就是苏联积极要求调解国共关系的深刻原因。苏联希望通过这种调停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因为美国全面干涉的成功必将使苏联失去在中国已经获得的民族权益，并将排除苏联在中国的影响。

但是，苏联的调停显然极其有利于国民党，因而极大地不利

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苏联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赞成苏联调停国共之争的情况下仍长期坚持要求调停呢？为什么苏联不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与美蒋对抗从而最终打倒美蒋，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呢？如果上述目标得以实现，苏联的影响不是可以在中国继续保持吗？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涉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苏联与中共结下的历史宿怨并没有因为中国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冰释，苏联对中共的不信任态度也没有因为中共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而根本改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信任感还有所加强。一方面，中共的胜利使苏联对中共与美蒋对抗的强大力量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中共的胜利却使苏联感觉到，中共脱离苏联的影响和控制的独立自主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且，在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苏联控制，公开走与苏联对立的独立自主道路，南斯拉夫的道路难免不在中国出现，难免不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循。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循，那么，苏联的在华权益以及在中国的影响也将会失去。当然，苏联也害怕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会成为美国全面干涉中国的借口。

因此，美国的直接干涉和国民党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并走南斯拉夫道路，都是苏联不希望出现并采取措施极力避免的。在中国维持现状，即国共两党谁也不消灭谁的局面最符合苏联的愿望。这样，苏联可以继续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美国也可以继续保持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至于国共两党谁占优势，那倒无关紧要。前两年显然是国民党占优势，而现已变成共产党占优势，这将更有利于苏联的在华影响和地位。这也说明了苏联为什么会赞成李宗仁提出的“划江而治”方

案，而且不止一次地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去。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直到 1949 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会出现南北朝"。又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可能出现南北朝。"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他"，就是指的斯大林。杨尚昆则指出，是在"三大战役"之后，米高扬来华访问时提出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劝告或警告，说中共不要过长江，让蒋介石在江南存在下去，并警告说，假如解放军过江，美国可能出兵干涉。⑱陆定一也指出："苏共曾派米高扬到石家庄劝说我们的党。""不该派兵横渡长江，统一中国。"⑲苏联还向张治中透露，说中共决定要打下去并不是苏联的决策，"苏联只劝告他沿着长江停止进军。"⑳不仅如此，由于苏联害怕美国干涉，所以，它在加强同中共的联系和援助中共时又尽可能限制这种联系和援助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在 1948 年 5 月，当毛泽东提议并准备亲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争取苏联的支持时，斯大林却以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为由婉转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很快，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斯大林这时不希望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帅到莫斯科来，难免不为全世界知道，从而形成苏联全面支持中共的印象。这是苏联所不希望出现的。其实，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更清楚，中国解放战争的现状是否可以暂时没有毛泽东的直接指挥。毛泽东提出访问苏联显然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的提议说明，他认为此时赴苏联访问争取苏联的支持比他在国内直接指挥战争更为重要。否则，他是不会在此时提出这个问题的。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并不是坚定支持的态度。既然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来访，毛泽东也只好作罢。但斯大林答应，如果中共领导人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商量，他可以派一个有相当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国听取意见。这就是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的由来。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秘密来访，生怕暴露自己，直至五十年代初，米高扬还向中共领导人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迅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21]可见当时双方保密措施的严格。

与此同时，苏联还反复向国民党方面强调对中共不满的态度，并努力维持与国民党的关系。1948年晚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向印度驻华大使说，他认为他的政府没有理由干涉中国的局势，说"让他们自己去决一雌雄吧。"接着，他坦率地承认在苏俄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的政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罗申还暗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即使对共产党来说，也将是"难以消化的"。最后他说："让美国去尽情地把金钱抛给中国吧！这只能使他们自己日益虚弱。"印度驻华大使根据罗申的谈话得出结论：苏联情愿在它的东部边界上有一些小国，不论是否共产党国家，因为这些小国将构成就近的缓冲地带且无威胁。但象中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共产党大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福音。毋容置疑，它将不但会产生在南斯拉夫曾经产生的同样的独立倾向和争论，而且规模要大得多。对此，苏联将不得不在东方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印度大使将他与罗申会谈的情况

通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又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㉒1948 年 7 月，罗申继任苏联驻华大使时向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表示，中国内战应该结束。罗申在谈话中还给彭昭贤等造成这样的印象：苏联对中共持怀疑态度，怕中共走南斯拉夫道路。㉓

就这样，苏联对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和调停国共两党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漠。1948 年下半年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引起了欧洲、亚洲、美洲的一片震惊。各国报刊纷纷发表头条新闻，时事评论，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占东北、横扫华北，攻克平津和聚师长江待渡的形势。对于这一系列巨大的发展变化，苏联除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背页的三言两语报道和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几段文字外，却毫无反应。这两大报纸及其它官方报刊从未发表编辑部的评论或分析文章。在苏联，“中国”这个词当时简直看不到。在大学里，不上关于中国的课，不进行关于中国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基本消失；在图书馆里，有关中国的那部分书架是空着的。1948 年秋至 1949 年 1 月滞溜在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描述了她当时在莫斯科的见闻：“秋天来了，中共胜利的消息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传播了。我每天在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中共胜利的消息。当我在城里走动，遇到记者拿着巴黎版的纽约报纸时，这些报纸也登着关于中共的、横跨八栏的大字标题新闻。苏联的报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热切地想从它上面看到什么消息。我注意到，十一月初在《真理报》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的标题上，出现了一条四五行字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打下了沈阳。这意味着他们占领了

整个东北。我寻找社论，可是没有。我继续认真不倦地注意看报纸。直到12月6日，在第四版的塔斯社通告栏下，出现了一条略长的六行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长江以北国民党最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被攻占。’华北已被中共所攻占，莫斯科的报纸上依然没有社论出现！”㉓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不仅如此，苏联报刊还强调，中国的将来发展和国内和平的保持，仍要靠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造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逸仙演说中的合作。㉔这种报道显然是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的胜利，而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分享中国。

苏联报刊对中共的冷漠与下列事实也是密切相关的。苏联驻华大使在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直至中共军队攻下南京后较长时间，罗申是唯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大使。近年来，苏联有人认为，苏联使馆迁往广州是为了不给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借口，是打算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撤离长江一线，为解放军南下排除外交障碍，是为了防止美国以坚持在华利益和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名进行军事冒险。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关于苏联迁馆广州是企图为解放军南下排除外交障碍的说法值得商榷。下列事实实际上驳诉了这种说法。1949年4月，迁往广州的罗申大使向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5月份，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为5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以后，苏联仍继续与国民党政府频繁交涉，努力争取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协定》。为使协定能够签订，苏联在7月下旬还向国民党政府作重大让步。㉖而同时，苏联正与刘少奇率领

的中共代表团秘密会谈，并决定为中共部队进入新疆提供帮助。[27]这就是苏联脚踏两只船的对华政策，实际上也是犹豫和观望的对华政策。

1949年8、9月份，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转折点。8月份，中共军队攻下兰州后，国民党政府决定终止同苏联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9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案。[28]至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恰在此时，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样，苏联不得不先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后方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近年来，有位苏联学者在评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写道："苏联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1949年10月2日，苏联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并决定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就此给毛泽东发去任何个人书信。斯大林的沉默是很奇怪的，更何况10天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位总统威兼·皮克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发去一份很长的亲笔信。"[29]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是缺乏深刻认识的。而且，苏联政府立即任命几个月前任国民党政府大使的罗申为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这一措施连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是对中共新政权的大不敬，因为这在国际惯例上是很少见的。

在这里，可以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总结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

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0]这是从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过程中对斯大林的失误作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判断。

注 释：

1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 年) 第 7 卷，第 360—361 页。

2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 年) 第 7 卷，第 146—155 页。

3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9 年) 第 8 卷，第 492—494 页。

4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9 年）第 146—147 页。

5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199 页。

6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254 页。

7 《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第 5 期，第 24—25 页。

8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2 期。

9 《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2、3 期，引自《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2 年第 21 期，第 29 页。

10 《消息报》1948 年 5 月 18 日。

11 《消息报》1949 年 2 月 1 日。

12 哈里曼《特使》第 591—592 页。

13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7 年) 第 7 卷，第 411 页 。

1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309—310 页；《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 第 7 卷，第 21 页；101 页。

1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67—368 页。

16 《党的文献》1969 年第 1 期，第 57—58 页。

17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2 日。

18 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

19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56 页。

20 《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 页。

2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73 页。

22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第 7 卷，第 360—361 页。

23 《斯特朗文集》（2），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7 页。

24 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第 381 页。

25 《党校科研信息》1990 年第 34 期，第 11 页。

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篇《战后中国》（一）第 805—824 页。

27 《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2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 837—844 页。

29 《亚非人民》1989 年第一期，第 63—67 页。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5 期。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的历史回顾》（上卷），第 490 页。

31 鲍布·纽曼文《开场白》1982 年秋季号，第 153 页。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234 页。

32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8）第七卷，第 360—361 页。

3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66 页。

第十章

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

一 思想、政治倾向

毛泽东在1946年确立的反美倒蒋战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斯大林要在划分“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同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达成协议的战略目标是不相一致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双方战略目标的这种不一致性。为此，他曾提出中间地带理论，阐述在中国实行反美倒蒋战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试图说服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内外和党内外的朋友和同志赞成或支持中国共产党为实施反美倒蒋战略所制定的政策和策略。

然而，苏联并未表示赞同毛泽东确立的反美倒蒋战略和为此而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相反，苏联对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拓性的发展道路却表示怀疑和不满。这种怀疑和不满首先表现在1947年9月成立的以苏联为首的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这次会议不仅不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意义只字不提，不要求各国共产党和世界各民主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实施反美倒蒋战略，而且，会议提出的世界分成以美帝国主义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苏联起“领导作用”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两个阵营”理论是对毛泽东关于

中间地带理论的基本否定。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所要阐述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间存在的辽阔中间地带，包括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这里的革命发展对世界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两个阵营的理论则根本漠视美苏之间辽阔中间地带的存在，更不用说这一地带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了。

苏联的怀疑和不满还表现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苏联的遭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向其阐述中间地带理论的那位著名记者。斯特朗女士于1946年下半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会谈后，于1947年初离开延安回国。1947年4月，斯特朗女士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发表毛泽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谈话，并且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了毛泽东的独创性理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此后不久，斯特朗来到莫斯科，满怀希望能在苏联、东欧地区出版和发表她关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书和文章，使得毛泽东的独创性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不仅在西方，而且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广泛传播。她的意愿是好的，也是天真的。她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既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得到传播，更何况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呢？但不幸的是，斯特朗女士在莫斯科却被当作美国间谍而遭到逮捕，随即被驱逐出境。她关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书及文章在苏联、东欧各国被禁止出版和发表。斯特朗要在苏联、东欧地区传播毛泽东理论的宿愿没能实现。

斯特朗在被苏联驱逐回国后曾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明她对遭到苏联政府逮捕的不理解和她对不能在苏联、东欧地区传播中国革命思想和毛泽东理论的遗憾。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冒犯苏联的活动”；“我曾给斯大林去过两封信和一封电报，要准许我向他指定的法庭解释我过去三十年

来的任何行动。但我未收到回复，也许他没有收到我的信，或者认为不值得为我恢复名誉与工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损失是我认为对于新中国极其重要的工作受到沉重的打击。当我被捕时，我写的关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政策和方法的文章，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共产党报纸及美国发表。关于我在新中国见闻的书已在印度、纽约、巴黎出版，而且即将在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柏林以及罗马等地问世。但因我被捕，书与文章的出版全停止了。”她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过去和现在都是回到中国来，……但正如你知道的，在我正要回来的时候，俄国人逮捕了我。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为了什么原因逮捕我，我直到今天也不清楚。……由于发生这件事，七个国家（在莫斯科、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巴黎和罗马）决定取消出版我报道中国的书，而我曾在那里用了一年才安排好该书的出版。这件事也使报纸中断刊载我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欧洲许多地方的报纸上，都是用四栏大的标题来刊载的。这件事就这样使我的工作大受摧残。”①

斯特朗作为一名记者，确实不明白苏联逮捕她并禁止出版她的书和发表她的文章的真正原因，因为她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略和理论与斯大林的战略和理论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当然也不能理解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和不满。

毛泽东作为一名天才战略家，非常清楚苏联逮捕斯特朗女士并禁止出版和发表她的书及文章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深刻理解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理论与斯大林的战略和理论的不一致性，也非常了解苏联对中共的怀疑和不满。当斯特朗女士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就嘱咐说，斯特朗特别应该把她在延安所了解的情况带到美国去，但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去。斯特朗从毛

泽东的临别嘱咐中得出这样的印象：毛泽东只不过是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因此，斯特朗不应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直接回到美国。后来，斯特朗回到美国又返回中国途径莫斯科时果然被捕，使得斯特朗要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宣传毛泽东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愿望没能实现。这确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苏联根本不需要了解毛泽东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斯特朗在莫斯科的狱中才又想起了毛泽东的嘱咐。直到这时，斯特朗才提出疑问：毛泽东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并且预先叫我不要去呢?②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态度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他们在不改变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赞同和支持苏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情报局会议召开后，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客观报道了会议的情况，也转载了日丹诺夫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毛泽东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提到：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檄文。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表示赞成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并且第一次公开承认“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

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③

但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阐述的两个阵营的理论，与情报局会议所阐述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关于两个阵营所包含的范围，特别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所包含的范围，根据情报局的理论，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实际上只包括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新民主主义国家。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在说明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时只提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运动则只字未提。日丹诺夫的报告说明，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基础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提到反帝国主义阵营受到一切国家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受到各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战士的支持，受到各国所有进步的、民主的力量的支持，但这并不属于反帝国主义阵营本身。毛泽东所阐述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不仅包括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直接包括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反帝国主义力量，美国内部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势力，拉丁美洲不顺从美帝国主义的奴隶以及整个亚洲兴起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次，情报局的两个阵营理论所强调的是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强调其它各国共产党、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支持。毛泽东的两个阵营理论则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帝民主力量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作用。毛泽东还着重强调了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强调“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说“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

紧紧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④这里的潜台词是，即使没有外援，没有苏联东欧的援助，我们东方的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也能取得成功，制胜的法宝就是依靠群众。一句话，有没有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反帝力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是毛泽东的两个阵营理论与情报局的两个阵营理论的根本区别。情报局的两个阵营理论与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实质上是对立的，毛泽东的两个阵营理论则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英明所在。

不管怎样，毛泽东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阐发，说明了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说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进行的创造性工作。毛泽东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阐发，可以说是毛泽东走向“一边倒”决策的第一步，是在思想理论方面走向“一边倒”决策的重要一步。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基本观点，但他仍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甚至可见的将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美苏之战也不会爆发。正如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这种战争，只是在“将来”，即“遥远的时间内”才有可能爆发。而且，即使这种战争爆发，全世界的民主势力也一定能制止战争。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的内部讲话中进一步说明，美苏之间仍是“早妥协与迟妥协”的问题，最近期间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很多人以为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一定破裂，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发生，美苏妥

协没有希望，这种看法不对，是迟早妥协，美国没有战争意思，苏联也没有战争意思，所以打不起来；苏联代表潘友新到美国谈判偿付130亿美元借款问题时说，现在两国政府之间的对立形势并不妨害两国合作，所以双方迟早要妥协，战争是远景。但是，毛泽东又说明，美苏迟早妥协是民主力量强大的结果，因此，各大国的妥协，不等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妥协；各国反动派之所以能上台，主要是因为工人武装，统一战线，未动员广大群众，订立的条约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发动群众拿起枪独立自主地干。所以，不能让大国的条约束缚自己的手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正式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在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发向全党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决议，使毛泽东关于反美倒蒋的理论和政策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1948年上半年，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冲突并导致双方关系公开破裂。根据苏联的主张，情报局所属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党除外）于6月下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九国情报局的决议。苏南冲突及关系破裂给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深刻的影响。苏南冲突发生，欧洲各国共产党普遍清洗原南斯拉夫分子，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普遍恶化，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受到严厉谴责和沉重打击。后来，事态的恶化使得苏南两国濒临全面武装冲突的危险。

苏南冲突及关系破裂也给中国带来重大影响。苏南冲突事件的发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更深的怀疑，因为铁托主义的“幽灵”早就存在于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在抵制苏联发号施令。现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敢于

抵制苏联和背叛苏联，走独立自主的道路，那么，在远东实际上已经脱离苏联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更敢于同苏联相抗衡，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这样做了，现在和将来依然会这样做，这都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深感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的。苏联的不满也是中共领导人早就感觉到的。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既不得罪苏联并尽量维护苏联的利益，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苏南冲突事件的发生，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他们深深认识到，尽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它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和仿效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强大后盾和国际援助力量；没有苏联的同情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直至中国共产党反美倒蒋战略的实施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识到，目前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处的地位毕竟是不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还正为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而浴血奋战。南斯拉夫有条件同苏联冲突，而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绝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不能与苏联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尽可能地取得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继续同情和支持。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可能在与美蒋反动派的最后决战中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如果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破裂，那么，中共要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将十分困难，即使取得了最后胜利，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也是很成问题的。

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 1948 年 4、5 月份就准备亲自去莫斯科一趟，好向斯大林面陈中共的一切政策，希望苏联能在中共筹

建新政府等问题上给予支持，同时廓清苏联对中共的误会。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当时曾向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我是想到苏联去，要求他能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不会支持我们。苏联可以支持我们，苏联带了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能孤立，在国际上有人支持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说话才能更有力量。"⑤在戎马倥偬的紧张之际，毛泽东决定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出访苏联，说明了毛泽东要改善与苏联关系和取得苏联支持的迫切心情。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斯大林婉转拒绝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请求。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7月获悉情报局关于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后，很快就召开会议并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会议表示"完全同意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共中央的决议批评以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批评这个领导集团采取反苏立场，压制党内批评，拒绝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兄弟批评，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在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公布以后，继续压制南斯拉夫党内外的正确意见，继续敌视国际共产主义，因而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事业，并使南斯拉夫的敌人欢呼。中共中央的决议表示"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分子能够坚决地起来纠正铁托集团的错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走上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的轨道。”⑥

中共中央通过了批评和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之后，刘少奇又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代表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系统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尤其着重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苏立场。刘少奇在文中说：“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怀抱一种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危险比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危险还要少一些’，如铁托集团所作的那样，乃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把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或同等看待，用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样态度去对待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如铁托集团所作的那样，乃是错误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因此，“如果实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及其对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不去联合苏联，而去反对苏联，不去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而去反对各新民主国家，不去联合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对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而去反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样，那就必然要去联合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就必然要站在帝国主义阵营一边，联合世界各国的反动势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业，更不能成功任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愚弄和侵略，以致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立，使自己国家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⑦

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和刘少奇《论国际

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南冲突事件发生后坚决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支持苏联共产党的鲜明态度。应当说，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刘少奇的文章并不是在进行全面、科学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正忙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最后决战的中国共产党绝无可能对远离中国的苏南冲突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和了解。他们做出决议和发表文章的根据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抽象的概念、苏联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控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对苏南冲突这一十分复杂而自己又不十分了解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却如此迅速地做出决议并发表文章表明态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排除苏联对中共也走南斯拉夫道路的怀疑，避免中共与苏联发生冲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比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高明之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能够坚持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张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政策，并敢于抵制苏联以大党和大国地位凌驾于其他党和其他国家之上的作风。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正确的。但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苏联采取硬顶和激烈对抗的形式却有不足之处。就是说，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方面，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的运用上还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各国党的关系方面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一样，也能坚持原则，坚持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政策，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做得更早更好。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35年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坚持抵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这方面，绝不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做

得差；但是，在战略和策略的运用上却比铁托和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要强得多。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地位和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持与苏联的关系，不仅不与苏联发生公开冲突，而且尽可能地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怀疑和不满，并想办法努力改善双方关系。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刘少奇的文章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标志，因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就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和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期间，毛泽东又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进一步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这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一致性。文章还说，在过去，“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吗”？现在，即战后，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仍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⑧这是对苏联和 关于两个阵营

理论的进一步支持。这样，毛泽东就完成了走向“一边倒”决策的第二步，即在政治上向“一边倒”决策的重要一步。

在上述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强调美苏之间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重申 1947 年 12 月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实际上是重申了毛泽东早在 1946 年 4 月所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说，“1947 年苏、美、英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条约。对德奥、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英法与苏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性会少些。”这就是目前的国际基本局势。这种局势是不是要求各国都进行妥协呢？毛泽东说：“苏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要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需向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毛泽东认为，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那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他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即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才留待将来消灭之。所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即消灭反动派，不与之实行妥协。⑨毛泽东的论述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完成了走向“一边倒”决策的第二步，但仍坚持实施自己独立自主制定的反美倒蒋战略，并不因为自己的对苏政策有所改变和美苏之间的国际妥协继续存在而稍有变更。

二　在外交上努力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苏联可能怀疑中共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道路的估计是有道理的。从1948年底开始担负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联络任务的科瓦廖夫曾说，当时斯大林十分关注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站在哪一边，同时斯大林还十分关注中共对苏联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1949年初，斯大林曾几次致电科瓦廖夫，要他了解毛泽东和中共对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条约的真实态度。由于苏联担心中共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道路，因而担心中共取得全国胜利后会使苏联失去已得的在华权益，所以，在1948年和1949年冬春之际，苏联热切希望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并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当然，苏联企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去，后来又阻止中共进攻台湾等沿海岛屿的公开理由，是可能引起美国出兵干涉。

针对苏联的担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基础上，对苏联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公开宣布自己的坚定立场，即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某种变化，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一是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

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因此，毛泽东提醒国人，特别是那些对美国当局寄以希望的人予以警惕。针对苏联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毛泽东说："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⑩同时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把美国的干涉考虑在内的，后来又告知，第二野战军集结于浙赣路，就是准备对付武装干涉的一种措施；⑪说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⑫1949年1月9日，苏联政府收到国民党政府请求调停内战的备忘录后，斯大林致函毛泽东，征询中共的意见，实际上愿意调停国共内战。毛泽东当即复函斯大林，并为斯大林草拟了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答复。毛泽东在信中说："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即苏联政府历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倾向于要南京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并阐明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胜利时间。⑬这实际上很明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调停愿望。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米高扬来到西柏坡

中共中央所在地访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之进行了长谈，主要是毛泽东谈。他在2月1日、2日、3日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在会谈中，毛泽东主要说明了当时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客观条件，以打消苏联的担心。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实力了。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从主观方面来说，主要是我们的军队斗志坚强、士气旺盛，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口号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倒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又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这可以说都是主观条件。从客观上来看，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也是成熟的。毛泽东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

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既然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经验已经证明，美国并不会出兵干涉，那么，苏联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呢？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还指出了中共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以及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必然会遇到的一系列困难问题：比如当前的物资短缺问题，进攻海岛问题，特别是进攻台湾和香港问题，在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建立问题，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表示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他说，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朋友，同时也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毛泽东宣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会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⑭毛泽东的这段话明确告诉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苏联不要对阻止中共前进或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存在幻想。

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后不久就从西柏坡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又同科瓦廖夫以及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交谈。毛泽东

再次向他们阐明了中共一定要渡江南下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决心，并进一步说明，到现在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侯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出访苏联，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再次同柯瓦廖夫会谈，向他说明，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胜利。

毛泽东在向苏联反复而又耐心地说明中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又努力加强同斯大林和苏联的联系。1949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意见。电报说："关于黑龙江上设立标记问题，同意友好一方的意见，拟派技术人员前来，中国方面设立标记的费用由中方承担，标记权将属于中方。两岸都将设立标记，请贵方确定双方应遵守什么条例，我们一定严格遵守。"⑮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同苏联最早达成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随后，毛泽东又几次致电斯大林，就新疆问题、外蒙古归属问题以及苏联向中国贷款等问题征求意见。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向柯瓦廖夫说明，联共（布）中央对他可能不太信任，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他还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苏联的人，他不仅没有见过斯大林，而且没有见过除米高扬以外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因此，他希望同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进行个人接触。他在 1949 年 4 月底再次表示了要访问莫斯科的决心。在此前后，斯大林也几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申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请求。关于毛泽东赴苏联访问一事，斯大林说：毛泽东"不应仓促实现莫斯科之行。您现在不应丢下中国和领导工作不管，因为南方情况复杂，而中国实际上还没有政府，这对革命

事业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关于贷款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同中国的贸易原则是以货易货，这我们正在进行，将来还会进行。这样做无需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至于贷款，则要求最高苏维埃决定，最高苏维埃不会反对给中国贷款，问题是要有一个求援国代表签字的文件。否则最高苏维埃不会同意贷款。另外，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还谈到了中共新政府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说“我们认为，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放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国民主政府不应拒绝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⑯4 月 份，即中共部队发动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一份长电，其中就如何更好地组织新中国各方面生活提出一些建议，同时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进行了估价。这时，斯大林已不再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去，因为这实际上已不可能。他这时只提醒中共进攻中国南部海岛与邻国边界线时，警惕美英法等国的干涉。斯大林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辉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已经结束。斯大林认为，英法美怕人民解放军越过中国接壤国家的边界线，进而在这些国家以及蒋介石占据的岛屿造成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来保住岛屿和亚洲。而且，英美军队在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尤其增大了。鉴于此，斯大林建议毛泽东：“1. 不要着急，要认真做好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推进到与邻国边界线的准备；2. 从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选出两个好的军团，投放到港口地区，充实当地力量，防备敌军行动；3. 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⑰对斯大林的上述一系列电报及其所表示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双方之间的交往基本上也是融洽的。这种友好交往为毛泽东完成走向“一边倒”决策的

最后一步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就在苏联与中国的关系逐步好转时，美国也对建立与中共的关系进行了试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反对与美国进行接触。1949 年 5、6 两月间，中共南京市军管会外办主任黄华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会谈。⑱中共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⑲美国也一样，"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关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中共中央还指示黄华，对于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径波提出要司徒雷登继续任驻中共新政府的大使以与中共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⑳中共领导人在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铭枢的会谈中表示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即希望美国从此不再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象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中共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能象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毛泽东还私下告诉陈铭枢，要他转告司徒雷登，请司徒雷登读读他 6 月 20 日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从中可以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他在其中表示希望说，中国愿意在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㉑然而，中共的努力未能奏效。司徒雷登在 1949 年 7 月 13 日致美国国务卿的一份电报说明了中共领导人的热诚态度。司徒雷登说："陈铭枢在从北平回上海的途中拜访了我。由于我急于离华，我将在返回国务院后再向您汇报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将随身带来

谈话的备忘录。这里只消说一下陈将军在北平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在回到南方后热情地谈起（共产党）新领导人朝气勃勃的品质等情况就足够了。虽然陈——他并不是没有潜在地意识到共产党对他的党和中国的威胁——的兴致很高。但总的来说，他的报告令我沮丧。没有任何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路线，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虽然没有政治关系，但仍然能够而且将要建立起经济关系。”㉒同美国进行两个来月的交涉及长期的经验，使毛泽东深深感到，要使美国改变对中共的态度并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是多么难，从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共与美国改善关系或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并不成熟，而中共与苏联改善关系或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基本上已经成熟。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外交战略问题。鉴于美苏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以及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继续观望态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决定自己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以利于新中国建立时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这样才能够避免受制于人。既然美国与中共在短期内没有改善关系的希望，而且有再次恶化的可能，那么，在美国对华政策仍持观望态度时就公开宣布在外交上与苏联站在一起，而不与美国站在一起，这在实质上并未影响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但却大大增加了苏联对中共的信任与友好。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决策。毛泽东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

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样，毛泽东就完成了走向“一边倒”决策，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最后一步。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政策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了这一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邓小平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从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㉓邓小平的这段话扼要说明了毛泽东“一边倒”决策的背景、意义和基本内容。从背景来看，中共与美国改善关系实际上已不可能，所以才有“一边倒”的决策。从意义来看，主动的倒向苏联比将来不得已而被动倒向苏联好得多，对我更有利。从内容来看，中共倒向苏联并不是屈从或依赖苏联，中共的基本点仍是自力更生。

毛泽东在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天，美国政府就给司徒雷登发来指令，要他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与接触，并迅速返回国内。随后，美国又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表明美国政府的一贯反共立场。司徒雷登则奉命于白皮书发表前夕离开中国回国。《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和司徒雷登回国后，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数篇文

章，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得出的历史结论。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也是这个历史结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思想、政治和外交的准备上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战略上看，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不仅具有重大的外交意义，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这种意义的具体表现。同时，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还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中国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中国一系列新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都同这一决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毛泽东确立“一边倒”政策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迅速发展。7 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一年前，毛泽东就要求亲自访问苏联。1949 年 3、4 月份，毛泽东又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那时，斯大林都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及军队的主帅，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现在，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斯大林似乎没有理由再行拒绝。刘少奇这次访苏的目的与毛泽东两次请求访苏的目的是一样的，主要是争取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并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

刘少奇一行在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刘少奇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阐述了中共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政权性质及组织构成、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苏关系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苏联领导人担心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刘少奇指出：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与阻止中国革命，这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是，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几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袭击，却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这将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刘少奇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刘少奇向苏联领导人重申了毛泽东确立的“一边倒”政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刘少奇说明中共新政权进行外交活动的原则是：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刘少奇同时说明，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关于中苏关系，刘少奇说，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所以

希望能迅速解决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刘少奇表示，由于中共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希望苏联提供建议和帮助。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国的联系，应该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另外，刘少奇还给联共中央写信，要求解答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以及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苏联能象二十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干部的学校，还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培养海军干部。刘少奇再次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在会谈中认真听取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并给予中共代表团以比较满意的回答。斯大林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吸收他们参加政府，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斯大林肯定了中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关于中共新政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斯大林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通过要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成立后，苏联就立即承认；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还表示愿意为中共提早解放新疆提供必要的帮助，并愿意帮

助中国建立海防。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

斯大林的这一系列友好表示，说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已经取得重大成效，也是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和刘少奇的访问还促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对中苏两党之间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促使斯大林公开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斯大林进一步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品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此，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象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象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

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不久前，斯大林还以大国和大党自居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现在，他却以如此谦虚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代表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团结的重要性，斯大林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特别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㉔

关于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斯大林几次主动询问中共代表团："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当中共代表团回答说，苏联没有妨害中国革命、中共在和平运动中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时，斯大林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㉕斯大林这种主动承认错误的态度使中共代表团很感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

总之，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和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

苏联取得了巨大成果。它们为争取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尽快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并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立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军队提前解放新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和交涉，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盟由此形成。随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大量经济技术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经过一段犹豫以后，也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继续采取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不仅自己不予承认，而且怂恿和操纵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加强了对已从中国大陆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中苏联盟形成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遣武装力量进驻台湾地区，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施保护。从此以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治、外交的对立，走向包括军事对立在内的全面对立。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也从此开始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双方关于中国问题的纠葛至此结束。

美苏关于中国问题的纠葛结束以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　释

1　斯特朗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3 期。

2　《斯特朗文集》(2)，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2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58——1260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59——1260 页。

5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103——107 页。

6　《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0 日)，载《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解放社 1949 年 5 月出版。

7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 年 11 月)，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单行本)。

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56——1359 页。

9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9 月 6 日)，《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

1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72——1380 页。

1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0 页。

12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0 页。

13　《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增刊，第 100 页。

14　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1949 年 2 月 1 日，2 日，3 日)，《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5——385 页。

15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2、3 期（合刊)。中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2 年第 21 期。

16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见《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2 年第 21 期。

17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2 期。

18 《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77 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1 页。

20 中共中央关于黄华与司徒谈话的指示（1949 年 5 月 10 日）。

21 《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第 5 期，第 28 页。

22 《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第 5 期，第 30 页。

23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5 页。

2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11 页。

2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14 页。

结　论

1943——1949年毛泽东的外交战略集中反映了美、苏、中“三国”和美、苏、国、共“四方”之间的关系。国际矛盾和冲突与国内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了纠葛。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交易，有妥协，也有斗争。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进行了最后决战。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控制权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和较量。

这一时期，美、苏、国、共“四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激烈角逐，各显身手。美国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排除苏联对中国的染指和在中国的影响，从而实现控制国共两党和最后控制中国的目的。苏联依靠其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接壤和与国共两党的历史联系等有利条件，努力扩大或保持其在华影响和权益。蒋介石国民党依恃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和美国的大力支持，企图排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并在内战中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制定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以与美蒋反动派对抗，并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三国”、“四方”角逐，究竟鹿死谁手？历史已经做出了判决。但其根源何在？

关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是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兴起的两股最大的社会政治思潮，也是两种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在40年代，即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这两种思潮和运动在中国仍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从革命的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有一致性。在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是民族主义的根本任务。

从概念和内容来看，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活动方式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都是不相同的。共产主义概念的范畴和内容要比民族主义广泛得多。严格来说，共产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代表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主义反映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利益。

在中国，民族主义比共产主义的兴起要早一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标志。但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客观的历史行程又孕育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

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统一起来和联合一处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原因。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汇集成反帝反封建的巨大革命洪流。

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统一起来和联合一处，是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突出贡献。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统一起来和联合一处，正确处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根源之一。

在抗战后期，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美国统治集团不仅以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为己任，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对美国统治集团来说，谈不上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统一起来和正确处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必然遭到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国民党也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并且必以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后快。虽然它也标榜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但由于其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听凭美苏等大国的控制和宰割，因而使其标榜的民族主义口号成为一句不能实现的空话。这样，蒋介石国民党也谈不上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统一起来，更谈不上正确处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

苏联曾经大力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曾大力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支持二者的结合。第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都与苏联的上述支持密切相关。苏联之所以大力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并支持二者的结合，是因为这两种运动及其相互结合既符合苏联的革命利益，也符合苏联的民族利益。但是，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当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及其相互结合与苏联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就有所变化。它通过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宰割，以获取中国的民族权益。它通过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割裂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彻底的民族

解放斗争。它还在实际行动中阻滞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此间，苏联虽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苏联在中国革命的决战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地位，而不是它的主观政策。应当说，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从其民族私利出发，在中国问题上维持苏美妥协和苏蒋妥协的总政策也是错误的和失败的。

总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关系采取反动的或错误的态度，是美苏对华政策和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必然失败的根源之一。

关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彻底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的革命学说，也是他们所开展的一场革命运动和要建立的社会制度。民主主义则是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创立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资产阶级所开展的一场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和建立的社会制度。

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有其对立的一面，因为它们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所遵循的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制度。但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又有一致的一面。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起着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只不过共产主义是更高阶段的革命运动和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

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

时代，而中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此时的中国，不仅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而且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种进步的革命运动就出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它不可能单独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运动并取得彻底胜利。这一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于是，在中国，又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结合。民主主义运动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反帝反封建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任务。

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有机结合，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突出贡献。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将这种结合扩展到国际方面，因为当时处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美英等国和蒋介石国民党都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进步作用。毛泽东将这种结合做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联美拉蒋和与美蒋的妥协与合作，就是毛泽东在这种基础上制定的战略决策。这样，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也就成为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毛泽东确立正确的外交战略和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根源之一。

在抗战后期，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美蒋反动派极力反对共产主义，根本否定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存在的一致性和他们的结合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而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战争。尽管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进步民主人士真诚支持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并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深表同情，但他们也往往把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根本不相容的。当时，许多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纷纷劝说中共领导人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当时，美国

也有人提出如何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福利和个人自由的问题，并提出怎样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致起来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不可能为美国统治集团所重视。关于这个问题，美国驻华官员费正清①指出：美国在中国“所承认的现政权（国民党）已失去能力，无法给予民众经济保障，为了保持权力，它也不容许他们发表政见。”就是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福利，也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自由权利。但是，美国仍然决定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为此，费正清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可能危及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在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可是，我们似乎宁要反动的种种已知的罪恶，而不要革命的种种未知的危险。”这是为什么！费正清说：“我们支持国民党有许多原因，有法律的，也有实际的。但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是一个已知数，并且依赖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我们担心，国民党如果失败，我们在中国的影响将被苏联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忧虑，虽然我们信誓旦旦，好像要在中国支持自由主义的目标，实际却在那儿帮助国民党倒行逆施。做为个人，我们为一个政权的腐化堕落和强盗行径感到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共同支持这个政权。”②费正清的分析说明，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为了实现控制中国的目的，不仅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而且也抛弃了它曾经遵循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的原则，在中国支持一个为人民所反对的独裁专制的政权。

自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苏联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民主主义运动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国共合作的建立是苏联大力支持的结果。但是，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却在不同场合屡屡指责中国

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群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改革者而已。由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这说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而又全面的认识。他们实际上是割裂了中国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苏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对华政策必然脱离中国的实际，必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视和怀疑。

总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及其相互关系采取反动的或错误的态度，是美苏对华政策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必然失败的又一根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政治外交战略，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确立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提出大力引进外资、实行全面开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毛泽东为确立和实施正确的外交战略而创立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不仅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成为后来毛泽东创立三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在当今世界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确立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思想，是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制定和创立的一系列外交理论和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以上这些，就是1943——1949年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带给我们的主要历史价值和启示。

注　释

1　费正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 12 月，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7 月，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并开始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后来，他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2　《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7——321 页。

主要参考资料

一、文集、文件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张闻天东北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毛泽东集》，日本苍苍社 1983 年版。

《毛泽东集》（补卷），日本苍苍社，1985 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1989 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解放社 1949 年版。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湾 1981 年版。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版。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华盛顿 1957 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二、回忆录、专著

《杜鲁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中国的纠葛》，赫伯特·菲斯著，北京大学 1989 年版。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伊·卡恩著，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迈克尔·沙勒著，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包瑞德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红色中国的挑战》，斯坦因著，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解放区见闻》，福尔曼著，重庆学术社 1946 年版。

《北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著，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1942——1946 年的远东》，琼斯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苏俄与远东》，戴维·达林著，美国耶鲁大学 1971 年版。

《外交史》，阿尼金著，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牛军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美国，俄国和冷战》，沃尔特·拉费贝著。

《美国外交》，乔治·凯南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年版。

《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李银桥著。

《共产主义运动》，克劳丁著，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蒋总统秘录》，古屋奎二著，台北中央日报译印 1977 年版。

《苏中关系，1945——1980》，鲍里索夫、科罗斯科夫著，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 1982 年版。

《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政治史，1917——1980》，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巴巴拉·塔奇曼著，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史迪威事件》，梁敬錞著，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

《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伊·卡恩著，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金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

《转折的一年》，项立岭著，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抉择与分歧》，马丁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

三、报刊杂志

《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延安）

《新华日报》（重庆）

《近代中国》（台湾）

《党的文献》

《党史通讯》

《中共党史研究》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信息》

《国外社会科学信息》

《中共党史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传记文学》（台湾）

《近代史研究》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中共党史研究》（增刊）
《真理报》（苏联）

四、其　它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马齐彬等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袁明、哈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东北大事记》，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星火燎原》，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外人士访延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意识形态与外交事物》，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